戴晴文集

戴晴

目录

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戴晴节选自《国共纷争》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 日苏联对日宣战，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 14 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 4 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 100 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

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 8 月 20 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 23 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着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 100 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日军大规模的会战 22 次，重要战斗 1117 次，小战斗 38931 次，毙伤日军 276280 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 9 月 25 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 月 17 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 月 17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 31 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 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993 年度戈德曼环境奖获奖词

当全人类都在重新思索并且积极调整人与地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共产主义为中国制造了一批学力不足却权力膨胀的怪物。当这方土地还没有从 1950 年代的大兴水利、大炼钢铁——这两项政治运动以砍伐森林为主要物质支援——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缓过气来的时候，这类人又调动一切手段，以旧有的政治观念和体制为依托，执意在长江上筑一个将进一步导致生态破坏和社会灾难的超大型水坝。

他们遵奉"政治第一"，打算以此告诉全世界，"站了起来的中国人"的无所不能； 他们遵奉"经济发展第一"，以"人定胜天"的愚狂，肆无忌惮的向自然索取。其实，一个有尊严、有自信的民族用不着炫示、逞强； 而有远虑、懂得节制才可称得上新世纪人。

我们早已吃够了政治第一的苦头，稍不当心，还要再吃经济第一的苦头。就算你是从无畏忌的共产主义者，就算你足具"中国特色"，也不可以如此咄咄逼天——除非你打算在毁掉你自己的同时，也毁掉你的邻居和你的子孙。

在我们的国歌里有这样一句话：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曾经意味着法西斯对中国的鲸吞； 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无疑意味着经济的飞快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威胁。

1940 年代，我们与你们曾结为联盟，共同面对法西斯的毒焰； 今天，具有仁厚的爱心与世界胸怀的人，再一次把关切的目光投向需要声援、需要帮助、需要连手行动的地方。这是对中国所有环保工作者和为自身生存环境而忧心如焚的普通民众的支援。我在这里谨代表他们，向……，…… 致以真诚的敬意。

这笔钱将捐给中国大陆一家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用来编制《中国环境年度报告》。

（1993 年 4 月 20 日 于旧金山）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有一件事情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为什么一批着了迷的三峡工程上马派，为了取得有限的水电能，非要在一条横贯中国的命脉大江的干流上筑一座据称世界第一的大坝——根本不顾她担负着繁重的航运任务、不顾她因水土流失一年多似一年的泥沙、不顾她坝体之上 100 公

里内生活着的一亿农业人口；

更让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这座据称好得不得了的、“无可替代”的宏伟工程，居然不敢在全国民众间、哪怕仅在学术界展开平等的公开的讨论。当我和我的新闻界的朋友们抢在他们匆匆动手前，将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们的见解集成一本书，义卖筹款推向社会的时候，竟在“六、四”镇压之后，被勒令化浆并禁止再版销售至今。

罪名是： “为这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

中国古代哲人说过：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的是把人民的嘴堵起来，比用筑大坝拦洪的办法治水为害更甚。4000 年过去了，这话在今天还是象在告诫后世掌权者：让百姓畅所欲言，让江河奔腾不息。

我不掌权，我只能用我的口、我的笔，捍卫我的同胞保护这条珍贵的大江和她美丽的峡谷的权利。

（1993 年 4 月 20 日 于旧金山）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

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

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湾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鞑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教育和传媒，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党和国家”的工具与喉舌，已经没有第二条路。这情况，在 70 年代末的改革之后，稍有改进。其改进的程度与执政的共产党将原先绝对独揽的社会资源和严格控制下的公民权利返还给社会的程度相当。

（三）

1984 年的"十一"，就在 20 世纪快要进入它的尾声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横幅"小平您好"，赞扬这名专权改革者所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绩：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的部分恢复，撤除阶级成分划下的政治歧视和压迫，为政治运动受难者恢复名誉等。鼓励他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真正实践最初对社会许诺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过去。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是，在毛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子上，邓作为继承人，似乎什么都能改，甚至“姓资姓社”都无所谓，惟独“不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人类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党内人士享受了片刻的 1978 年的"议论自由"之后，邓的决定是：对他所设计的改革，只"摸着石头过河"，无论其理论、方法、步骤，还是对变动着社会

成分，一律"不讨论"。尽管如此，对社会有限的权利返还，还是给了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一丝生机。然而，这类不够成熟的社会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强硬的当权者和激进的革命者手中断送。籍着对 1989 年社会抗议行动的镇压，十年间艰难地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现代社会萌芽，特别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发言的阵地，遭到全面清剿。两年之后，这名以开辟中国的新时代自命的独裁者，在其衰朽之年亲自南下，希图挽救他亲手设计的"经济改革一花独放"的改革大业，却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权力化的资本和市场毒化了中国现代社会可能的生长点。就在外国资本与集权政治联手，将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妖娆商家妇的时候，她的结局，似乎不出两类：经济上去了，社会法西斯化；经济上不去，社会动乱。当然还有一个与世纪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国际干预与共管。

（四）

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 GNP 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头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只是党的工具。

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它萌于军事强权左右社会的中古时代，并再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所处的地位所验证。

“历史”包裹着的宣传

——《鸦片战争》心解[1]

戴晴

导演谢晋发愿拍成“历史巨片”的《鸦片战争》，赶在一九九七年“七?一”这个大日子前如期“献礼”了。虽然没有像《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夫唱妇随》那样被明确告喻为“主旋律影片”，但《鸦片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享受到了上述数片的待遇：

公映前，审片领导点头称许；公映时，国内报纸好评如潮，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倒也十分热闹。广电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一齐关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宣传、发行、放映工作，以至于从一号到七号，笔者问了城北城西好几家电影院，竟然任何一天的票都订不到。订票处开始以为又有公费请客的生意，等到弄清楚我们一共不过两、三个人，便失去兴趣：“七号以前都是包场。”说毕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好不容易等到声势浩大的各项回归庆典陆续收场，如笔者般自掏腰包的个人观众才得以到重新开放的电影院“后睹为快”。因为上座不足十分之一，电影院连冷气都懒得开，观众们一边欣赏这血火巨片，一边噼噼啪啪赶蚊子。剧终散场，想想这十五块钱花得实在冤枉——差不多是普通北京人一天的生活费！

掏钱买票的观众自然要问，一部“历史巨片”应具备什么因素？或者说，他们应该享受哪些服务？想来至少须有三点：历史大脉络真实可信；细节(包括人物)的艺术虚构成功；艺术家们，当然主要是导演，特别是象该片导演这样怀着“一种长久的民族感情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艺术宿债”名导演，要有真诚的历史反思来启发观众。

下面仅以观众的感受，而非圈内捧场或各级宣传部门的精神，来检讨这部影片。

(一) 电影的开头

紫禁城暴雨如注，上谕讨论“严禁鸦片吸食立斩”的廷寄纷纷发往各地疆臣，字幕打出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然后是林则徐一脸郑重写奏折的画面，接着他厚重的画外音响起：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大患。臣以为，如再犹豫不决，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防。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个开头颇具气势，大概可以震住不少观众，让他们油然生起亡国之忧思。问题是，林则徐不可能在 1838 年 7 月时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样的话。

他要是有这份远见，把外国人作为一个有意图有能力亡我国灭我种的敌对力量来考虑，就不会在禁烟中犯下轻敌的错误(这个错误电影也是承认的)。甚至当时全清国上下究竟有没有人有这份远见，都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直到 1842 年战争已近尾声，道光皇帝还在和文臣武将们琢磨：“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

再说，林则徐也相当不可能在奏折中使用“洋人”一词。直到鸦片战争后又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国的咸丰皇帝拖妻带子逃到热河，让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战后通过条约规定，外国人才有幸被满大人中性地称为“洋人”。在此前的奏章谕旨和著述中，他们一概被斥为“蛮夷”。这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用词问题，而事关着天朝的体统，而体统——该片导演也在电影中承认——是天朝的君臣心目中头等的大事。

还有“亡国灭种”，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令“无数革命先烈”最为痛心疾首的焦虑，以抗战街头宣传起家的谢晋，对这一口号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则徐不是宣传队员，他不可能有这种值得尊敬的忧虑——“亡国灭种”之忧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识到、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挂在嘴边上的，那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十年的事了。

林则徐和所有参加禁烟大讨论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鸦片造成的银荒，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外国人只是遥远模糊、无关痛痒的事物，是作为奇闻异事载于典册而聊备一观的——“外国人颠覆天朝”是当时大清国的君臣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该片导演由不得林则徐按照历史条件去思想和说话，他需要林则徐替自己说出“洋人不

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句林则徐的《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没一点影子的远见卓识，在把“洋人”刻画为居心险恶的下毒者(而不仅仅是贩毒者)的同时，鸦片战争便被渲染为一场保种保国的壮烈的卫国战争了。

问题是，鸦片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这是一幅滑稽卑琐远多于庄严壮烈的图景，却是当时的真实，也是中国悲剧之所在。

这悲剧的责任者，不是被判绞监侯以谢天下的奕山奕经，也不是眼界有限的道光林则徐琦善，甚至也不是把鸦片运到天朝海岸的英国人——早在奕山奕经林则徐当道掌权之前，也早在鸦片侵蚀天朝的官员军人之前，清朝的国力和精神就已经腐朽了。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当天朝的君臣对着夷人的击燧枪和世界地图吃吃发笑，在磕头礼上争国权、存国体时，天朝来自文化最深根脉的腐败，已显露尽然。在民族歧视、文网周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缠绕纠结的清朝，吸食鸦片只是诸种病态的表征。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气量，还是一古脑赖到外人头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头等命题。不幸谢晋拍电影向来不是为了自省。按照江总书记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着高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节拍，他把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文明痛苦的调适过程，立场鲜明地处理为：“鸦片战争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摆在历史上，……英国人用炮轰我们怎么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吗？”“武器落后，仍不畏强暴，拼死血战，这是很悲壮的行为。《鸦片战争》就是要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

(二) 林则徐进京

要不要禁鸦片？虽然禁烟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颁布，百年来实际处于我们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对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弃民吸鸦片慢性自杀，在这个处处以省事省钱为要的小气皇帝看来，无关大局。后来言官黄爵滋气势逼人提出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还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查禁鸦片)。钦差点了当朝最为清廉最有效率、且办事彻底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说明拖拉敷衍几十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在和房师沈维娇(这位是史有确载的)告别时，谈及未来的困境不禁泪下；他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龚自珍，也送序为他担忧、为他打气。不知导演为何断然舍弃所有史实，重打鼓另开张，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大烟鬼吕子方，据称还兼为道光的开蒙老师(用水墨丹青和四书五经开蒙也够特别的)，和林则徐的“恩师”(蒙师？开笔师傅？房师？座主？情况不明)，在这层关系之上，就演出一场“道光爷挥泪斩都讲，吕子方慷概祭大旗”的好戏。

大概在该片导演的概念中，皇帝么，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包括自己的老师，恰如后来的一整批军阀包括蒋中正毛润之之所为！可实际上皇帝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他要杀什么人，用中国现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得“给个说法”。而在 1838 年以吸食鸦片来定罪杀人，恰

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林则徐进京前各省大员们讨论的中心。在当时人看来，吸食鸦片是自害自身，无法与十恶(杀无赦的十项大罪)相提并论。如果吸食鸦片即罪当论死，那么制贩鸦片又当判何刑罚？

再说当时全国的吸毒者多达数百万，亲友等相关之人更不计其数，对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势将震动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使道光大为震怒的庄亲王奕　和镇国公溥喜吸食鸦片案，也不过着革去王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两年。导演抄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剧老套，无非为达到如下效果：连大烟鬼都奋勇为禁烟作贡献，观众心中难道不该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坏，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洋鬼子的敌忾之气吗？！可惜在编造情节时，导演不仅超出了历史的实在性，而且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结果这场搬演于勤政殿外的沉重肃穆的“斩马谡”(明清以降，从没有让一个罪犯亵渎过午门以内的土地)，反而达到一场杂耍的效果。这“烟鬼要禁烟”和电影后半部分的“赃官能杀敌”，作为导演精心构想的重头情节，堪称该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之双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着推出一个主要角色，禁烟大员、行商、英国鸦片贩子、还有谢戏里绝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间的穿线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这根线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颗珠子都对不上眼。

根据行商制度，外商和他们的保商关系固定，就算更换保商，也超不出这十三行；同时，行商习惯上是子继父业。也就是说，何敬容作颠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继承人，颠地对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从他海里捞上来之后对面不识，而让他当水手刷甲板。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起的翻译小组，“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将这些情报采集成册，以供参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辉和梁进德二人，都是传教士的学生；还有一名华侨青年和一名去过印度的老人。而林则徐的夷务幕僚班子。

包括了一批广东地方上的精华人物。如副贡生梁廷　，全凭自觉了解收集夷情，研究粤海关历史，并为后世留下一部鸦片战争目击记《夷氛闻记》。但是在电影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出来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象通广东通中国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夷务大腕，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与洋人斗法靠他，琦大人谈条件办劳军也靠他——身为鸦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实，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这位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能说洋文、敢冒险出洋作生意赚大钱、能和官府打交道、还有心追随下台的林则徐去搞搞学术研究的优秀青年，三分像谢晋熟悉的上海洋场小开(注意，这种人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出现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学归国人员”，这类超越历史时空的传奇人物恐怕只在廉价的肥皂剧里才草草攒出吧。

为了加强何公子情节的戏剧性，谢晋还设计了一场洋美人劫法场，洋美人之父、大鸦片贩子颠地冲出商馆、从清失兵手中夺回女儿的“好看的戏”。导演大概忘记了，当时颠地已经被两广总督驱逐，林则徐到达后，又一再传颠地问话。颠地自知处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馆里不敢露面。如果象电影中那样，他冲出商馆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将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过电影琢磨一下谢晋脑中的艺术素材库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鸦片战争》中金枪鱼号上的鸦片交易一场(中国老头子开箱验货，满意以后，从自己船上搬来大箱的银子，换走大箱的鸦片)，颇具上海小菜市场上先尝后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气氛。可是作为自由贸易的老鼻祖，英国人早已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当时在广州进行的鸦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现银——清代的银锭由于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来是很麻烦的——也不需要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港脚商人从印度运来鸦片，把货卸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中国的鸦片买主只需把银子(通常是更为方便可靠的银票)交到广州洋商馆，凭商馆出具的执照，即可驾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到趸船提货。

(四)妓女蓉儿

以拍摄言情见长的谢晋，大概以为不在历史和战争中加点桃色就不能看，不顾历史学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国”之老窠臼。横逆当前，推出一两个大义凛然的奇女子——或牺牲了生命，或贡献了身体（后者在强调贞洁的中国犹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历史课题、不必再费心反思积贫积弱的真实原因的同时，兼收壮烈凄美之效果，何乐而不为？庚子之变有赛金花，洪宪帝制时有小凤仙，焉知鸦片战争中就没有蓉儿！即使不见史载何妨编一个？倒是本篇对妓女蓉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谢晋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爱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鸦片战争》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纯真爱情；其二卖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顶好再有点神秘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杜十娘、李寄和红线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会后花园，还能直接手刃敌酋，比实有其人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更上一层楼。

令人不解的是，爷爷是前御林军高级军官和随乾隆爷开疆拓土的老英雄，孙女是有血性有胆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为了什么了不得的隐情，竟甘心被一个行商攒在手心里，忍受为奴作娼的命运。电影里交待得语焉不详，大概一心只想编得刺激的导演也想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縻。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 年 7 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重伤撤退。失去防护的定海军民纷纷逃散，英军毫无伤亡地占领了这座空城。姚怀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壮回来增援，见大势已去，遂跳进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杀。

看来这种平朴沉重的史实不合导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罗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纲。于是，在电影中，英军用大炮攻克定海变成了炮台或城楼上的肉搏，跳水池变成姚县令向北叩首然后横剑自刎，而目睹这一悲壮之举的英军个个面无人色……。

如果说从电影开头一直到姚怀祥之死的一系列编造还可以用该片导演个人的艺术癖好来开脱，那么姚怀祥自杀后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称之为有意为之的欺骗宣传了。这段字幕说：姚怀祥是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第一个大清官员，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有三百多名官员自杀殉职，而无一人投降！

不知《鸦片战争》的编导们自己有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实在是在玩一场拼接术。不错，是“无一投降”。这是因为大清的官员战将望风而溃，还没等打什么硬仗，就没命地逃到安全的后方去了。将“无一投降”与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战争格局割裂开，再巧妙地与一场虚构的肉搏战、一个改头换面的壮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为渲染出这样一个形象：鸦片战争是一场英勇无比的地狱之战，弱小民族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武器精良的强敌埋葬在血肉长城中。

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没有英勇战斗的表现，比如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定海之战，葛云飞等三总兵战死沙场。但更普遍的是吴淞、厦门之战这种主帅弃职先逃、士兵跟着一哄而散的战事，而且越是到战争的后期，在清军对英军的战斗力所知越多之后，这种不战而溃的情况就越频繁。当英军危胁扬州时候，这个积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缙绅，决定还是出钱买命为好。

这算不算是一种投降行为呢？再说，即使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在绝无胜算的情况下，开城出降还是人尽为战，哪一种选择更负责？这本是一个超越国籍和超越时代的争论，我们今天只能说，应由每一地的人民和军人、官吏，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作出抉择。但《鸦片战争》导演紧跟当局自“整风”“审干”之后铸就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把投降视为罪恶，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当历史人物没有表现出该片导演需要的“武器落后还拼死血战”的品质时，他就干脆不拍！所以“谢版鸦片战争”到琦善革职就戛然而止，尽管这以后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战争打到底；奕山、奕经两将军又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仗(占整个鸦片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事都发生这后一阶段。谢晋快刀斩乱麻，把这些丢盔御甲不给中国人长脸的事一笔勾销——不过他倒底还不便把 1841 年的定海之战移到 1840 年来，所以只好在姚怀祥之死的细节上作手脚。

(六) 关天培之死

关天培以相当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阶而战死在火线，在鸦片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就特别为时人所乐道。各种记载中关天培战死的情形颇有参差，传奇色彩也极浓，如：
“关天培……死守虎门，请援不应，老仆劝退，关叱之去……炮台已陷，…关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

“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盖去乎！…天培挥刀斫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见天培立如生，反骇而扑。……”

也有出自现场英国军官的记述：

虎门战后次日，关天培的家仆孙长庆，打着一面白旗来到英军占领的亚娘鞋山，请求运走关的尸体。鉴于日前英军已指挥俘虏将尸体全部就地掩埋，不得不把许多尸体又重新挖掘出来，由孙长庆一一辨识。当悲痛失声的老仆将尸体带走的时候，碇泊近旁的伯兰汉号军舰指挥官，命令舰上小炮鸣放礼炮，“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清楚完整，也很生动。

在电影中，史实清楚的“收尸”情节完全没有采用，而“英国军人看到关天培洞焉不倒的尸体反骇而扑”这样的拔高和丑化，则进一步渲染为：

关天培坐在炮身上，向登上炮台的英军勾勾手指头，口称“来呀来呀”(这个镜头大概出自擅拍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的香港导演之手)，说着扣翻火盆，将事先堆放在大炮周围的一桶桶火药(不知攻坚战中关天培哪来得这份功夫)炸响，关天培与英军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是技不如人的战士最壮烈最有价值的死法。当再没有别的什么战术战法可以夸口时，中国的艺术家们就只好让我们的民族英雄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同归于尽，《林则徐》如此，《董存瑞》如此，《上甘岭》如此，直到赶在《鸦片战争》头里大大地弘扬了一番藏族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感情的《红河谷》也是如此，而如谢晋这样正在“创造新的巅峰，也可能是中国电影的巅峰”中国头号大师，也不嫌重复地再来一遍。大约是还怕观众对这种血肉长城的战术的威力理解不够，轰地一响之后，导演又安排义律在军舰上慨叹曰：“有这种气概的民族是世界上任何炮舰也打不垮的！”

“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一位与洋务派论战、到最后不得不靠装病撤退的大学士倭仁唱过的这个高调，已被世人笑骂了近百年，不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上海，又得着谢晋这样一位知己。

(七) 韩肇庆之死

影片中的水师副统领韩肇庆生的龌龊，死的光荣，体现了满清官员“爱大清也爱银子”的原理。根据这个让人茅塞顿开的原理，编导先是让林大人把邓廷桢、关天培的受贿案证据销毁，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禁烟的统一战线；接着让披枷带刑的韩肇庆，在最后的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主动请战，从炮台上踊身跃下，嗷嗷叫着冲向英军——朴刀起处，猬毛绕嘴的侵略者纷纷倒地(这个大鸦片鬼能力战许久，大概是在请战以前过足了瘾)。一名“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的灵魂于是得到升华。

大清的官员因为腐败丢了天下；国民党的官员因腐败丢了大陆；今天，共产党对自己一整批不时用公款“为了革命”而放松放松的大小贪官正无计可施——也可以说，正紧握枪杆笔杆，站在贪官一方，令遭到盘剥与欺压的百姓哀告无门。贪与反贪不仅在八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今天和明天，也依旧是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绷得最紧的一根弦。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电影编导挺身出来，通过自己的编造，对各个能量级的贪官们表现出宽

谅与厚爱，兼为他们指出高扬民族大义、英勇反帝之生路，使得贪官们心领神会地团结在领导周围，不仅吮吸民脂民膏的劣迹风吹无痕，还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究竟出于何种用心？

（八）高潮：林则徐和琦善预言未来

编导的又一得意之笔：苍凉的海滩上，林则徐为琦善送行。这是编导安排的电影中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第一次，琦善作为钦差到广东，与摘了顶子的林则徐开会，就剿抚问题唇枪舌战；这一次，林则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锁拿进京。琦善说：你我虽都遭惨败，你或许名垂千古，我将身败名裂。林则徐说：虎门一战，前景可知，中华怕要进入漫漫长夜无路可行。

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于史无征，但在《鸦片战争》里却成为必需。林则徐和琦善的对面相逢，也就是林则徐路线和琦善路线的碰撞，其他人物情节都帖附在这林/琦二元对立之龙骨上。等到林路线和琦路线都惨败之后，编导似乎认为鸦片战争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南京条约签订(用旁白说明)，道光告庙，剧终。

三十六年前，电影《林则徐》把鸦片战争的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两条路线的斗争，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鸦片战争》依旧把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方略分歧，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只不过《林则徐》把剿定义为忠，把抚定义为奸，而《鸦片战争》把两者都定义为动机良好的策略。《林则徐》里边是三元里义民为代表的人民战争代替了官方抗战，《鸦片战争》适应流行观念，人民的代表变为妓女，妓女抗争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自作主张坏了大事，被果断地镇压了。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路线斗争式的情节处理理所当然。可是准备“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浓度上远远超过它(《林则徐》)，从而使影片在内在力度飞跃几个档次，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诗式的巨制《鸦片战争》，如此图示化就说不过去了。

《林则徐》强调林大人勤政爱民、对外强硬，本有历史根据，还被认为有“高大全”之嫌；《鸦片战争》的编导让林则徐预感到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先不说究竟什么算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闭腐朽，还是被外人硬敲开门的割地赔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只先顺着导演的思路认定 1840 年以后就算进入了黑暗、1949 年才迎来了光明，这拔高就更离谱了。历史上的林则徐调到浙江协办海防时仍是气势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绕了一大圈回到福建，还认为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上上大吉。林则徐的真实思想当然有局限性，可是这种局限不正是林则徐本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我们要深自反省的吗？但是编导却懒得、或者是没有能力让事实说话，他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时代”、“井底之蛙”一类宣示性的语言来表达“必须改革开放”之类的空泛概念，顾不上这种语言与角色的时代，包括角色本人离得有多远了。

(九) 结尾

电影的结尾，悲怆的音乐响起，字幕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条约时代”，下面是从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条约的名字；然后是：“一百五十年后，中国收回了香港。”

这是该片导演为全片打上的句号，是他苦干两年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鸦片战争的全部灾难就是割了香港吗？换句话说，收回了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灾难历史就划上句号了吗？也许对该片导演来说，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中国不仅有了铁甲炮舰，还了有原子弹，还有了头号列强都没有的三峡工程，中国人民无疑"已经站起来了"。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对《鸦片战争》进行报导时，不是也用"头号黑体字"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兴盛强大时，才敢于正视自己那段最屈辱的历史"了吗？

然而字号再大、篇幅再长、用语再铿锵，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国民平均教育水准等一系列统计面前，说中国今天不属尚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吧？

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条约时代"的全部内涵吗？这就得提醒导演，我们今天不仍在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等契约之中吗？就算依电影所说"条约时代到来"，仅指从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今天已经明白知道的是，将这一时代与中国之前之后的"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鸦片战争的赔款，咸丰帝虽感手紧，库里总还剩了几两银子。剿平了太平天国，天朝的财政才从黑字变成了红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挖去了大批的银子，可谁又说得清一次投入 160 万兵力的"蒋冯阎大战"、先后投入 150 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拉锯战、以及双方投入 800 万兵力、时间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除了打仗，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的石舫、抗日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

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 1997 年 7 月 1 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 97 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 这个日子给我们省了 500 万美元广告费。”。对于执政党狭隘霸道的文化政策从不见有任何建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谢晋，突然记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占便宜之处，打算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发言。由于“连续几届大会，谢晋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谢晋决定发言”，令秘书处措手不及。据报道后来是看在“谢晋一脸孩子气”，“谢晋的拗劲”的份上，该处最后还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会后，《鸦片战争》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发布会的有：雷洁琼、陈锡联、洪学智、经叔平、邓朴方……。在求见这些要人或者向他们求一幅题字可以明码标价的当今中国，谢委员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仅省下一大笔场租，也当场拍出了集资的信誉担保。不错，《鸦片战争》听起来是民间集资，但集资之完成是由当时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出面，“召来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面授机宜”……。对于身在草莽(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而心存魏阙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与生意眼，能不服吗？“天才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何况是香港回归。”遗憾的是艺术不能只靠门槛精[2]2。

谢晋恐怕不会不明白，一部电影，如果“从一开始就牵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得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被上至总书记中宣部长，下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从数仞宫墙外边看看的地方接见，以示重视与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么来交换的，比方说，思想独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甚至已经成了《鸦片战争》的制片之一。

谢晋曾说，“我们要是有 2000 万美元的投资，有一个好剧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单》那样十足现实主义的影片”；承认拍《鸦片战争》，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单》的灵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时候，他也不忘时时温习当今关于“舆论导向”的指示，（为他拍摄该片作历史性记载的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意外地发现，在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除了酒之外，还有一张刊登着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的报纸，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可能正是今日中国政治大片的“社会主义特色”。于是，观众看到的《鸦片战争》，既要维持历史片的形式以获取“历史”的说服力，又要借历史的人物故事承载谢晋的（也即他所正确领会的党的）观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来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够的时候就放开胆子编。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鸦片战争》无法“担当起全面公正审视历史”的重任。与中国今天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下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一样，它不过是以“历史”为包装的宣传，不过钱花得多些、场面热闹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锢，使得不仅 71 岁、得以与书记们首长们搭上话的谢晋，也让那些没门子或不屑钻门子的、有着独立见解和独立风格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法律的保护下，放手去想、去写、去拍，以中国文化之悠久、所经受苦难之漫漫、包括今天丰富的现实，还愁没有好作品吗？

[1] 文中引号中导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话，引自郭伟成著《沉沦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鸦片战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2] 完稿之际，又见有该片编剧发表的“呕心沥血”拍大片的记述，谈到该片怎么四次将稿送审（从中央到上海），怎么每次都有具体的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参与者怎么苦不堪言，有着怎么样的难言之隐……最后大家敬爱的“谢导”怎么发了大脾气:“难道我是卖国主义吗！？”读毕该文，同在文化专制欺压下的同情虽然也难免稍稍生出，但总的感觉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里同人所说：不是要赶时髦、捞政治资本么？那还能要脸吗？

“红色的官老爷想为自己立纪念碑”

据说李鹏的继任朱熔基从来就不喜欢三峡项目

长江三峡大坝关闸蓄水是德语媒体本星期涉及中国的重要题材。各大报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风险。富有影响的新闻周刊“明镜”列举了三峡工程建造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离大坝建成的时间越近，中国的环保人士越激烈地提出警告。他们说，约六百公里长的库区有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废水坑，因为蓄水时不仅残垣断壁、遗弃的住房和工厂被淹没，江水也将冲刷地下储藏的水银以及残留的垃圾场、加油站、油库、坟墓和医院。

专家们看来，没有经过净化处理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具有同样危险。迄今为止，长江沿岸只有少数污水处理厂。仅 2001 年一年，就有 220 亿吨污水和工业废物排入长江。直到今天，数百万人口的重庆市只能净化 5％的本市废水。”

南德意志报说，三峡工程是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后强行通过的工程，主要赞成者是当时任总理的强硬派人物李鹏，据说其继任者朱熔基从来就不喜欢这个项目。南德意志报接着谈到三峡工程对文化遗产、当地居民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影响：

“1989 年以前，中国内部对这个项目有很强的反对意见。科学家和工程师当时提出的一系列论据，今天只能在国外听到。他们说，库区泥沙沉积将使发电、防洪和航运成为问题、环境遭到破坏，中国心脏地区考古宝库将随之丧失。120 万人的移民问题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巨大社会问题：许多城市居民高高兴兴地在沿江地带迁入新城，而农民应得的补偿却被腐败的干部骗取。一些人只是和平地发出了呼吁，就被关进了监狱。

据官方说法，大坝的建设费用折合 220 亿欧元，其他人估计实际费用将是其三倍，这就使此项工程变得完全无利可图。那么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热心于这个项目呢？批判三峡工程的戴晴说，这是追求充当伟人的心态，红色的官老爷想为自己立一座‘纪念碑’。”

——转自德国之声

(6/6/2003 12:18)

《东方红》始末

戴晴

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

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 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 1938 年，

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 1943 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 1944 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 1945 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20 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 80 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补记：

查找资料翻旧报纸，又发现 1949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石家庄版）

1

东方红 太阳升

立功英雄模范真光荣

勿骄勿躁积极干

呼——

继续竞赛大生产。

2

搞竞赛 大生产

英雄要带着群众干

工作办法要改善

呼——

竞赛任务提前完。

3

提高觉悟 虚心学习

不讲怪话不调皮

上级号召要做好

呼——

争取下次立功劳。

[1] 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开始确立；《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个人在党的最高级会议上有了最后的决定权；刘少奇王稼祥等连连发表赞颂文章，就连王明博古也开始使用“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类字眼。

《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题目，”看到的人都会说，“一本刊物跟一个年号怎么‘与’起来了？”是这样。但《中华英烈》与一九八六是不可分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是她创刊的一年，而在于，不谈一九八六而光说《中华英烈》就不带劲。

很难说后世的中国史学家会怎么看待一九八六。一九八六这四个字，会不会如一八四〇、一九一一、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六那样，深深融进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人的记忆。亲身经历过一九八六年的人，有谁会忘记它是怎样地令人鼓舞、振奋、紧迫、张惶、恼怒、惴惴不安与茫然不知所措呢？

这当然都属于同样在一九八六年特别时兴的“三论”所研究的课题之列。“三论”在忽地一下子开了门的中国学界已经时兴到如此程度：如果有谁纂出一篇千字文而不来几串信息基质、数论对策、内环境稳定场等等，就有被同人斥为老背晦的危险——虽然只有“三论”而没有计算机为伴，就算作者与读者同入五里云雾中，依然有点过洋瘾之嫌。

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出现了《中华英烈》——

当不仅责任田、时装摊、副食铺、旅馆、化肥厂……连钢铁企业乃至铁路都有可能承包的时候；

当爱慕孔方先生之风从沿海北渐，弄得将右手三个指头撮在一起轻捻，同时神秘地眨着眼睛，已经成了时髦的中国人标准手势的时候；

当居于领先地位的大、中、小型刊物的作者与编者已经不耐烦再说什么夫妻之爱、情侣之爱——这在八年前对中国人说来还是那样新鲜，只要想想《爱情的位置》那种小说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而孜孜于阳萎、盗嫂、畸型恋、不开化恋与早恋……

中国人在以就某种层次而言，连四十年代末都从未有过的速度改变着周围，改变着自己。谁也帮不上谁，谁也不想帮谁或者让别人帮。跟不上的人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哪怕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一张床上睡觉，或者受制于同样的染色体。

《中华英烈》出现在这时。

我知道，心理学家能举出无数实例论及“极致”对正常欣赏趣味的损害，论及强制性劝导将诱发出的逆反心理。如果说，几乎动员起全套最优秀演出与编导班底的《中国革命之歌》，要靠共青团请客学生才去看，而《白发魔女》却在家家电影院卖到最高票额，是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大悲剧的话，那么制造悲剧的那只手，彻底倒掉了中国人的胃口的，恰恰是以那一整批油光水滑、容光焕发、从头发到脚趾无一丝毛病、从生下来到死掉没一毫差错的样板们为代表的高大形象。当相声演员已经用战士的牺牲来作笑料——混身打得跟蜂窝煤似的:“班长，这是我最后的党费”，而观众也真的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中国人与半个世纪前沾着夏瑜的血治肺病的老栓小栓们已没了多大区别，谁造成的？

《中华英烈》正出在这时。

曾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与氢弹之父特勒亲密共事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标准资产阶级学者戴森，怀着纯真的钦敬与友爱，回想起他少年时候同为富裕家庭出生、才华出众、通体诗人气质，却献身于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事业的朋友：

弗兰克是作为英国的联络官，与保加利亚抵抗运动取得联系，一九四四年被空投到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

半年之后：

六月十日左右，在利特科沃的假审判之后，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就被处死了。他大约被关了十天。和他一起被处死的有另外四名官员：一名美国人、一名塞尔维亚人和两名保加利亚人。还有八名别的犯人。

在村公所里，很匆忙地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审判”。村公所里挤满了旁观者。目击者看见弗兰克背靠柱子坐着，在用烟斗抽烟，当问到他的时候，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保加利亚语，根本不需要翻译，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他被问道：“你是英国人，凭什么权力到我们国家来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弗兰克少校答道，“我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一国反对另一国的斗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你难道不知道持你这种观点的人是要枪毙的？”“我已准备为自由而献身，有保加利亚的爱国者和我一起献身，我感到自豪。”……

就我而言，这是少数的、看过一遍就再也忘不掉的文字之一。扪心自问，之所以如此为它所激动，恐怕主要因为某些高尚纯净的情操，某些因为常被无耻之徒挂在嘴边而失了光泽的圣洁的理想，某些为官场劣迹所浸染，弄到连自己都怀疑起来的原则，终因在一个不同肤色、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的世界观与不同的行为准则的人身上得到共鸣而格外明亮起来。我不信中国人会被深深的苦难与浅薄的福利所麻痹，会打算忘掉闻一多的无畏、忘掉李大钊的从容、忘掉陈毅的磊落、忘掉差不多一文不名的尧茂书只身跳进旋涡向长江挑战的豪迈。

《中华英烈》于是在此时出现。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说过：“如果我写一本书，我就要写我犯过的错误。”这句话不知说于何时，也不知有没有特指，当然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考据出在这之前或是之后，他是否受到过这个

念头的鼓舞与折磨。可以告慰的是，也许，他想做的事，在他溘然长逝之后，由他的继任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的知识界与准知识界，无论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还是九十岁，无论是受过打击还是打击过别人的人，都怀着难于言喻的酸甜苦辣，注视着一张张发黄的纸头从卷宗里抽出，化作家人重聚的热泪和对不复再来的岁月的叹息。当二十八岁的司机在追悼会上吃惊地望着"胡风同志"的横标，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这接受祭奠的主人就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阴谋家的时候，中国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繁荣强大的中国，离不开聪明热忱的人民；而聪明热忱的人民是一定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历史的真实的——用数学的语言，后者是前者的完全必要条件，历史与现实不容它有丝毫的因循。

于是，有了《中华英烈》。

《中华英烈》得以在一九八六年这样的时代问世，是因为我与我的同志者始终信守着的是，热血与正气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在中国人身上泯灭。我们不打算只是啧啧赞叹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我们不信，中国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父兄的事，只能由或将继续只由与中国文化如此隔膜、对中国风情如此陌生、甚至连中文都不懂的人来写。我们不信感动读者的只有被窝里的喁喁私话。健全与健康的人一定更为它所激励——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一九八六年出世的《中华英烈》。

《长江长江》成书经过

戴晴

由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发出的反对三峡工程兴建的声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上马高潮迫近时，大约只公开或半公开吼出来过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为机密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第三次就是我们那本薄薄的、由九十二岁的前中央政府资源安置委员会委员长孙越歧老题写书名，十多名北京大报记者联手采写的《长江长江》了。

大陆新闻本从属于宣传；而宣传自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出"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一原理之后，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了——这已是常识。令海内外所有爱国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而不要腐朽衰败的资本主义"；你可以牢牢掌握"党和她的领导历来伟大光荣正确"；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齿相依的战友，今天是犯我边疆的死敌，明天是亲密的贸易伙伴"……这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不说就是了。

但假若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并不是牵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恼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一项工程，一项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会象嬴政杨广一样干件亡党亡国的大傻事的工程，对这种论证，"牢牢掌握"的人还是不让，真有点岂有此理了。

这项工程提出，已经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开工”逼进。如果说以前的些微反对之声早已一次次被政治运动封杀了的话，到了改革开放

意兴正浓的彼时，又有人站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由孙越歧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所作的为时三十八天的调查。平均年龄七十二岁、一个个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带着满肚子意见和建议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却没有一家综合性的、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对他们的见解作一点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观报道。

不巧的是，该组的副组长是我母亲的老友，是我曾经跟在屁股后边喊叔叔的人。

“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请她发话把女儿调去采访他们。

我的母亲从不对我要求什么。一但她打来电话，并且称我为“戴晴”，准是她那备受磨难却依然勇气十足的共产主义信念又发动了。 我到政协礼堂去了。他们正式的调查汇报正要在那里作出。我以为找错了地方，因为，诺大的政协一层会议厅只在前几排正中坐了不到一百名听众。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一旁。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林华叔叔看见了我，在他的开场白里加了一句：“今天的大会有光明日报记者到场！”话音一落，听众突然鼓起掌来——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跑新闻的同行都知道，对于各大会议，当记者的能想办法混进去，占个有利位置，不被赶出来就很好了。

什么时候享受过如此礼遇？当然后来我才明白这恰是有意封锁的结果。

我那时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仅凭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识，觉得他们讲的不无道理。但我仅仅就职于一家报纸，既不掌握版面，也无采访派遣权。我能作的只是回报社找到总编室主任，问他如此重大的事为什么不派记者。他说上边有“精神”。了解大陆政治运作的人都明白，对“精神”这种事，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能作的也就是对他讲了我的见解，请他以后在对工程作正面报道时“悠着点”。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确实尽量作了。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声势浩大的“正面”推进中，当然微乎其微。

这次只是“奉母命”。我依旧忙自己的事，不认为我的工作与三峡工程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直到一九八八年秋。

那时，香港文化界正忙着欢迎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的两颗良心在彼地相会，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让我惊异的是，在大陆不见有多少普通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在香港各报的版面上却是如火如荼，这很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自己对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丢人。但我依旧不知道我能为三峡作什么。如果没有新结交的香港友人在我开完会回北京之后，依旧不依不饶，不停地将有关三峡报道的剪报源源寄来，弄得我火烧火燎，坐卧不宁，可能依旧没什么。我只盼与此工程有关的我的同业，如各报的科学版呀、时事新闻刊物呀等等能有点作为，但报面上还是只见官调高唱。

那条消息终于出来了——也是在港报上见到：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 年开工"！

再忙，再不懂，再无直接工作关系，也不再能构成一个有着起码良心的中国报人坐视不问的理由。我狠狠心，开始“管闲事”了。

现在有不少中外报刊把我称作“环境人士”，真是惭愧得紧。当然，对这一崇高事业心仪已久，但我们在 1988 年底到 1989 年初在三峡工程上所作的，其实仅仅本着记者的敬业心，为大陆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决策程序上，作一点对有限言论自由的推进。

邓小平说过：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

赵紫阳说过：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即使处在权威决策的专制体制下，也总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专家们在学术上的见解转译为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二件事是找个地方把它发出去。

第一件事不难。我虽然不能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十名专家，但改革开放已十年，相当一批优秀的记者已经摆脱只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齐动手，可以在一周内推出十篇访谈录，但发表在哪里呢？

对控制最严的报纸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时《世界经济导报》还没有停刊，或许有可能发一期专号？我与张伟国很认真地筹划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这是同人间的不同意见，没有官方插手。

报纸不行，刊物呢？《了望》之属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据称思想解放的是《新观察》，但他们几期已涨稿，能不能发个增刊？不行，因为必须上报特批，不但时间来不及，也肯定批不下来。《自然辩证法杂志》呢？科学院主管，但新任院长据说属绝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忠厚长者。《群言》？《华人世界》？……记得还问了好几家，全部理由充足地婉拒，共产党真是伟大得滴水不漏。

我那时差不多快气疯了，忽然想起一份新创刊不久而且一直向我索稿的山东杂志《科技企业家》。立刻联系，编辑部非常兴奋，马上派人来京参加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学家座谈，敲定三天后，即旧历大年初一那天，他们再派人来京取稿。为赶排赶印，来人不出车站立刻搭回头车返济南。而且，他们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还愿支付一点我们在北京的活动开支。

真是喜出望外！

我送他们下楼，走到楼梯口，那编辑停了步，欲言又止。我的心快停跳了。一再追问，方知他们还须我们的帮助够，能否想办法得到国家科协的同意——因为按照“牢牢掌握”，这是他们主管的主管的主管。我硬着头皮说了声没问题，心想周培源老是前科协主席，一本科学杂志按照现领袖的较新指示发一期利国利民的专辑，难道还作不了主不成？没想到事情办到这一步还是翻了船。原来这家刊物的在京联络主管不敢只请示科协前主席而忽略刚刚到任的现主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爱国政治家、中共的新鲜血液钱学森先生。钱先生的答复是：“戴晴什么人？她插手的事我们不要理。” 钱主席不愿沾我的边，这心情我太理解了。

但他说不知我何许人，似乎显得有点矫情。因为就在不过两三年前，我还作为故属（他当七机部副部长时我是该部技术员，文化革命时曾是他所靠近的那一派的干员），对他作过一次专门拜望。就如每次与伟人所作的聪明睿智之谈一样，有着一位钢琴家夫人，并且常常在琴声中思考科学与政治问题的钱老，问我最喜欢贝多芬的第几交响乐。

我那时正傻呼呼地在文化界生拼硬撞，于是说"第五"。钱先生脸上展现出天堂般的微笑：

"不，第九。这是他最高的成就——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和洽与友爱。" 我茅塞顿开。不幸到 1989 年方知，这精神只在老贝的音乐中，哪怕听者不但领略深透还爱得要命。于是，只剩下出书这条路。

问了北京的几家，包括有眼光、有胸怀，不时赔钱出好书的几位和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的几位，都被婉拒。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者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终于也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开印。

这就是那本《长江 长江》了。文化界、新闻界（包括外国、港台驻京记者）义买筹资、出版界朋友义务帮忙，终于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发行，直送委员们下塌的宾馆小卖部！ 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两万本，"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三联书店紧接着出了港版，更名为《三峡工程是否应兴建》。1991 年，上马之风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书名。

与官方主办的声势浩大的"正面报道"相比，我们的努力也许小得可怜。无论将来宏伟壮丽的大坝将滔滔江水拦腰截住时，有人在觥筹交错之际讲讲这蚍蜉撼树的小插曲，还是几十年之后工程师们为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淤沙伤透了脑筋，而跌足长叹"早就有人说过"，都已无关紧要。我们只是一批敬业的新闻从业者，我们尽力在需要的时候作了我们该作的事。

1993

【戴晴评中共党史】心中的问号（1）最高权力交接老百姓只能猜测

戴晴

眼下，凡与中国政局有关的人，心里都揣着一个问号：这届大会之后，中共的大权由谁执掌？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今天基本上还属于集权统治，执政的共产党里边哪个人获得了哪个名头，基本上就是当今皇上（或垂帘者）了，而我们治下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日子过，无不与那人的学识、性情、偏好紧密相连，更不必说张扬于台面、策划于密室、须与他们酬酢周旋的大小政客了。

按照现代社会构成原理，这人本来应当由我们大家，也就是为国出力出钱的人公推。无奈共

产党早在 50 年前就靠枪说话，把别的党派都变成了它的“亲密助手”，使他们失去了和共产党比民心、比实力的资格，百姓们只好认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被动等候它出个好人为民谋利。本来，按照现代政党原理，这“好人”也应该由它的党员公推，从小组到支部到总支，先选出代表，代表投票选委员会、再选常委和总头儿——对此，共产党不仅认账，还堂皇地写进自己的章程，可惜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那似乎天经地义的程序就是招晃一张，从来不曾对高层人事安排起过作用。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锋、名重一时的北大教授根本没到上海开会，不仅他的“当选”是出于共产国际的指定，中共的经费和重大决策也多出自莫斯科。

就这么当了五届之后，原先派给他的盟友蒋介石突然翻脸杀人，第六届党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在中国开。鉴于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失望，莫斯科这回指定了工人，向忠发懵头懵脑地给按到第一把交椅上。

这是 1928 年。从诞生时算起，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在七年间已经开了六次。可从“六大”到“七大”，却整整间隔了十七年。是形势平稳得无须碰头了么？显然不是，因为在这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日本的侵占和全面侵略，经历了国民政府由坚持一党独裁到容纳各方意见，共产党自己也从没有一兵一卒到养兵一百多万，地盘由早先与当局分庭抗礼的苏维埃共和国到归属南京的边区政府……就连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校长到独夫民贼到领袖翻了好几个个儿。

是该开七大了。事实上，不仅在苏联最有面子的王明（国际执委，马列主义权威）1937 年奉命回国时，怀中就已经揣了一纸召开七大的命令，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早已自 1938 年就千辛万苦地陆续抵达延安。

不到时候绝对不能开会。这是毛泽东自“神仙从天而降”（王明奉命回国）起，就一直居心良苦地抗拒着的。国际派颐指气使，不就因为他们一有莫斯科撑腰，二是满口马列么。但十个月之后，“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了。这是因为，新从莫斯科归国的王稼祥带来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此节对今日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依旧属于不足为凭的孤证，但在当时足以把毛泽东推上了“主持日常工作”位置。

而正是在这次会上，毛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

－－转自 VOA(7/17/200219:24)

【戴晴评中共党史】心中的问号（2）毛泽东“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戴晴

从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六届六中全会，到为下一届，也就是为七大做准备的七中全会，中间间隔了七年。在这七年里，毛以“开展学习竞赛”、“整风”、“抢救”等手段，对他的老战友、

新同志强行洗脑。到 1944 年，他觉得差不多了（而且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七中全会召开。这会整整开了 11 个月，直到从历史上全盘肯定毛泽东已成定局（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才决定会议闭幕——而闭幕之后三天，最受御用史家赞颂、将毛泽东推上最高权威巅峰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从“七大”到毛泽东很不满意、但在当时隐忍而未发的“八大”大约十年。

大家可能记得，在为八大作准备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表面上是相当意气风发的：把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骂做“小脚女人”，扬言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在地球上绝种”……，而到了八大，刘邓等人表面上虽然依旧在捧他，但居然痕迹不露地把这次大会变成了中共历史上正规化和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会议，出台了好几项限制他的决议，如加强党内民主、实行年会制，毛泽东思想决定不再提，考虑设立名誉主席等等。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可以用上“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那句老话。

八大一次会议选出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显得真精神、真富于朝气呀——陈云邓小平 50 出头，刘少奇周恩来不到 60，年纪最大的朱老总也不过刚满 70，百姓不禁以为，或许中共就此走上建设与现代政党的路子。无奈我们已经经过的现实是，二次会议（即巩固大跃进精神成果的会）上，毛就推翻了“八大”决议，此后不但从肉体上根绝了党外的批评，自己同志也绝不许有丝毫忤逆。直到发动文革，并在八届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彻底解决了刘少奇，与“八大”间隔十三年的“九大”才“胜利召开”。

看看中共的历届领袖吧。国际指定的几位：陈独秀被剥夺职务后开除、向中发被捕投敌；莫斯科回来的小伙子们在国际的“建议”下给挤下台；八大选出的刘、邓不到九大就给“灭”了；九大写入党章的第一接班人林彪，不到十大就密谋篡位，结果在逃跑中丢了性命；十大的指定接班人王洪文两年后被捕，最后死在监狱；十一大的华国锋、十二大的胡耀邦、十三大的赵紫阳，都没坐到下届选举。

如今，照老规矩，十六大前夕的最后一届全会正在北戴河召开。交椅最终怎么排，全世界都在猜。

中共的十六大应该说非同小可，因为这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共产主义大党”，正面临“公产”重新分配——有早先拿枪抢来的，更多的是几代人中国人含辛茹苦创出来的。如今，共产党一党当家这一格局尚未变，但当家的共产党却正在变——在向谁也说不清、但肯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向转变。

无论是现代的程序与制度，还是传统的仁、义、信，对毛泽东而言，都是随用随扔的工具。居于权力的巅峰是他唯一的目标。使他离开这位子的，只有自然规律：疾病、衰老、死亡——再刁钻险诈的谋略，至此也没奈何了。虽然离世前若干年就辞去了正式位置，“第二代领袖”邓小平之恋权恋位，也好不到哪里。他改革的两大败笔（广场镇压、创造中国改革大毒瘤权贵资本家），就在他做了太上皇之后。

我们只看如今的一班人怎么代表“先进文化”吧。(7/18/2002 19:22)

〖中美撞机一周年〗戴晴："革命英雄主义"反思

戴晴

时光飞逝，中美飞机在南海上空擦撞，不觉已经过了一年。

随着布什两度"顺道"访华，两国间感觉上又亲热起来——当然主要不是在价值而是在利益上。

一年前义愤填膺，网上、台上骂得昏天黑地的两造，还记得这周年日子么？如果偶然想起来了，胸中之气，还那么鼓荡着不吐不痛快么？

一年之际，定有许多人从多方面、多角度议论这不算大也不能说小的事件："战略夥伴"关系？技术较量？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公众知情权……等等。我想就这事说说的，却是"革命英雄主义"——这个几乎主导（或者说强势诱导）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幻象。

我觉得，在这次事件里，最冤的莫过于王伟了。

王伟何许人？职业军人、1999 年的海军航空兵中队长。在"四?一"擦撞事件之前两年多来，他多次以僚机和长机的身份依照国际公约规定的距离，执行驱赶外机任务——每次都是光荣完成、安全返回。没有丝毫理由说他不懂规矩或是技术有欠缺，但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他在一年前的那个早晨，要如此"英勇"地向上靠……？如果他确切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驱赶，难道不懂庞大的 EP-3 有可能避闪不及，而避闪不及的结果只能双方同归于尽？当然这同归于尽如果按照算术计算，是不等值的：我方与敌方人员伤亡之比 1:24，两机在价格上的比差可能还要大。难道王伟会有"就算如此也值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念头？

不敢再想下去了。因为人的生命和它所牵动的亲情、伦理、价值、文化累积与影响……是不能用算术来算的。

问题于是变成：人生盛年刚刚开始、有家有室的王伟，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会有历史案卷浮出，揭露出或曾有过的研讨、命令和战斗动员；或许完全不是这样，只是我们贪生怕死平头百姓的胡乱猜测——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

只是我不认为自己的揣度是无端的。之所以这么说倒不在于我也曾是这个由党领导的"革命大熔炉"中的一员，不仅从小生活在部队环境之中，还曾经亲临一线作战部队采访——应该说，我对王伟在 2001 年春天有可能身处的氛围太熟悉了：美国新总统当选。而几十年来，就对待共产党国家而言，哪届总统不是先把"美国价值"摆在前边然后才说"美国利益"？中国这边当然不能在嘴上示弱。想来王伟部队那时候的主调必定是："纸老虎你横什么？你那区区技术吓得倒死都不怕的中国人么？"

有人这样说了——比方说教导员或是副政委——恐怕很难再有人敢做别样议论。而当上级、

长辈、或者遥远而抽象的“党中央”之类，用国家、民族哪怕集体的名义要求一名、几名或者一个战斗序列出发做贡献，我们这些被命令、被鼓动和从小被教导者，好像除了抛头颅洒热血之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如果真是出于发自心底的爱或者职业操守倒也罢了，比如六十年代那个为救火车而拦惊马的欧阳海，还有大跃进时候为阻止冒牌水泥运往水坝工地而卧轨的工程师……但嵌入我们脑海、激励我们按照组织系列冒险犯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以我自己的经验，多是政治行为，而非道义冲动。

就算王伟在一年前的那个早上怒火万丈，这火也是政客一手点起来的。就算他对两架飞机的性能和擦撞之后的结果有充份的估计，也绝无可能在他的战友当中充份表述。他唯一的选择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以革命英雄主义对付来犯之敌——哪怕在严格的界定下尚不属于“来犯”。

“英雄主义”，或者说逞强好胜，本属于一种个人风格。但若被冠以“革命”二字，任凭执掌权势的人以自己控制的全套资源和机器，平日对公民强行灌输，情势紧迫时垄断封锁消息，最终达成治下子民任凭驱赶、志愿效命的结果，我以为，是很不公正的。

一年过去，王伟案例当中的重要细节，至今尚未十分明朗。但我们知道董存瑞、黄继光，知道“最可爱的人”，知道 1940 年代后期，东北的“翻身农民”怎么抛开刚刚到手还没捂热的黑土，为“三大战役”赴死；而“雄赳赳、气昂昂”地倒在朝鲜冰天雪地里的英雄，恐怕没人知道金日成的野心为什么会得到斯大林、毛泽东的纵容，更没有人能想象，他们拼死捍卫的，竟是一个半个世纪之后依旧百姓饥不果腹、“位子”父子相传的政权；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越战里，那些舍身滚雷的战士，谁会想得到转眼间敌方首脑（“尊敬的越南贵宾”），竟会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客？

有句老话恐怕王伟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真是世世代代，我们中国人以伤感与无奈，道出谁都明白但似乎谁都改变不了的铁律。到了近世，大家都已经知道没有谁天生比别人高贵、也没有谁天生比别人低贱，一拨又一拨为一将之功业给送上死路的青年，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呢？

毋庸讳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这艰难倒不完全在于我们还没有权利选择廉洁智睿的政治家，没有权利就重大问题发言、对重大决策发挥影响，而是自己还没有完全解放，还在为“民族荣耀”讴歌成吉思汗或者康熙，还不大明白生命的庄严不在英雄主义，更不在太容易为政客所用的革命英雄主义，当然也不在于眼下大流行的犬儒主义，而在于心灵的自由与理性的思索。

（VOA）(4/2/2002 14:0)

三峡工程:中国经济和电力工业的大倒退

帕特瑞夏.亚当（Patricia Adams）

经济学家、"国际调查（ProbeInternational）执行主任

格瑞恩.瑞德（Grainne Ryder）

水资源专家、"国际调查（ProbeInternational）政策研究主任

戴晴提供

三峡工程有一系列严重后果，如近 200 万人要被迫迁离故土家园，600 公里长的库区将淹没十万公顷宝贵的良田和 1,300 余处文化古迹，还会导致长江流域难以预料的生态环境破坏。其实，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后果还远不止这些，这一工程将损害中国的电力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目前，由于技术的快速进步，在世界各国的电力市场上，与更清洁、完善的电站相比，大型水电站已经过时，而且其电价也过于昂贵。中国在改革中下放了能源生产控制权并允许私营机构发展能源生产，这使三峡工程及其他水电站面临着其他能源电站的竞争；同时，政府在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大大减少了电力需求，使得上述竞争更为激烈。除非国家强令电力用户使用三峡电站的电力、或者补贴这些用户，不然，三峡水电站这一在毛的中央集权时代提出的大型建设项目恐怕会濒临破产。三峡工程将可能是中国多年来代价高昂的大坝建设热中的最后一个、最具灾难性的工程。

三峡工程将收不抵支

目前发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已使三峡工程这样的超大型电站项目变得象现代"恐龙"。自 1994 年开工以来，这个工程预计将至少耗资 300 亿美元，平均每千瓦装机能力投资 1,650 美元，且需历时十年才能竣工。由于规模庞大，其技术和施工组织过于复杂、处处有待试验、且难以估算成本。[1] 据一家在中国经营发电厂的美国公司的经理说，三峡工程"就象美国的核试验项目一样，会永远进行下去，会耗尽这个国家的所有投资，但在三十年内却发不出任何电来"。他认为，三峡工程每千瓦装机能力的最终投资将至少超过 2,000 美元，因此整个工程将至少耗资 360 亿美元，"这样昂贵的投资使得其电价根本不具竞争力"。[2]

能源专家们认为，大型水坝成本大、效益差、投资过高、运行质量差。[3] 1998 年，华盛顿的能源政策研究机构（Batelle Memorial 研究所）、中国的北京节能中心及能源研究所的合作研究表明，若不考虑输、配电成本的话，中国的水力发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 6 到 7 美分，比天然气发电（4 美分）、新型燃煤发电厂（4 至 5 美分）都高，仅与核电的成本（至少 7 美分）相当。[4] 实际上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将高达每千瓦时 8.4 美分[5]，这还不是其最终成本，因为输电和配电成本还未包括在内。其成本之所以如此高昂，一是工程的庞大规模实属罕见；二是中国现有的输电系统落后过时、又不可靠；三是因为四川和湖北省的地方输电网与全国性电网隔绝，中央政府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再投资 300 亿美元才能把这些地方性电网与全国电网系统连通。[6]。若算上这些投资，三峡电站的电力成本将大大超出每千瓦时 8.4 美分。

即使其输电网达到了目前的工艺水平，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也可能是不稳定的。首先，水库管理人员为了发电而调控水库水位时会面临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维持长江的正常通航，就

需要在库区内保持高水位；而为了蓄洪的需要，又必须把库区水位降低以便准备接纳汛期的洪水。[7] 他们可能面临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提前收回发电成本、还要降低库区水位以便蓄洪。其次，水库中将淤满沉积物和砾石，其发电和蓄洪能力将因此下降。三峡大坝下游的葛洲坝水库，就是因为库区里沉积物和砾石日益增多，建坝七年后库容量就仅剩下一半了。[8] 最后，电站建成后，长江水量的季节性和年度性变化、电站运转中的难度、以及为了维修而停运等因素，都会使电站的发电量大幅度波动，从而影响电站的收益，也使其电力用户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之类问题。

三峡电站的电力没有市场

其实，三峡电站开始运营之前就已面临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即它提供的电力并无买主。1998 年，随着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停产或关闭，电力需求急剧下降，许多电厂都已限产。[9]为了改革负债累累的国有部门，自 1998 年以来，中国政府已陆续关闭或转卖了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远东经济评论》把这一举动描绘成“自毛泽东五十年代推行工业国有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转让国有工业资产”[10]的私有化浪潮。针对 1998 年的这一情形，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在中国大陆正发生的事简直不可思议:过去几十年来，能源短缺一直限制着工业的发展，经常断电给用户们带来种种不便；然而现在，这个国家的能源却越来越过剩了”。[11]

美国的一家咨询机构“剑桥能源研究会（CERA）”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能源过剩不仅源于经济结构调整，还因为中国的电力部门过度膨胀。[12] 在九十年代，中国曾以每年新增一千万千瓦的惊人速度增加其发电能力，而同时从 1995 年开始对电力的需求就在不断下降[13]。CERA 的这份报告还指出，当新的发电厂投产后，本应关闭那众多小规模、低效率的发电厂，而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关闭那些它们投资所建的发电厂、更不愿意负责安排这些企业的冗员”。[14]

大多数工业专家都认为，两到三年内电力还会过剩，至于以后的情势就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地改革其负债累累的国有部门了。[15] 由于供电能力不断扩大，而电力需求却不断下降，负责为三峡工程预算提供相当大部分资金的葛洲坝水电站在 1998 年就面临售电难的问题，这将使三峡工程的资金更形短拙。[16]。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还报道说，由于电力需求不足、难以出售电力，位于三峡上游长江支流上的全国最大的二滩水电站现在的实际发电量仅及其设计能力的一半，因此，二滩电站 1999 年将亏损 1.2 亿美元以上[17]。拥有三千万人口的重庆市原是二滩电站预想中的最大用户，1995 年重庆市曾同意购买二滩电站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但现在重庆市却拒绝再购买那么多电，宣称只需要二滩电站发电量的 14％。[18] 其原因是，重庆市的领导们认为，二滩电站的电价（每千瓦时 6 美分，还不含输、配电成本）实在是太高了[19]，重庆市完全可以从当地的水电站和火电厂获得更便宜的电力。在这个考虑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即重庆市最近已脱离四川省而成为直辖市，它现在更关心如何照顾辖区内的本地发电厂，因为它需要从这些发电厂征税以维持财政开支。据《金融时报》报道，二滩电站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明年该电站的六个涡轮发电机中的最后两台安装完毕后，电站的装机总容量可达 330 万千瓦后，他希望这可使电站的亏损大幅度下降[20]。

主管三峡工程的官员们他们信心十足地说，一旦输电系统改造完成后，三峡电站的电力就可全部售出。比如，三峡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就表示，“我们不担心三峡电站的电力没有买主，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大得很”。[21] 中国的电力供应的确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约六千

万农村人口至今还没用上电，全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也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2] 但对三峡电站的真正威胁其实不在于电力市场有无潜力，而是来自新的能提供更廉价电力、更少污染的电厂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可能根本动摇三峡电站的生存基础。

三峡电站今后不具竞争力

到三峡电站完工的 2009 年，中国将出现新型的私营电站，为用户提供低价、少污染、更可靠的供电服务。2000 年 1 月 1 日，中国的电力市场要开放竞争，这有利于新型高效能的组合式循环电站的发展，因为它投资回收快、散热少、成本低、供电可靠[23]。

这种组合式循环电站具有许多经济和环保方面的优势。[24]它比常规发电站消耗燃料少、热能及电力转换率高。常规的发电站（不管是燃煤、燃油、燃气还是核能）都是使用蒸汽涡轮机，只能把燃料热能的 30％到 33％转换成电能，而其余的热能则被当做废热排放到大气中或循环冷却水体中。但新一代的燃气涡轮机可以把燃料热能的 40％转换成电能，若与蒸汽涡轮机配套使用（这样就成为所谓的组合式循环发电设备），那么，燃气涡轮机产生的废热可用来驱动蒸汽涡轮机，从而产生额外的电能，因此，组合式循环发电厂的燃料热能转换率可以提高到 50％以上。如果从组合式循环电站排出的所有余热再用于使用蒸汽和热水的系统（即所谓的余热发电过程），这样的电站的热能转换率可达 60％至 90％。由于它的燃料利用率高，其电力的价格自然就低，所以，世界上许多成本意识强的大型用电厂家都在装设它们自己的燃气涡轮机，以便降低电力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又提高效率。[25]

组合式循环电站通常以天然气为燃料，因为天然气比其他液体或固体燃料燃烧得更充分，而且不象煤那样含有重金属或含有导致酸雨的硫。实际上，与利用最新的污染控制技术的燃煤电厂相比，天然气在燃烧时基本上不会释放二氧化硫或别的什么物质，比燃煤释放的一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分别少 90％和 60％。

组合式循环电站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它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机运转或关机停运，因此非常适合用来满足周期性的用电高峰时的电力需求，即使电力市场上的需求不断波动，这样的电厂也照样可以盈利。但三峡电站就无法这样运行，由于在水库管理上不得不兼顾发电、防洪和航运三方面的冲突，所以它每年只能有一半时间满负荷运转。而组合式循环电站就不会面临这种水电站通常无法避免的发电与其他需要之间的冲突，它的燃气涡轮机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与蒸汽涡轮机一起运行、以供电或电汽并供。

对那些需要大量电力以及需要大规模供暖、制冷的用户来说，如炼钢、造纸、医药工业、制糖等企业以及大学、医院和购物中心等，组合式循环电站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选择。因为，这样的电站建筑在电力用户所在地，不需要长距离输电，所以可以降低电价，同时还可以避免从位于人口稀少地区的大型电站向远距离外的用户输电时发生的电能消耗。组合式循环电站也可随时并入已有的电网，从而向某个城镇、甚至一个具体的单位（如一个工厂、一栋住宅楼、一所医院）输电。筹资建设组合式循环电站容易得多，因为从安装、开始发电、到取得收益只需要九个月至两年，所以资金回收很快。与此相比，建设一个大型火力电厂需要五到七年，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平均需要七到十年，而三峡电站预计要用十七年才能建成。

因为组合式循环电站可以小规模发电（从 1 千千瓦到 5 万千瓦、10 万千瓦或 30 万千瓦）而盈利，所以，建造大型电站和配套的远距离输电网已不再具有任何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如

推广组合式循环电站，则发电设备可以分散建造、分散投资，电网的配电损失也可基本避免，每个社区和工厂都可以为自己发电。采用标准化的小型组合式循环电站后，电力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需要逐渐增加装机容量，从而得以避免发电设备空转所造成的浪费，还可避免修建大型电厂后出现发电能力过剩的风险。[26]

目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组合式循环电站已取代火电和核电厂，可望在新世纪的电站市场上占据优势。中国至今尚未建造国产的组合式循环电站，但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放松了对电力工业的集权管理，已准许各地通过与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合作引进这一类设备。在过去十来年中，广东省由于电力需求迅速增长、已让一些私营发电厂建造了组合式循环电站，这些电站在使用管道天然气之前采用柴油、高炉煤气等替代性燃料；如给佛山市供电的沙口电力公司使用的就是瑞士的 ABB 公司安装的 28 万千瓦燃油组合式循环电站，为此项目融资的是一家香港银行。[27]这家 ABB 公司还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提供了使用高炉煤气的 15 万千瓦组合式循环电站，使宝钢获得了所需的电力和蒸汽。[28]美中两国的能源专家们估计，到 2020 年中国三分之一的电站就可用国产的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燃气轮机发电，并开发出成本低廉的天然气资源，届时这样的电力价格可望比燃煤发电的价格还低。Batelle 研究所的报告认为，“若中国能在市场化和体制改革中结合应用新的勘探技术，将可迅速增加民用、工业用和发电用天然气的供应”。[29] 一旦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比较充足了，象 ABB 公司这样的发电设备公司都期待着为中国这个新兴的组合式循环电站市场提供设备。[30]

要降低燃煤污染的温室效应，三峡电站并非最佳选择

三峡工程的推动者们声称，三峡电站有助于减少燃煤污染。实际上，三峡电站最多可能减少中国燃煤量的 3％，因而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5％。（见表一）。根据美国 Batelle 研究所、北京节能中心和中国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在中国的电力部门中控制燃煤废气排放的温室效应之最经济的途径，就是装设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31] 试想，如果把三峡工程 300 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由此而减少的燃煤量至少是三峡电站可减少燃煤量的两倍半，而且还不必花钱移民、保护环境及长距离输电。[32]

1996 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和中国国家计委的一项研究认为，余热发电这种利用废热发电或供热的方式值得推荐，这是减少燃煤电站造成的酸雨和环境污染的最经济的选择。而旧式的燃煤电站和锅炉可通过翻新改造用于余热发电，这样只花费新建电站投资的三分之二，因为可缩短建设工期并节省初期投资。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们发现，中国的 45 万个工业、商业和民用锅炉每年消耗四亿吨煤，是三峡电站全负荷发电后可能替代的燃煤量的八倍。[33] 因此，如果仅把四分之一的锅炉翻新改造用于余热发电，那就可以利用同量的燃料、每年增加供电量 800 到 900 亿千瓦时，这相当于三峡电站的全年发电量，但锅炉翻新改造只需花费三峡电站投资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人员们还发现，在钢铁、化工、造纸、橡胶、纺织、印刷和印染工业，有大量的锅炉可经改造而用于余热发电，如果这些潜力得以利用，每千瓦余热发电能力的平均投资低于 1,200 美元，比三峡电站每千瓦发电能力至少 1,650 美元的投资额低得多。如果全国上千个城镇中有一半都能安装这种小规模的余热发电设备，就能产生 500 到 600 亿千瓦时的电力，那就比三峡电站的设计发电能力还多一半以上，足以满足这些地区全年的供暖和制冷需要。[34]

表一 燃料类型和发电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的比较表

能源类型

(a)发电方式

(b)供热方式

燃料效率

（%）

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供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排放量减少率（%）

1

(a)燃煤蒸汽锅炉

33

1000(2)

–

1830

以此为基数

(b)燃煤锅炉

75

–

880

2

(a)90%电力由燃煤蒸汽轮机提供

10%电力由三峡提供

33

900

–

1780

5.3

(b)燃煤锅炉

75

–

880

3

(a)燃煤的余热发电机组

（电与热的产出比为 1/2）

80

1238

–

1238

34

(b)依靠余热发电机组

–

–

–

4

(a)组合式循环余热发电机组

50

330

–

718

62

(b)燃气锅炉

85

–

388

5

(a)燃气余热发电机组

（电与热的产出比为 1/2）

85

582

–

582

69

(b)依靠余热发电机组

–

–

_

目前在中国，人们已普遍了解到，翻新改造燃煤的火力电站、工业锅炉及高炉、以采用余热发电具有优越性。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们注意到，1986 年在荆州安装的余热发电站不仅缓和了当地的能源短缺，而且减少了 115 个燃煤锅炉，从而将二氧化物和粉尘的排放量分别降低了 32％和 48％。[35] 耗煤量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煤炭开采和洗选量的减少，这又可进一步减少了煤炭开采及洗选对土壤的腐蚀和对水的污染。

在北方地区中央政府已陆续建造了约 370 万千瓦的余热发电站，以提供工业蒸汽和民用供暖。在过去的五年中，大型的华能电力公司已在北方建造了三个大规模的余热电站，并且正在北京附近建造一个装机容量为 30 万千瓦的余热电站。目前，在中国的各工业部门中，石油冶炼、大型化工、食品加工、地区供暖等行业已开始采用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以上的余热电站，制糖及工业小区则采用中等规模的从 2.5 万千瓦到 10 万千瓦的余热电站，而在化工、纺织和造纸工业工业里使用的是 2.5 万千瓦以下的小型余热电站。[36]

中国电力工业的现代化

根据 LawrenceBerkeley 实验室的研究，私人投资者们一向不愿意在中国投资建设余热电站，因为，中国目前受政府控制的电力和供热价格过低、无法补偿生产成本，私营电站会与垄断的国有公用事业发生冲突，而且，向电力生产者征收的并网费、应急设施费、以及三峡电站建设税也相当高。因此，这项研究认为，中国需要制定新的能源政策，以便独立于国有公用事业的电力供应者能按公平的价格收费。[37]

Batelle 研究所 1998 年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在兴建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不利于私人投资者的一系列障碍，如人为地把天然气价格压得很低、防碍了进一步勘探天然气以及发展天然气供应设施；在开放租赁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区时偏向国有企业，已开采天然气的分配不适当地照顾特定的工业部门等。Batelle 研究所认为，“市场化改革最有利于调整能源政策”，他们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目前改革官僚机构的有利时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许多国家，能源生产部门内的竞争已越来越普遍，因为竞争能降低价格并有效地配制资源。中国也应考虑在电力部门引进竞争”。[38]

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按照这些建议迅速开始了电力工业的现代化努力。在 1998 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工业部）总经理高岩宣布了政府的计划，即要从 2000 年开始在电力工业中引入竞争机制。他说，电力工业令人头痛的现状是，“过多地依赖煤炭、能源利用效率过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农村地区缺电严重”，而利用高效能、低污染的新一代发电技术，是中国电力系统现代化的重要一环。[39]

1998 年国家电力公司开始关闭那些效能最低、污染最严重的燃煤电厂，并且计划关闭东部地区过去二十年内建造的所有的小型燃煤电厂，以便为新型电厂开拓市场。中国的《经济日报》报道说，去年已关闭的旧式发电设备达 300 万千瓦装机容量，今年至少还要关闭 200 万千瓦。国家电力公司还宣布，今后三年内暂停投资建设新的燃煤电厂。[40]

为了增加天然气可供量，中国政府调整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政策，以增加投资、使得

2010 年的天然气的产量能提高到现在的三倍[41]。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已建成天然气管道，四川省和陕、甘、宁地区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42]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今年宣布，到 2003 年该公司将投资 30 亿美元，用于天然气的开发、供应、铺设管道和燃气电站的建设，以供应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地区。[43] 改革中的分权趋势也有助于使中国尽快转向利用先进、清洁的能源技术。一些市政府已经通过了地方性法规，禁止在本地使用燃煤设施。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和沈阳市都制定了计划，准备逐步淘汰燃煤。[4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上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的兰州，最近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签约，准备合资改造现有的燃煤电厂，代之以燃气涡轮机，并新建第二座组合式循环电站。今年浙江省杭州市宣布，准备利用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的资金，建造一座 10 万千瓦的余热发电厂，以便为该市提供新的中央供热系统，这个新系统每年可减少燃煤 20 万吨，这样将可减少有害的污染排放、关闭许多热能效率低的燃煤工业锅炉，从而有利于改善该市的环境。[45]

中国明年开始实施的新政策将要求城市和省级的电力公司（原电力工业局）在进入国有的输电网这方面与私营发电厂竞争。[46]仍维持国有制的输电公司从发电企业那里选择购买价格最低廉的电力去销售给用户；任何一个电厂的售电量都将不得超过全省供电量的 20％，而每个省则至少要有五至六座独立的电厂；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渡阶段，将允许各省的输电公司与电厂签订五年的合同，以固定的价格购买电厂发电量的 80％。但是，从长期来看，将不再签署省输电公司与私营电厂之间由政府保障的合同，否则这样的合同会鼓励私营电厂过度扩张以及电价居高不下。

为了促进竞争和降低电的成本，还将向更准确地反映实际成本的定价体系过渡。根据中国新的“电力法”，不久生产者将有权按照“合理成本、合理利润、税收和费用”的原则向顾客收费。[47] 中国政府还计划把发电成本以外的输电成本也计入电价，这样当地的电厂将比远距离供电的电厂具有成本优势。[48]

中国当局辩称，建三峡大坝是为了防洪

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三峡电站将很难在中国即将出现的竞争性供电市场上找到用户。于是，三峡电站的鼓吹者们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应付关于三峡工程作为一个发电站既不经济、技术又过时的批评，改而夸大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的水电部门正“极力以防洪为理由、试图建造更多的大坝和水电工程”。[49] 事实上，建设三峡大坝的最初构想就是为了防洪，但经过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以及苏联专家们的长期讨论，中国政府在 1958 年做出的结论是，仅以防洪为理由还不足以构成三峡工程动工的依据；于是，三峡工程的计划者们又重新设定这一项目的目标，变成了兼顾发电、航运和防洪。[50] 1954 年的长江洪灾造成了三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于是毛泽东就誓言要加快上马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主要鼓吹者李鹏也和毛泽东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当中国发生洪灾，他就会出来反复地为这一工程说项。[51]三峡发展总公司董事长陆佑楣也使用了类似说法，即 1998 年的长江洪灾“证明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是正确的”。[52]

但是，海内外的批评都警告说，三峡电站的决策者们一直贬低更为经济有效的防洪减灾措施，从而大大地夸张了大坝的防洪功能。[53] 已退休的前水电部高级工程师陆钦侃认为，若谈到控制三峡下游长江的六条主要支流引起的水患，三峡大坝显然“毫无功用”；而在三峡上游的长江河道，“因为三峡水库的淤积和蓄洪的影响，三峡大坝将提高重庆段本来就很高的长江洪水水位，结果，四川的洪灾将更为严重”。在防洪问题上，无论是要降低三峡上游地

区的洪水水位，还是要减轻三峡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都应当更重视如何利用长江中下游的分洪区和湖泊来分洪，而不是依靠三峡水库蓄洪。[54] 其实，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们都不赞成中国政府那种倚重大坝来防洪的策略，因为他们确信这样的策略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因为，引起长江洪灾的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以及长江中下游传统的分洪区内的湖泊面积因河床淤积、土地开垦和盲目发展而减少了 1.3 万平方公里。[55] 对三峡工程持批评意见的观点认为，要让长江流域的民众免于水患侵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巩固和改进堤坝河床、划定分洪区、将分洪区的经济发展纳入规划、加强洪水检测和予警系统等。[56]

三峡电站将陷入"致命的螺旋式下栽"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也将是燃气电站、组合式循环电站以及完成更新改造的电站发电成本的两到三倍。由于困扰三峡电站的技术问题、以及因发电与蓄洪、航运的冲突引起的水库运转困难，将影响其发电能力；进而使用电大户离开这个国有的供电系统，而另行寻找廉价的、独立的供电来源或干脆自行发电；这又会迫使三峡电站把其昂贵而又日益上涨的成本分摊到剩下的用户头上，所以，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很可能比以上所说的还要贵。由于便宜的发电技术日益完备，三峡电站遇到的这种被称为"致命的螺旋式下栽"的现象，其实在世界各地也使许多电力公司面临破产的威胁。[57] 那些已建成了不经济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的电力公司，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搁置成本"，这样的成本指的是，当消费者们选择了更廉价的电力时，那些高昂的、尚未收回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建设成本将再也无法从用户那里得到补偿了。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一旦供电市场开放竞争了，如何消化这些"搁置成本"。专家们估计，仅仅在美国，电力工业的此类"搁置成本"即高达 2,000 亿美元，在向市场定价和竞争过渡的过程中，许多还维持着昂贵的发电设施的电力公司将面临破产。[58]

三峡工程的官员们至今未说明，将来三峡电站的电价到底会多高；他们也没说明，三峡工程的防洪和航运收益到底有多少。同时，究竟政府将如何摊派修建配送二滩和三峡电站电力的庞大网路的费用，迄今仍一无所知。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前说，新的输变电系统的建设成本将不影响电价，但据《中国日报》报道，输电系统建设成本的日益上涨"已成为对政府的一个难以应付的挑战"。[59]

如果三峡建设总公司试图把三峡工程的全部成本都摊到用户头上，那么，三峡电站就不可避免地因"致命的螺旋式下栽"而破产。若要避免这样的结局，中央政府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禁止竞争，强迫用户购买三峡电站的电力，从而把三峡工程过高的成本强行转嫁给用户。另一种是，政府必须用各种办法补贴三峡电站的电价，比如，把建设三峡工程所欠的巨额债务勾消一部分，改为由别的国家机构或政府银行来承担。[60] 例如，《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便消化四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其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这两大银行都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借贷者。[61] 如此行事，中国的纳税人最终仍然要为政府的投资决策错误付出代价。

无论由谁来承担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是电力用户还是纳税人，中国的经济都将因建造这个大坝的错误而承受严重损失。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都一致认为，三峡工程是可以被终止的，而且也应该被终止。中国政府应当负责减少三峡工程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断当断，此其时也。

----

[1] 到 1998 年，中国政府已短缺 30 亿美元的三峡项目二期工程资金，据新华社报道，弥补这一资金缺口的主要办法将是提高电价。据合众国际社 1999 年 8 月 17 日报道，三峡工程通过发行 H 股筹集到了 35 亿元资金以补缺口。由于政府运用财政预算内外的各种手段为三峡工程准备资金，如免除葛州坝电站财政上交任务、把它的收入直接转给三峡工程使用，为三峡工程对用电户额外征税，提供政府出口信贷为三峡工程进口设备（如从加拿大和瑞士进口涡轮机组、从德国进口输电设备）等，中国的电力用户和纳税人现在正在为三峡工程支付建设费用。中国发展银行每年还为三峡工程提供 2 亿元贷款，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各自为三峡工程提供 4.82 亿元贷款（见《南华早报》，"三峡工程增加投资"，1999 年 7 月 27 日;《中国日报》，"ICBC 帮助三峡地区"，1999 年 6 月 29 日。

[2] Chad Rademan, "Three GorgesBefuddles Financie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June 1995.

[3] Guo Yuan and Jeff Logan et al., China'sElectric Power Options: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sts(Washington, D.C.: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June 1998), p.vi; PatrickMcCully, Silenced Rivers: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Large Dams (London andNew Jersey: Zed Books, 1996), p.220; Amy Koch, "Playing the ElectricityMarket," 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 December 1996.

[4]参见注[3]Guo& Login 一文，第 82 页。

[5] Batelle Memorial 研究所的 Jeff Logan 根据以下假设计算了三峡电站的电价:300 亿美元的投资或每千瓦装机容量投资 1,650 美元，建设周期 9 年，利率 12％，发电能力利用率 53％，每千瓦时电力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为 0.5 美分。

[6] "China's Transmission andDistribution Market," Financial Times, Asia Intelligence Wire, 4/23/1999.

[7] Dai Qing, "An Interview with LiRui," in Patricia Adams and John Thibodeau (eds) Yangtze! Yangtze! (Londonand Toronto: Earthscan, 1993), pp.125-8.

[8] 同上，第 128 页。

[9] Andrew Taylor, "Power ProducersGet Their Fingers Burned as Asia Loses Steam," Financial Times, 10/1/1998;James Harding, "Economic Slowdown Takes Steam out of Chinas Once-BoomingPower Industry," Financial Times, 8/4/1998.

[10] Kathy Wilhelm, "Out ofBusin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18/1998.

[11] "Surplus Sparks Power Problem,"\TimesItalic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28/1998.

[12] The 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Associates (CERA) Report, not publicly available, was quoted

by Harding in"Economic slowdown."

[13] "Sweet Power Play TurnsSou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18/1999.

[14]参见注[9]Harding 一文。

[15] Mark ONeill, "PrivatePow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18/1999; Taylor, "PowerProducers"; Harding, "Economic Slowdown."

[16] "Power Sales Will be no Problemin China," China Business Information Network, 10/22/1999.

[17] "China's Power Tiger Bows toMarket Law," Xinhua News Agency, 9/3/1999.

[18] "China Industry: ElectricityWithout a Market,"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6/23/1998.

[19] 出处同注[11]。

[20] James Kynge, "Power ProjectProblems at Ertan Power Station Bode Ill for Giant Three Gorges Scheme,"Financial Times, 10/29/1999.

[21] "Three Gorges Dam Official Seesno Problem Selling Power," Xinhua News Agency, 10/21/1999.

[22] "CIGRE: Leading the Way to theFuture," 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World, November 1998; "ThreeGorges Dam Official Sees no Problem Selling Power."

[23] "China Power Generation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arket," Financial Times, Asia Intelligence Wire,3/15/1999. 这一新的规定将从上海市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浙江开始实行，四月接着在北方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实行。见"China Power Sector to Allow Competition," Jan 1, ChinaOnline, 10/25/1999; "China to Restructure Power Industry,"Agence-France Presse, 10/24/1999.

[24] Christopher Flavin and NicholasLenssen, Power Surge: Guide to the Coming Energy Revolution (New York and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4), pp.99-101.

[25] "General Electric, a Leading Manufacturerof Combined Cycle Plants, Has Installed 35,000 MW Worldwide." 关于组合式循环电站的介绍请看网址 http://www.ge.com/powergeneration.

[26] Thomas R. Casten, "ElectricityGeneration: Smaller is Better," The Electricity Journal, December 1995,and "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re Close at Hand," Knight RidderTribune, 1/27/1999.

[27] "Foshan: A Fast Track CombinedCycle for Guandong," Turbomachinery International,

March-April 1995.

[28] "KA References: Combined CyclePlants," ABB Power Generation, Switzerland, March 1998.

[29] "Batelle Report: China Needs MoreEnergy Technology," Ba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Press Release, 1998.

[30] "Conversation with MartinHajnoczky, Senior Area Manager, GT and CC Power Plants," ABB PowerGeneration, Switzerland, 6/4/1998.

[31] 出处参见注[3]Guo & Login 一文，第 83 页。

[32] Fuqiang Yang, D. Xin, M.D. Levine, andJ. Naeb, Co-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Market Potential in China (LawrenceBerkeley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May 1996),p.55.

[33] 同上，第 54、55 页。

[34]同上，第 54 页。

[35]同上，第 48 页。

[36]同上，第 14 页。

[37]同上，第 5、53、56 页。

[38]参见注[3]Guo & Login 一文。

[39]参见注[22]"CIGRE: Leading the Way to the Future"一文。

[40] China Online 的报道；以及"Power SectorCompetition," Xinhua News Agency, 10/25/1999; "China: Reform Set forPower Generators, Distributors," China Daily, 10/24/1999; EconomicDaily(Jingji Ribao), 1/25/1999.

[41] "China to Build First UndergroundGas Storage Facility," Xinhua News Agency, 10/29/1999; "China PlansMassive Gas Production Next Century," Xinhua News Agency, 10/25/1999;"China to Boost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Xinhua News Agency,10/20/1999.

[42]"Chinas Oil Sector Surges Ahead," Xinhua News Agency,9/10/1999.

[43] "Shell Invests $3B for GasDevelopment in China," Xinhua News Agency, 9/30/1999.

[44] Seth Dunn, "Grip on Power,"Worldwatch, September/October 1999; "China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of GasIndustry," Xinhua News Agency, 9/27/1999.

[45] "Siemens to Build Gas-Fired PowerPlants in Gansu," Xinhua News Agency, June 9, 1999; "Japan Bank FundsCHP Plant in Hangzhou," China Daily, 10/20/1999.

[46]参见注[23] ChinaOnline、以及注[40]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报道。

[47] Financial Times, Asia IntelligenceWire, 3/15/1999.

[48]"Landmark Power Line Loan," Power in Asia, 4/6/1998.

[49]出处同注[11]。

[50] Margaret Barber and Grnne Ryder,"Damming the Three Gorges: 1920-1993," in Margaret Barber and GrnneRyder (eds), Damming the Three Gorges: What Dam Builders Don't Want You To Know(London and Toronto: Earthscan, 1993), pp.3、4.

[51] "Three Gorges Founder Says DamWill Prevent Flooding," 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October 1998.

[52] Jasper Becker, "A Disaster Bornof Progr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15/1998.

[53] Philip B. Williams, "FloodControl Analysis," in Barber and Ryder (ed.) Damming the Three Gorges,p.114.

[54] Chen Kexiong, "Interview with LuQinkan, The Limited Benefits of Flood Control," in Dai, Yangtze! Yangtze!,pp.182-8.

[55]出处同注[52]。

[56]出处同注[53]。

[57]出处同注[24]，第 260 页。

[58] Koch, "Playing the ElectricityMarket," p.17; Tom Groenfeldt, "Competition SparksConsolidation," Energy & Power Risk Management, June 1996, p.25.

[59] "Power Grid Unification Will notAffect Prices," China Daily, 5/23/1999.

[60] 加州大学 Lawrence Berkeley 实验室的杨富强说，中国财政部用这种方法救助了其他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政府最近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公司，以便消化国有的鞍山钢铁公司的债务。

[61]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28/1999

三峡工程和共产党蠹虫

戴晴

近日来，贪官现形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共产党自己也喊出了“党内不许他们有藏身之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标题一出，见者无不哑然失笑：那贪官不藏在有权、有枪、有银行、有报纸电台、有老战友老同志网的党里，又藏在哪儿？只看对贪官的处置，种种关系摆平之后，第一个出来庄严发布消息、将那人送上万劫不复之途的，必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放在第一位让他痛失的，就是他的党籍。检察院的立案逮捕都在其次。

果然，继厦门华远走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后，爆出了三峡工程的两个蠹虫金文昭（音）和代兰生。前者负责三峡工程移民，贪了至少□１０亿；后者负责大坝工程，数额也不比他的同僚少。当然，这钱若与三峡工程总投资（□２０００－６０００亿）相比，不过百分之一，离伟大领袖毛主席常说的成绩错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之比，还差着十倍呐！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６７岁的金文昭，大字不识几个，１９９２年还在郑州附近一个小水库上当差，怎么不过八年间，就捞了这么一大笔。当然，是党给了他一切，从把他招到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培养，到被视察首长（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一眼相中，到得到国家和工程领导人（前湖北省长，后国家计委主任郭树言）的赏识，到三大国有银行（国行、建行、工商行）随叫随到、直到落入警察之手，还有国家机关（国务院三建委移民局）为他保释。

但中国共产党员六千万，并非个个都如此官符如火兼财运亨通。金文昭代兰生辈的好运，主要是跟对了人，进而占据要津。三峡工程不但“标志了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敬爱的小平同志”关切的工程，是绝对不许怀疑、不许批评，也不许不支持、不理睬的——更何况支持理睬（也就是拨款）送的是国家的钱，而金代辈进贡的，恐怕就不止几枚钻戒、几套住房、几部轿车了。

记得１９８０年代中，以全国政协科技组为中坚的反建派虎虎有生气，到１９８９年春，国务院不得不宣布对三峡工程的搁置。“六四”镇压，为这工程套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而光环之下，当然就是金文昭戴兰生辈的天堂了。记得当时反建派领袖人物之一林华曾说，知道为什么他们（即钱正英李伯宁等）拼了命也要把三峡工程推上去么？工程还没有开始，三个亿已经花掉了。有了工程，这三个亿融在几百亿总投资里谁也不会注意；要是上不了，他们就准备着向监察布解释这笔钱的去向吧。

“六四”之后，反建派给打得七零八落。到了九十年代，其作为已仅限于给最高当局上书，还有就是联络世界上的环境组织，防止国际资金输向三峡工程。记得笔者正为自己的毫无作为沮丧压抑之际，一位水电系统知情人打气说：“他们闹什么，不就闹钱么？没钱了还有什么闹的？”他的这番话，这回刚好为金戴辈的喽罗所证实——三峡工程经济发展公司郑州分

公司总头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是：“是个人都想着从工程里弄钱。”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是个钓鱼工程，它的总投资已经从开头的３８０亿（１９８０年代动议时），涨到５７０亿（１９９２年人大通过），再涨到７５０亿（１９９３），９６０亿（１９９４到美国化募），２０００亿（１９９６年），以及，“业内人士”传说中的，工程总管在１９９７年向当时主管财金的朱副总理招认的６０００亿。不知那位总管有没有把他麾下正肥嘟嘟地咕容着大蠹小蠹们的“好处”打进工程预算，照金文昭代兰生们这种偷法，一万亿也怕打不住吧？

今年春天“两会”召开的时候，５３位专家学人再度孜孜不倦上书，恳请三峡工程当局贯彻当年人大通过的议案，初期按１５６米低蓄水位运行，以“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在他们的呼吁中，没有说三峡工程当局为什么要违背议案这么干，也没有提到更早的另外两次对国务院（１９８９）和人大（１９９２）决定的违背，“大上快上”三峡工程。

从金文昭代兰生贪污行贿携款卷逃案件中，真相终于明了：工程有多大，钱就有多多，进度有多快，进帐就有多旺。弄钱，那不是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么？

三峡工程是“与党保持一致”原则伸缩变化的典型

1949 年之后的中国有一句最常用的话，叫做“与党保持一致”，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虽然信奉“君子不党”者会感到无法忍受。但如果一批人好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愿意结党一致行动，局外人倒也不必苛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党内独裁的国家，“与党保持一致”这一原则，就象金角大王的幌金绳一样伸缩由心：那保持一致的范围，可扩大到全体公民；而保持一致的对象，又可换为党内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特别在所谓“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事情上。

三峡工程是这一原则伸缩变化的典型。对这项会造成环境和社会灾难的工程，敢于不与“伟大领袖”保持一致的，在 50 年代只有李锐等数人（他们也已为此付出了几十年遭整肃的代价）；到 80 年代，在“改革与思想解放”的鼓舞下，出来表述自己意见的已是整整一批人，领头的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鼓舞”二字，也就是说，一旦来自党的鼓舞消失，在党性范围内有限自由动作的人也就缩了回去。记得 89 年镇压之后，原先义正词严地向三峡工程主管人发问的反对派核心人物之一林华（老共产党员，原国家经委副主任）立刻不再出声。理由是“党已经作出了决定。”

那么，在曾经由党决策的工程就要对我们岌岌可危的生存环境发生不可逆转影响时，要不要、又如何与党保持一致呢？

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 50 年代想给神女一个惊喜的时候，大家脑子里还没有诸如崩塌、污染、物种灭绝等概念。到八十年代重提三峡工程的时候，这种“改天换地”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已经摆到绝对不容忽视的地位。当时受委托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三大重镇：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给出的结论，都是负面的。科学院《生态与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更是以

科学家的诚实道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弊远大于利。就生态与环境方面而言，工程兴建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这样的结论。

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反对声音，国务院才在 1989 年春天作出“五年之内不提三峡工程”的决定。不料“六四”坦克一过，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也归于剿灭之列，“早上快上”呼声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下再起。原先的可行性结论显得太不“与党保持一致”，工程承建者水利部揽过了对可行性重新研究、重新结论的权力，表面上邀请科学院重新作过，最后偷梁换柱地给出了“利大于弊”的相反结论。从那时起直到两年前国务院换届，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包括对事实的披露），已消声匿迹。不仅政府的环保部门三缄其口，就连民间环保组织也自觉保持沉默——当然也未见他们如当年钱学森“论证”粮食亩产那样的支持紧跟。记得 1997 年前后，突然一则《中国环境报》（英文电讯）的消息说，国务院环保局认为该工程对环境有很大负面影响。境外大哗，该部门立刻否认，并严办了那名说漏了嘴的记者。

但纸里包不住火。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官员并非个个尸位素餐，“与党保持一致”也可以扩展为与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终于，在三峡工程施工高峰期，国家环保总局《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000》出台。在这份也是由政府部门发布的公报里，出现了与“政治挂帅”（当然政治大帽子底下不妨尽情贪、占、捞挂帅）者不同的声音：

“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库区一些珍稀水禽已成为短暂停留的旅鸟”；

“库区农村能源短缺，薪炭林面积和薪柴量持续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库区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增多，经济损失较大”；

“库区船舶污染事故和倾倒垃圾行为时有发生，对江水造成的污染严重”；

“库区污染治理缓慢，特别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几乎所有污水均直排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大部分垃圾向长江倾倒或堆弃在江边，给大坝蓄水后的库区水质带来重大隐患。”

此类见解并不陌生。十一年来署名和不署名的科学家、工程师一直没有停止过类似的、包括更为严重急切的呼吁；而且，平心而论，对政府环保职能部门而言，这也是他们一贯的见解。监测公报的公布，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到要害：不是他们有了新的意见，而是他们一贯的意见被允许公开发布了。这意味着什么？

看来，一直一手遮天的三建委当局恐怕对这份公报再不能像对待外国环境组织和国内的进言者那样充耳不闻了吧？闻了之后怎么样呢——移民搬迁不到六分之一，崩塌滑坡已经如此，后边还怎么移？每年数亿吨的入库垃圾（包括有毒的废矿、医院）处理还是不处理，钱又从哪里出？朱 基以总理身份过问三峡工程以来，每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监理、文物、移民、贪污腐败，靠工程捞名捞钱的主儿都软磨硬顶，这回，按照开发大西部（重庆一直宣称自己属于此列）资源环境领先的原则，想对策吧！

希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此举，预兆着 “与党保持一致”的新气象。

三峡文物古迹告急

——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戴晴

俞伟超

考古学家，楚文化及秦汉史研究学者。1933 年生，江苏江阴人，1954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61 年获该校该系硕士，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系。现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主要考古发掘成果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

陕西周原召陈村(西周)

青海循化苏志村(卡约文化)

湖北沙市周良玉桥(新石器—战国)

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郢都)

湖北宜昌县朝天嘴(新石器)

主要著作

《三门峡漕运遗迹》(1959)；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

《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1989)

▲ 大家都知道，长江三峡一带有大量文化遗存，三峡工程对珍贵文物古迹的淹没令人心焦。在对这项工程进行论证的 412 位专家中，没有社会学家、没有文化人类学家，也没有考古学家——这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这项工程实际上已经正式开工了，文物古迹怎么办呢?

□ 论证的时候是没有考古学家在场，但在今年年初，三建委(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文物局还是指定了两个单位承担三峡水库区的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一个是我们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地面以下的古迹由我们来作，地上的古迹由他们负责。成立规划小组，让我当组长。从去年 11 月起，开始安排规划的调查工作，动员了全国 28 个学术单位投入。目前，对三峡淹没地区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我们大致都有了数。先由这 20 几个单位分别制定本单位的考查规划，然后再归成一个总的，形成文字，明年 6

月交给长委会。

▲ "大致都有了数"指的什么？难道过去没数么，或是有了新发现、新认识?

□ 这几十年，一直是国家文物部门拨点钱，搞些发掘，设些管理所，作些修缮，着几个干部管理起来，适当地维修一下，卖点门票。几十年来苦苦撑持，还不错。现在情况紧急了，不能再有先放放，等有了余力再好好作的想法。

现在有了明确认识的，地上，属于世界级的文物的，在三峡地区，明白知道一处: 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时间是唐朝中晚期之后。再一处是重庆朝天门下边的灵石，也是枯水题刻，比白鹤梁还要早。枯水题刻这类古迹是世界上没有的，《全唐文》等书收录的记载，最早的是从东汉到晋，以后还有许多唐代的。再一处是云阳张飞庙附近的龙脊石，也是枯水题刻。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屈原祠，这其实是现代建筑，80 年代才建，但表达了群众的感情。此外，张飞庙是清代的，很完整。还有涪陵的石宝寨，建筑不是很古，明清时候的塔，但风景太好了，是三峡最美的一处。这些，随着工程的进展，将全部淹掉。最突出的还有一处: 在巫山县大宁河上游的大昌镇明清民居一条街，这是三峡里边最好、最集中的一批民居，朴素古老，非常好，我们希望拆迁保护。

▲ 地面以下的呢?

□ 现在，有几个极重要的线索弄清楚了。以前作了二、三十年工作，直到通过去年 11 月以来的调查，才最后明确了几个重要的认识:

① 我们都知道大溪文化，这是 5000—6000 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最初发现地点就在巫山县。一、二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希望知道大溪文化西限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再往西是什么文化?始终不明确。这次搞清楚了，西限就是巫山县的大溪。你到过三峡，应该记得，大溪一带比较平坦，再往西就是瞿塘峡。瞿塘峡很短也很陡，里边住不了什么人。一出瞿塘峡，就是另外一个文化。这一文化现在还没有名称，准备明、后年给它命名。这样，把三峡中新石器时代各时期文化分布的关系弄清楚了。

另外，搞旧石器时期的，在三峡里边找到了好几十个地点，几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准确数字还没有报上来，超过……，这都是过去一直不清楚的。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知道，三峡里边旧石器的中晚期有很多遗存疑存，甚至找到了当时旧石器制作地点。到了五、六千年以前的农业文化和捕捞文化，直至江汉平原，是一个文化体系； 瞿塘峡以西则和川东甚至川北的文化是一个体系； 找到了这两大文化的界限。这是极难得的。

② 另一个重要之点是所谓巴蜀文化。过去一直以为，三峡就只是巴文化，从 70 年代晚期以来，开始重视，湖北作得比较多，主要在西陵峡一带。到了巫峡往上，就了解得很不够。特别是，它的中心在什么地方。过去曾找了 100 多处，有的是很小的遗址。但一个文化总有中心，但在什么地方? 现在找到了: 一处是在巫山大宁河上游的河边，叫双堰塘，相当于早期巴人的遗址，有 10 万平方米，其大无比。最奇怪的是，这遗址在河滩地上，而当地的水位常有很大变化，过去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会在这里，虽然就在它的附近，在离双堰塘只有 5、6 公里的地方，出过很大的，相当于商代的、80 多公分高的大铜尊，跟四川三星堆的铜器一模一样。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双堰塘是青铜时代巴文化的一个中心。

第二，在云阳李家坝找到一处也是早期巴文化遗址，5 万平方米。约在 4000 年前，和中原文化相比，相当于夏代前后。巴人早期遗址很多，就在西陵峡里。再晚一点，相当于商代的时候，中心迁移到了巫峡一带，到了四川境内。现在见到三处最大的遗址: 除上述的双堰塘外，一处便是云阳李家坝； 还有一处巴人的中心是 忠县 井沟遗址群；再往晚，是涪陵的小田溪遗址，相当于战国末到秦朝前后，已发现了巴人王族的墓地。

按书上记载，巴人起源在五落钟离山，在长江支流清江流域。通过这一次的调查，三峡巴人文化的重要地点都清楚了，它的中心现在也找到了，就是从巫山到云阳一带: 巴人从湖北省长阳的清江流域起源，后来中心向西迁移。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湖北境内的楚人已经发达起来，她再往东进不行了，被逼着往西退，以捕鱼打猎为生。

▲ 它们是不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白鹤梁早已是。其他的，因为直到这一次才彻底弄清，正准备报批。考古学界的通识，一个文化最初的发现地本身就应该保护，象保护国家级文物一样。

40 多年来，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共发布了三批，第四批正在考虑之中。三峡区域的这四、五处，国务院还没有最后批。目前的困难是，批过之后，你就得保护。如果考虑到保护不了，连我都建议，干脆别批了。你批成国家级，明天就淹掉，何必? 当然工作我们会照样做。

▲ 这么珍贵的遗迹，只有淹掉这一个前景? 那"国家级保护"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工作照样作"，怎么作?

□ 我来告诉你怎么作。我们自去年 11 月开始制定规划。定规划是需要经费的，跟三建委谈了多次，答应给 1000 万，但到现在为止，长委只拨给我们 200 万。28 个单位，同时在三峡开展工作，最多同一天 200 多专业人员同时作业。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与古人类动物研究所，一次下到三峡 40 多人，是 1949 年建所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野外作业，而我总共才给他们 30 万元，雇船、雇人，怎么够? 有的大学老师下去，只能住 6 块钱一天的旅馆，工作非常困难。但几个月下来，20 几个单位的调查基本上已经作完了，人家是自己垫钱作的，现在向我要钱，我只好以个人名义签字向故宫借了 200 万，其实这钱长委是有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不给我们。

▲ 据我所知，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是没有专门拨款的。如果非要用，就从移民费里挤。只不知这是不是大型水利工程的通例?

□ 国际惯例，文物保护占总投资的 3%—5%。80 年代中期，加拿大的专家曾和他们一同工作过，就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总的预算是 570 亿，国家文物局按这个比例作了一个估算，大约 17 亿多，长委也承认这个提法是有根据的。两年前，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水库时，工程总预算已经到了 1200 亿，这按惯例，应是 40 到 50 亿。

▲ 这笔钱得到确认了么?

□ 最近的情况，口头传达给我们了: 整个移民经费 400 亿，这 400 亿划拨给湖北，四川两

个省来管，整个文物调查、保护、迁移都在里面了。而且口头上讲，文物保护费用，不能再考虑什么比例，顶多 4—5 个亿，以后十几年，就是这些钱，还要签合同，签了合同才可以给你钱。到现在，保护规划制定是靠借钱来作的。

▲ 400 亿里拿出 4—5 个亿，只是 1%到 1.25%，你们的工作怎么铺开呢? 要知道，阿斯旺水库的一处神庙迁移，就用了 4000 万美金。

□ 我是非常希望呼吁这个事情。最近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没有直接投入三峡工作的专家也一起来听听汇报，想办法。整个数字是 1000 多处，现在只能选作，看有多少钱。当然也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有了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组织不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来承担这种工作。

比如双堰塘，10 万平方米作多少年? 按照常规，以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要好几十年。但我们只能在 10 年中作出来，因为 10 年之后就淹掉了。上百年的工作，逼得我们在 10 年里完成，需要用更集中的人力、更充裕的经费、还要有比较现代化的手段。就说双堰塘和李家坝这些遗址，我和地球物理所商量，明年以后首先搞物探，我看过德国人对许多遗址，例如特洛伊古城，不动地面，利用物探，街道都探测出来了。把古代城址分布大致清楚了，就可以有选择有目的地发掘——我们应该这样，否则作不过来。

▲ 假设物探结果出来了，将最珍贵的东西挖掘和迁移，不要白白淹掉，时间来得及吗?

□ 绝对不够，我们只能牺牲，不可能全部发掘——没有一个国家的考古力量敢于承担 10 年里边做这样大面积的工作——只能争取损失减到比较小的限度。这还仅仅是一处，类似双郾塘这样的遗址有多少? 光巴人的就有一百几十处。楚人活动范围最西的点是云阳，这是楚文化的边缘，所以云阳的楚文化遗址是非挖不可的。不仅仅因为楚文化重要，这是它最西的遗址，作为定点的，你必须作它。现在都找到了，和书中的记载一模一样:位置、规模……怎么能白白淹掉?

▲ 这是地下发掘保存，地上的呢，立刻着手没有问题吧?

□ 古建方面共有三个的重点项目: 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如果只有 5 个亿，白鹤梁的保护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白鹤梁不可能迁，若还想看到，只有建一个水下博物馆。这还是李铁映同志在进餐当中提出来的。如果现在不肯花钱，它将永无天日。再过一百年在到水库下面去建，投资要大得多。现在已经委托天津大学作方案设计。

最早的枯水题刻，朝天门灵石，这是世界极文物，也已经从文献资料上查到了。关键的难度在于，它是在航道上，要潜水作业，必须停止航运，动一下，就是钱。初步估算，要建白鹤梁的水下博物馆，需一个亿左右。

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有两种办法，一是修一个围坝，围起来。这时要考虑的是，该址会不会滑坡，还有水的浸蚀。实在不能就地保护，就迁走。把一个塔迁到新址，技术上没问题，建筑是原物，但相同的风光山水，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 民俗方面呢，专家们一般把它称作"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 就算没有三峡工程，民俗的保存已岌岌可危。就说大昌镇，那些民居为私人所有，没有当作文物，想拆想卖，私人的事。仅仅一年，破坏速度极快。其实如果政府有钱，最简单的办法，我先把你买下来……

▲ 光买下一条街恐怕不够，他们的活动，也应作民俗记录吧?

□ 这你就太学究气。对于长江建设部门，文物保护，你有了物我才保护，民俗我不管。记录可以，属于科学研究、文化建设，地方政府出钱，我只承担淹没破坏的部分。

▲ 这个道理说不通: 你的水库工程淹没了我的家乡，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

□ 他会说: 那是我淹掉的么? 你不是物，怎么要我承担。我也承认该保护，可以，你地方政府从文化活动里开支。

▲ 我们中国政府一直持这样的态度么，1949 年以来在这块遍地文物的土地上修了那么多水利工程?

□ 50 年代，我曾经从事三门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当时也调动了几十个单位，黄委会、水利部明确表态，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经费没有问题。记得当时配合基建挖墓葬，我负责的一个工地，每月经费开支 9000 元，每张单据我签字，不必讨价还价，这笔钱在三门峡总预算里是有比例有位置的。这是由于，第一，当时体制上学苏联，如此对待文物，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国际惯例。第二，50 年代，国家的领导人，从毛到周，到郭沫若，对于把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在什么位置，是有认识的。

今天，修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我不说水利部门完全没有认识到，只是份量太轻。说句带点情绪的话，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 古代文明实际属于全人类，若非框限在中华文明，也属于全体中国人。如果钱上有困难，能不能争取海外的力量的合作，包括台港，和别的住在外边的中国人?

□ 我们专业工作者认为，可以搞些国际协作，不仅资金，人力上也可以得到一些国际支持，我们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考虑。最近，三建委办公室几次跟我们口头讲，不要外国的人，不要海外的钱。前些日子美国一家报上登了宜昌博物馆的情况，上面还来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跟外国人讲这些? "我们说，不是我们，是宜昌博物馆自己讲的。他跟我讲的是: "三峡水库我们自己都建得了，文物保护我们还没有钱吗? 文物保护不起，修什么三峡水库?"。他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三建委的基本态度:"跟海外合作，你们别开口。你们要谨慎，没有我们的批准，你们不能谈合作问题。”

▲ 如果大坝方案作些修改，比如坝高从 18 米减小到 150 米，从文物保护的角度……

□ 损失会减少。

▲ 如果工程推后，比方说，放到 21 世纪 20 年代，能不能给文物工作者比较从容的时间把不能不作的抢下来?

□ 那当然好，我们太高兴了。

▲ 其实不仅文物保护，仅从工程本身着眼，考虑到国家现在处在转型期，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建议，就算一定要上，能不能放到 21 世纪手头宽裕一点的时候，技术成熟一点的时候……

□ 因为我投入这项工作，知道一点它的情况——从我们来说，绝对希望这样。但对主管者说来，难度在于移民。开工越晚，移民越增加。现在国务院已经决定了移民费用划拨到两个省，中央不再管。之所以不敢采纳这么多合理的建议，拼命朝前赶，我猜，一个原因，再过 10 年，被迫迁移的人口要从现在的 100 万再增加几十万。那么穷，还非得干，不是没有难处。我去看过移民点，生活太困难了。新的城址，长委会都没有统筹考虑过，很多都是滑坡地。这事你全怪长委会也不合适: 规划还没到，县里已经动手，大量的钱已经投了。还有各县的征地，100 万农民是个难题，当地政府都很害怕。但另一方面，真正到农民手里的钱，还不知给克扣掉多少了。

▲ 1992 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的时候,曾有两个附加条款: 一是发现问题必须解决问题，才能上； 二是选择适当时机上。 而且，当时通过的是将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并不是“八五计划”。现在置这几项不顾，抢着上。从文物古迹保护迁移的角度，能不能说发现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就实际上已经正式开工了? 是适当时机吗?

□ 仅仅从文物角度考虑，希望推迟，放慢一点，我们的时间不够。

▲ 你们的难处提出后，三建委有没有拿出让你们觉得满意的解决方案?

□ 应该说是基本没有。目前，为了保护好三峡文物，我们先定规划，这是从 1949 年以来，我们投入力量、动员单位最多的一次: 28 个学术单位，中国考古界最有力量的机构。但到现在为止，只给了我们 200 万，这是事实，是三建委办公室开了会，责成拨出 1000 万规划费都有了，他就是不给。他们说合同签了之后，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这不过是个规划。我和国家文物局讲，缺个几十万、一百万，你别争，贴也贴了，我们保护不在这几十万、一百万，关键是把规划制定好。如钱不到位，我们定不出规划，最后时间到了，有了钱，也没有办法抢救了。最近知道的消息是给 5 个亿，如果确定是 5 亿，我们就只能根据这个数目确定作哪些事，与真正该做的比，比例相当小。

▲ 从事历史研究和考古 40 多年，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你有什么感受和期望?

□ 我觉得，经过 40 年的积累，中国今天的考古力量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把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好。说到愿望，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和制定保护迁移规划的负责人，第一，我希望三峡工程建设的最高领导三建委一定要把保护文物的事情落实，按照国际惯例行事。第二，政治上的问题，为了保护三峡的文物，可以争取一些国际支

持。从财力到人力。我个人其实是个民族自尊心比较强的人，我不愿意在这上面损失中国的脸面。现在，世界上对人类的理解超过了从前，与 50 年前比，进步太大了。今天，全世界的，特别是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仅仅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也不可以只注重本民族的发展。我们应该理解这一潮流，在文物保护上争取一些国际合作。这么做，不能说中国政府无能保护，恰恰说明中国政府重视。这个观念，希望主事者能转变一下。这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的大事。

▲ 最后想核实一个传闻。听说你已经被看做北京仅有的几个"老顽固"之一，你的紧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经把整整一层楼租出去搞销售活动去了，你还一直顶着，坚持历史博物馆不提门票？看人家大把大把进钞票，你有没有一点心动?

□ 要是非这样的话，我只能辞职。但我今天已经有点做不到了。我最近签字同意普通票价从 1 元涨到 5 元。本来我说 3 块钱我同意，5 块钱我嫌高，最后还是没有坚持住，只保住学生票价 1 块钱。我最近说，国家向老百姓收了税，要有回馈。国家博物馆就是对老百姓的回馈。1994 年 7 月

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访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 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 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曾在北美大陆驱车 45000 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 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 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 3000 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 年，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 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 年，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众所周知，您是 1957 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问： 什么叫淤积河段？黄河的淤积段不是在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就是俗称的“黄泛区”吗？

三门峡不能算是淤积河段吧？

答：三门峡情况复杂，它从孟津以上，也是冲刷的，只有在三门峡那个地方，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谓“三门”，历史上有名的秦国和晋国打仗，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黄河中游冲刷段里边插进的一个淤积段，是一个极特殊的地貌。1957 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去细究，修水利的工程师也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做好，黄河就不会有泥沙冲下来了。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温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这是因为黄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的。留洞排沙的意见本来是全体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

问：长江三峡河段的淤积类型与黄河有什么不同吗？ 凡是淤积河段都不能筑坝吗？

答：长江流域在重庆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气候关系，雨量充沛。这些水份在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后，尚有多余，势必向地势低洼处倾泻，这就是盆地中的千万条溪流和它们会聚而成的长江上游支流。几十万年以来，它们一直在冲刷地层构造质，对底层挖，掏，侵蚀，河道不断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丽的河流峡谷。火成岩石子和风化而成的泥砂随水流而下，流域地貌决定了刷下来的石子和风化泥砂全通过重庆、宜昌落到东部大陆架，沿着斜面铺下去，滑到几公里深的海底，后来的泥沙覆在上边，经过几十万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冲积平原，养活了那里 5 亿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盆地从来没有淤过。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但并不是冲涮段一概不能建坝，如大渡河上的龚嘴水库就很好。大渡河虽流域小，但水量大。龚嘴坝修了 16 年之后，被河水冲下来的石头淤满。虽然水库的防洪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坝，照样发电。 所以，上游山区，河流没有航道的需要，又不会损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过德国人考虑得更多一点，他们只修小坝，坝下都留一个大洞，将来把石子送出去。这些坝，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发电，可以调节洪水，还可以灌溉。

目前的争论是这些石头究竟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动？ 长办把可跃可悬的泥沙作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动——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所作的动床模型试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水文地理学基本原理(地貌地质形成原理)，可以分析出：这一面积上的石头都要下来，而且数量可观。这是基本知识，我就是从这里推断的。更况且我本人在 1940 年代当过两年测量队长，亲眼见过河中的石头在动。

问：这些随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砾可以测出么？ 其构成和数量随什么而变？

答：在上游是测得到的。比方说，龚嘴水库运作 16 年之后堵起来，就可以算出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冲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经测出来每年 200 万方。各个支流加起来，就是冲到三峡段的总量。原则上，淤积河段不能加，因为中间会停下来；冲刷河段可以加，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约为 1 亿吨/年。

问： 那么多技术人员研究了几十年，难道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80 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 TVA 的时候，不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 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 1934 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 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东 40 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 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 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题。

问： 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 2 公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用倒着用：坝前只有 500 到 1000 米，坝倒有 2000 米长，2 公里的坝拖着一条 600 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有 30 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 35 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 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 7 倍！真可谓荒谬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 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体只有 100 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

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 40 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 175 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当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不了四川 1/5 的面积，但就这 1/5，已经了不得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 10 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 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问：但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工程有可能中止么？ 可行性方案作了那么些年，准备工作也作了不少，这时候停止，是不是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答：我的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有的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考虑国家经济实力，我则认为凡是淤积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坝；冲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须不是航道、没有土地淹没的。长江三峡段，黄金水道，两边有 50 万亩农田，100 多万人口，还是淤积河段，在这里修坝，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不幸的是，这番道理，就是在我们学校，向我的学生讲，也未必能被接受，因为已经作了那么久，又拿了人家的钱，总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到了 1986 年，开始讨论了，我才在《科技导报》上谈了我的见解，正式宣布了绝对不能修的观点。自那时起，我一直希望公开辩论，把道理讲明。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工，坝还没有修，已经动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一些迁移，高处种了一些树，造了一些桥，没有什么害处。就算将来三峡工程不修了，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损失掉。当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损失。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黄万里遭际再显当权者的"德行"

戴晴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 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 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

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 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麼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麼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後，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著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後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 78 年开始要求，20 年过去，到了 1998 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 89 岁，才终於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於 1958 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後，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

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 张光斗。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总管为总理）亲切探视，过後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於三峡工程建设谈话的记录"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长江防洪。他说的是："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麼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後，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 135 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张光斗只有硕士学位，而今是中国科学、工程双院士。

没有人敢为黄万里正式出书。他的一本文集，是去世前夕，学生们自费筹资排印的。

记得胡适有一句话总括当权者的"德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http://www.epochtimes.com/news/epochnews/newscontent.asp?ID=123397

反对三峡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辞世

【大纪元 8 月 28 日讯】今天下午 3 时 05 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 50 年的清华大学 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 90 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於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麼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 20 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著；八十年代以後，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著。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麼？敬爱的日理万机的领导该不该听他唠叨？

1935 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 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 TVA 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 10 年。26 岁学成回国後，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 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1953 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 1957 年说， 对於"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予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克写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予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 7 天，抢著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中国高官安抚对话安徽学生结束示威

VOA

(陈苏报导 09 Jan 2003)据报导，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上万名学生星期二上街示威，要求改善校门口交通安全状况后，中共高层、安徽省以及合肥市领导人立即采取安抚与对话行动。目前学生已经返校读书，合肥恢复平静。

香港《文汇报》报导，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上万名学生星期二到安徽省政府大门示威，堵塞了合肥市重要交通要道，抗议该校人文学院英语国贸专业的三名三年级女大学生星期一晚间在校门附近遭遇车祸，造成两死一伤。合肥有关方面透露，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做出三点批示，第一严肃处理交通肇事司机，第二做好高校门口的交通安全工作，第三各高校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

副省长出面对话

安徽省一名副省长星期二下午 3 点出面与学生对话。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曾要求与学生对话，但学生说他级别不够高。合肥工大的校领导呼吁学生保持理智。最先报导学生示威的记者之一、香港《文汇报》驻合肥办事处记者李坤晖说，安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着手解决学生的主要诉求，现在合肥恢复了平静，学生已回校园进行寒假前的复习考试。

李坤晖说：“省里和市里已经拿出一个方案，在校门口的地方架设一个人行天桥，这样就可以解决校门口的交通安全问题，这也是学生最多的问题，最主要的焦点所在。”

李坤晖说，合肥工大的示威学生表示，他们示威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引起校方和政府的重视，尽早采取措施保障过往行人的安全。他说，警方星期二下午拘留了肇事司机。造成合肥工大 3 名女大学生两死一伤的是一名卡车司机，这辆带有拖斗的火车当时可能车速较快。

政府温和处理学潮

合肥工大上万名学生的示威据信是 89 年 64 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学生抗议行动。合肥是 80 年代学潮的发源地。中国作家戴晴女士当年曾经由于 89 学生运动的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她说，现在的政府对学潮的处理跟当年已经大大不同。

戴晴说：“1988 年方励之是科技大学的校长，他来处理学生诉求的问题。那时学生的诉求和今天的比有更多的社会关注，更多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方励之处理得很好。但那时有一个气氛，就是谁也不许闹事，安定团结最重要。所以方励之努力一方面正面回应学生诉求，一方面稳定形势。这样的处理当局都不允许，因为那时在反自由化。”

戴晴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被开除党籍。她说，现在历史如此相似地重复，又有所不同，令人感慨。戴晴认为，现在的学生和当年也不同了，他们更加成熟，提出非常具体的目标，那就是改善交通安全。这样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她说，问题解决后学生就回校园，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提出空洞无比的口号。戴晴说，如果那样做，就不再是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革命运动的初期，最终的目的变成推翻政权。戴晴不赞成以学生运动的革命方式推翻政权。

戴晴说："这个政权有很多问题，但是绝对不是通过一次学生运动来推翻的，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推翻，最后上来的人还是那些最勇敢的革命领袖，而且整个社会并不具备民主协商妥协的气氛，对民主没有什么贡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谈到合肥有关方面披露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合肥工大学生示威一事所作的三点批示时，戴晴说，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后特别显示出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工人、农民的关注，学生也是民众的一部份，胡锦涛也关注倾听他们的声音。戴晴说，胡锦涛的批示显示出他的温和、克制和对学生的充份理解。但是戴晴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车祸中死亡的是学生、高官、还是农工、盲流，都应当按照交通法规办事。戴晴说，官方如果为了安抚学生而把学生当成特殊的一个群体，给予特殊待遇，从而严惩这次交通事故肇事者的话，那将不是胡锦涛一直强调的法制，而是人治。戴晴说，不论是学生还是政府，都应该在具体的事件中学会怎样进行民主操作。

(1/9/2003 12:14)

为什么依旧讨厌陈水扁

大家都在等"5?20"这个日子。除了看这边的强权如何给自己的大话收场，也想看看争选票的陈水扁和争得了选票的陈水扁究竟"有种"还是没种、究竟真诚还是虚伪、究竟是政客还是政治家。

就职演讲很漂亮。可以说，这演讲如果由宋楚喻或许信良来发表，也是大致如此吧。那大体相同的言辞（和言辞后边表达的深远意义），如果出自前面两位之口，我这样的大陆人可能会感到温暖、会为之激动甚至自豪——因为世界上毕竟有一部分历 2000 年专制之苦的中国人通过和平与法制的路径走向了民主社会，证明了中国人不是天生的专制奴隶……但是，当这漂亮话从靠高喊台独而一路拼打出来的陈水扁之口发出，就让人——确切地说，让我这样的中国人——相当不舒服。

首先那句"各位亲爱的海内外同胞"。不知这"同胞"里有没有我，看起来没有。而突然间我与《汉声》、与《天下》、与慈济功德会及高雄环保斗士们就这么隔离了，很是不习惯也很难舍；接着陈总统提到的"前仆後继无畏牺牲的民主前辈们"，也不知有没有殷海光、雷震，有没有傅斯年、张君劢，有没有黄炎培、罗隆基。如果有人骂我别这么小心眼，那么当他提到"推动（台湾）民主改革"之光荣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李登辉先生过去十二年主政期间卓越政绩"，却没有了以专制而结束专制、首开党禁报禁的蒋经国？那潜台词是不是将李登辉推上"台湾民主之父"宝座垫底？

总统接着冒出“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接轨”论。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本土文化”是什么，高山原住民文化？福建漳州泉州文化？荷据时期和日据时期的“福尔摩沙”文化？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的“二二八”精神？让我弄不明白的是，就在此时此刻，用方块汉字起草这篇演讲稿、用闽腔国语演说的陈总统，从哪里和从什么时候与华人文化断了路？如此矫情，想撇清的又是什么？

再往下读，那要撇的就不难发现了，原来“因为长期的隔离，使得双方（大陆人和台湾人）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是，现今中国人无日无时不在与之抗争的党指挥枪、言论控制、四个坚持……都是我们志愿的选择和发展，而在民主的征途上先走了一步的台湾只有客客气气地划出“阳关道”与“独木桥”。好，既然如此，你就别再说什么“华人社会的里程碑”，别再引用孔孟，因为我们听众真是很难弄明白，当你把这叫做“中国人的智慧”的时候，指的是对方还是也包括了你自己。

如此表里不一、如此前倨而后恭，从好的方面看似乎是在运用政治智慧、不轻捋虎须，给台湾以安定平和，但高风亮节政治家的变通与委琐政客的翻脸是有质的区别的。“当不当中国人”成了陈水扁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的一张牌，而翻的原则和时机，只看权柄操作的需要。

这“翻”没法不让人联想起日本的“脱亚论”和“兴亚论”。脱亚论把中国人、朝鲜人、南洋人贬为劣等而它大日本卓然独立；兴亚论则一次次用来为掠夺邻国制造借口。两论看来相抵牾，实互为表里。陈水扁今天又玩起了这一手，大概是从恩师×××郎（李登辉的日本名字）那里继承的吧。

也谈春夏之交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一个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娱乐活动看起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尚属"英年早逝"的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爆发准在送葬的时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于远远地绕开那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而且谁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那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他抓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人。

"X 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 X 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后他基本上与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等着警察抓他。6 月 4 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 6 月 4 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伙互认铁哥们儿。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后来听说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二） 四月十九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胡德平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大禹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 27 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他有那么多

显赫与才华横溢的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零。

说说路东明事件？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第二，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份半民间报纸；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 4 月 19 日的座谈会。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 U 型，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 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式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 33 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二十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忍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象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 3 次。

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事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略"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总书记是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那只能说明一个现实：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来。

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

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章立凡。他对我的唐突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记下一笔。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 14 日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之手。温文尔雅的章公子呢？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到高潮。当时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 1989 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 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这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4?26 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但在 1989 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的。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名声与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我瞄住一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她何尝不知道我们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 high tea 要从 3：00 开到 6：00，时间是极具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 9：00 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的包遵信。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 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 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

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苦。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随便谈谈的题目；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铁嘴钢牙"的来打圆场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作了工作。大家。

"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 329 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自四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但我认为他此

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中共中央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居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阎明复先生已跨出车门。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下了印象。

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失了。

1989 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其次。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 1981 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

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居心。

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新闻界也轻得多。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说："'戴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中央对话，并立即有 1031 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在统战部会议室新闻界人士与胡启立见面。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 1031 人的代表联系一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

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一句："我 X 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恳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倒并不想办，我受不起这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能否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人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但站在政府的立场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的骄傲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都没有细细品尝。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他作校友为耻，开除了他的校籍。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

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 4 月 27 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瑶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仅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6 月 4 日以后，她丢下 5 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她坚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 30 年，一定是一名职业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

（六）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 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即化名撰写长篇批判文章《动乱"记者"戴晴》作者之一），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 120 万份掉到不足 70 万份（1989 年秋天，革命"左"派张常海超龄接任总编辑以来，《光明日报》已成为全国发行量下跌最历害的报纸之一，两年来，已降至 30 万份上下），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

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他后来成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 1990 年 1 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 1989 年 4 月到 6 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她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由于化名撰文和其他优秀表现，陶铠由评论部主任升任总编室主任，另一名作者刘志达由总编室主任助理升任总编室副主任；几乎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的文艺部主任秦晋、理论部主任张义德、政经部主任李树喜均被罢免）。

13 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 2∶00，十人左右，《著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　马列所所长　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　文学所所长　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　哲学所　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　政治学所前所长　研究员　严家其

社科院　历史学所　副研究员　包遵信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

福建省社科院　院长　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 1987 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话里苦劝了他有 10 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 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在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而有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让他扑了一个空（这就是山西作家郑义到北京来召集的知识份子日坛公园聚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所谓《知识界 5.16 宣言》）。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 9 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 月 14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 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第二西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 12 个人一下子点了 9 个，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而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台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这类事项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

我看见了王超华。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会？"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回答我；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我那年虽然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来就来吧！"陶铠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 5 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温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温又找严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广场去的。

2∶00 刚过，邀请的人已陆续到齐，严家其到得最晚，大约迟到了半个小时。

那天是同学们绝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广场情况怎么样？"。既然王超华在这里，不必说学者们和记者们，连方恭温陶铠也想听听情况。

"我是来向诸位老师求救的……"她说，眼睛里已满是泪水。

王超华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能确记。总的意思是同学们的情绪非常激动，环境很艰苦，而政府方面毫无反应。她最担心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会有更激烈的举动生出来。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她说，"我们只希望领导人能听听我们的意见……为了这一点，同学们除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呢？"

当她说到这里时，坐在我旁边的苏晓康哭了。

王超华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她甚至是个不大善于辞令的人；但她估计得不错，这局面不过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就有 12 名学艺术的男学生，什么话都没说，就那么并排往台阶上一躺，开始绝水。当他们绝到第四天（5 月 19 日）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那个极具艺术气质的优秀生，心脏已经停跳（后经抢救脱险）。

5 月 14 日那天，我们虽然预想不到这种种具体细节，但大致趋势，在座的人都估计到了。这倒不仅仅因为王超华的叙述，而是目睹了肃反、镇反、三反、反右、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难的人都知道那句话：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温元凯这时站了起来："我们应该到广场去劝同学们回校……"

这动议没人反对，问题是怎么才能说动他们。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温元凯恨不得立刻就出发；苏炜认为可以劝，但切不可责备学生，他坚持说他们的热诚与牺牲精神是中国今天最宝贵的东西，一百个官员捆在一起也抵不上。

李陀说他这些天都在广场转，别说就只我们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下子淹到人海里，什么事都不顶。"广场文化！"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

温元凯这时又站了起来，说那著名企业家有很好的意见要发表。学者们很客气，就静下来听他说。那人虽然没有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但他讲的在我听来实在不着边际。主持会的方恭温那么克制、那么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温良而恭谦，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我也是座谈会的组织人之一：

"今天是《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诸位学者来谈对时局的见解的，时间很紧，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对象，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至于广场救急，等把主要日程进行完了再议好不好？"这意见大家也同意，那厮也就坐下了。学者们顺序发言。他们谈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情恳词切，每个发言都有新意，擅长于浓醇抒情散文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甚至带来一篇十分感人的书面稿。

最后轮到李泽厚，他只说了一句："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那天没和编辑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苏晓康和麦天枢中间。我刚刚还开玩笑地问他们："我算哪边的呢，报社一边，还是你们一边？"他们说当然算我们的。我那天也没有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讲得更好。

这批发言后来《光明日报》没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几盘录音带，也未追到手，否则，就可以郑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把这批发言用出去没有问题，直到陶铠这

当儿讲了一句话，使我隐隐悟到我策动的这件事有多么艰难，也就是说，在学者们和编辑部的期望之间? 孌谧盼也辉 系降牟罹喏Ｋ 档氖牵骸懊幌氲搅 瘱渑 姥 幕岸济挥小！蔽壹蹔玫笔蔽⑽⒁徽 颐窃趺茨芘 浪 牵考词沟搅私裉欤 颐怯帜芘 浪 鞘裁矗康比唬?6 年学生一闹，我的已经付排的三本书立刻出不成了；89 年他们上街，我的书全部被禁，人也进了监狱。但如果你与那 12 名绝水的男孩谈过，如果你看过那个电视镜头：布满了人的大街，中间走着虽然持枪、却用胳膊护着头脸的士兵，外边是喊着叫着要用石块汽水瓶打他们的市民；而插在他们中间，拉成一条人线，单薄的身体穿着揉绉了的衬衣，声嘶力竭地喊着，以保护前去围剿他们的士兵的学生们，?颐腔褂惺裁纯伤担渴澜缟峡稍 鱿止日飧 腥恕1.日飧 得饕磺械某：妫克 芩档们蹇袢盏闹泄 四亍 泄 难 ⑹勘桶傩战ㄐ凑馄 恼碌氖焙颍 疑形粗柴玲、吾尔开希之辈在绝食期间、以后的日子里、包括到了香港、法国、美国……之后的表现。但我今天依然认为，少数无耻"领袖"，不能代表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千万人。）

顺序发言之后，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本可以结束，谁要去广场就可以去了，不知谁提出，若想要劝说奏效，必须先说动绝食最坚决的那批领袖，再由他们去劝说大家。而和他们谈，绝不是站在广场上、插进人群中能说得清楚的，必须首先找一个能从容地说话、能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胤健4 蠹乙槔匆槿ィ 衔 谌嗣翊蠡崽每 患湮 肜颖冉虾线剩 抢镌谑卑沧 《 谋尘埃 刖 车氏阕肿罱 ?

这时，温元凯又提议，光凭嘴讲不行，我们必须带一个文字东西去，以此为依据劝说。这意见大家也同意了。

看到在场的"老师们"主意已定，王超华哭了。这是一种宽慰的哭，她哭得很酣畅，甚至哭出了声。出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对学问的挚爱，王超华太看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了，她以为智慧无所不能。学者们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过一切军人、政客、富贾，她的悲剧——同时也是?颐蹔谋 纭 谡饫锸Ｎ娜嗣撬阉茨兀吭诠恢 澜缙褂小翱床患 氖帧保 褂小拔 桌碇 锩哪呛ū男哪恐校 д呙遣疥投喲都父鲎置矗 切床恍诟揾托戳耸裁凑 秸 胱约浩ū傻紫碌幕暮纹垣担吭诘摹 д撸 吏 源 灰谎 谙赶傅牟弊由下穑靠称鹄床换岜瓢潮乌说母 ?烦。这种早已在罗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张作霖，包括本人还算有学问的强权人物曹操、毛泽东身上表现过的特质，王超华与我们当时都未估计足。

我想，如果需要写一份能打动学生的东西，苏晓康的文字最合适了。我于是将一迭《光明日报》的便笺推给他，他什么也没说，凝神思索起来。

没过几分钟，温元凯就站了起来，拿起一张纸开始念。当时我们只觉得它干干瘪瘪，既无感情，道理也讲不清。后来在狱中看报，才从那"企业家"的自白中得知，这是他们早已起草好带到会上的一份东西。在这里，温元凯一下子暴露出他性格上的两个弱点，一是不坦白：在这样的关? 笨蹋 谡庑┦嗣媲岸疾豢辖 约旱南敕ê吓掏谐觯 幻判乃肌奥允┬〖啤保坏诙 遣蛔粤苛ΑＫ 牍的丛谧 亩际擒际┑ 裁凑要 恰叭 湃 吖币贸怂 磣 嵩赫虾 ? 温元凯念了几句，大家只觉得味如嚼蜡。又是我站起来："晓康也起草了一份。"苏晓康开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学们，几天来，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辛苦了……"大家就说："这份好，这份好。"

我知道下边该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没有我在场根本无所谓，于是起身到总编室找红机子，联系与绝食学生领袖交谈的地点。

我把电话直接打到统战部值班室。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学生的压力既不在广场，也不在新华门，而是移到了统战部院内。提审时，专案人员对此相当不解。他们认为，从逻辑上推断，学生运动嘛，首当其冲的总该是教委，为什么那里平平静静，大批人倒往统战部拥？这确?凳歉鑫侍猓 歉霭闯９嬲 吃俗魑薹ńㄧ偷奈侍狻Ｕ饣厝词浅鲇诠谂既唬 蚁嘈 蠹 坊嶂っ髡饷ㄧ且桓龆蘖 车呐既弧?

虽然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在那一段也确实忙得不可开交，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阎明复先生的个人素质。如果他是一个冷漠无情、老谋深算、对权位的追求超过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的人，所有这些乱子他都推得掉；但他揽下了，出于对他的党和? 业脑鹑巍５比徽饫镎灿幸桓鋈 蜓≡奈侍猓汉味   拿婵   且丫   旖坦涣涣耍   掣战尤危   筒钜坏闶Ｕ勾淦ā   晗陆ǖ从窒也蝗衔   呱难 幸ㄧ栋炎约旁悍诒恢泄餐痴牡仁亡唬   蔷醯媚苡焕斫馑   牵   ⑶夷苡朐敌蜕匣部   慨冢餐   胛竽   劐 掣吪?干部，也就是阎明复了。

值班室把电话转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讲了这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学者们打算出面对最激烈的学生代表作点工作试试，请她向上报告，并联系谈话地点。放下电话我即回到会议室。

这时，那《紧急呼吁》基本上已经拟出来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严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问王超华："你觉得有可能么？绝食同学会听我们的意见？"她的回答非常肯定，并且说她立刻就去找他们。我于是请那企业家帮忙，用他的车把王超华送到广场，他? 斓厄鹁ɑ 恕?

正在这时，陶斯亮回电话了，她说人民大会堂有困难，谈话地点定在国务院信访局。号称从不问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这一安排有名堂，他说这是一种降格，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们的这次效命。记得当时有谁劝了劝他，意思是不管政府如何，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我们自己的良心就?桨擦恕?

李陀本来对劝说学生这事就很勉强，这时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场没有人附合他，也没有人反对他。

应该说，在当时，除了温元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曾对自己过高估计。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学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别说登堂入室，就连乘车住店都要问你是什么级别。知识分子在中国，承蒙共产党关照，已经降到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地步，连清末举子都不如?Ｄ鞘保 悴琵穷缡裕还能大大神气几天，吓得酒肆关门、妓女搬家。从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干活的工匠，再挑几个好乖的装点门面，共产党什么时候容得下指点江山之士？但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很难折回了。

就在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赶来，对正在进行着的这件事，抱着一种绝对中立的态度。我念念不忘这次聚首的原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将他："老姚，座谈纪要你可要发呀，这可是启立发了话不反对的。要是咱们这次失了信用，可就再也要不到他们的稿子了。"老

姚哈哈笑?牛　　圆唤游业幕安霓　　灰辉傥剩骸坝霉　姑挥校咳没铥堪才乓下！""车子问题解决了没有？"

姚锡华是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旗的琢县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表面上虽然对我又热情又和气，实际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枪毙、或砍得支离破碎。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干员，但只要有可能，他也尽量不压抑我的积极性。他只求我不要惹祸。我是在狱中从报纸上得知《光明日报》?鼙嗉　兹说模　诱嶂沼诼涞郊岫ū母锩　笈伞⒁淹诵莸那拔囊詹恐魅魏⒆.拷舶敫鲋油坊安怀銮摺　烁霰皣志筒还灰馑肌⒁埠懦剖　说　　骶　蟛糠侄家　⒃谥约褐鞴艿陌婷嫔系恼懦:Ｍ飞稀８傻谜娉沟籽剑　　ξ　　既荃幌铝恕Ｎ蚁肽抢碛杀刭厷趐没实模　蛭北ク缒昵岬谋嗉　钦丙怯涡?时，姚老总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正在这时，陶斯亮又打电话来："阎部长要跟你们讲话。"接着，他的声音传来。我捂着受话器喊了一声"阎明复"，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大致讲了一下经过，并将学者的名字一一报出。由于我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组织人的身份出现，觉得此刻阎明复应与真正的学者代表亲自谈才对?贰?

我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将话筒……我瞥了一眼学者们，我很想将话筒交给李泽厚或刘再复，因为他俩在国内国外影响最大；我也想递给李洪林，因为他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资格党内理论家。但他们都离电话机很远，唯有迟到的严家其正站在电话近旁。我将话筒递给了他——?麻质且桓雠既弧２恢　飧雠既皇欠窕岣　置耩吹摹按砦螟痹偌由系惴荼俊?　　当时会场气氛非常庄重。这批手无缚鸡之力者，居然怀了一种受命于危难感，其实他们与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仅有的一点点的联系：作者——读者，是最不牢靠的；而那"命"究竟来自何处，也十分朦胧。

我的印象，在电话上，严家其讲的比阎明复多。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学学者，历来就是一个长于阐发而不大会倾听的人，在这一时刻，这个特点依旧十分突出。我后来回想，其实在那时，我们 12 人的意见已经很不相同，我们的联袂出场，仅在"希望别闹大乱子，别死人"这种共识下?邢才　　Ｑ霞移洹　　裥拧⒗.钔印⑺侦勘冉霞そ　　衔　獯蚊裰彭碩　　晒罅要　灾泄　　纸　⑸　豢晒懒康挠跤晃液屠罾榇帧⑺障　狄　Ｊ氏枚啵　颐窍Ｍ　?989 年 4 月 27 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认为"4.27"带给社会的东西足够消化好几年，而按眼下这种趋势闹下去，只会把改革成果?葳痛　　Ａ踉俑疵辉跃唇不埃　　且桓瞿说诟惺苫芊岣蝗辞佑诘敝敌谓嗯砌匏鲥妥焕钤瘥暂谛姆浅Ｃ　堋Ｋ　翟谑谴厦耩　要　词乖谀茄
　曳追椎氖氛踢　　寄芮娜嗄兆牛　缓嵘　　跺　⑶俺痰鹊确浅Ｊ翟诘奈侍?

出发了。报社给我们派了一部小巴士，学者们一一落坐后，我对一直送到车门边的方恭温、陶铠说："不祝我们什么么？连一句壮哉此行也不说？"老方温和地笑着，说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我们那天是繁忙的国务院信访局唯一的一批来访者，局里的值班人员已得到通知，很郑重地接待，千方百计满足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打电话、复印、还是派车。一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约有 20 多个座位的中会议室，打算在那里等候学生，茶水等等也已经送来了。学者们坐下后，忽?瘓醢煤懿话玻　蛭　颐?2 人，加上随队的《光明日报》记者，已剩不下几张空椅，学生来了怎么办，谁站着？难道是绝食的同学们？我于是又出面联系，信访局方立刻打开他们那座建筑物端头一间权充库房的大屋子，学者记者一齐动手，摆桌子、铺台布，布

置起一处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平等亲切的环境。

陆续有人赶到这里，包括外国记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门口，辨认他们，决定谁可以放进来谁不可以。

在这当儿，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够的《紧急呼吁》终于完稿，因为没有打字机——或者如李陀所估计，因它是"宣传器材"而无人敢出借——《光明日报》一名编辑已将它工整誊抄了一遍。就在我跑进跑出地忙的时候，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待我看到这张纸，11 个名字已经签好，最打头?哪歉鑫恢谜 铱兆拧?

我平时最恨论资排辈，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职业者中间。但一项严正声明或呼吁的带头人非同小可，我不认为这样安排很合适。

"是你把我们找来的，你应该签第一个。"他们说。

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说，拿起笔就在那空位上签了。事后议论起这事，有人说这是抢名誉，有人说是有担当，其实都不确。我当时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签，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后边蹭，是会在猜忌本来就很重的中国文人中引起挺严重的误会的——"她为什么不签？准是有了什么内部精神?俊蔽艺獗沧颖蝗宋蠼獾氖露嗔耍 偌由险馓跻裁皇裁醇蓿 谡庵止赝酚 ×勘苊獍?

这份《呼吁》后来在信访局复印了 25 份。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晚霞已经布满天际的时候，统战部的面包车送来了十几名头上扎着白带子的青年。他们不仅神情异常激动，还非常焦躁。我因为来来去去地忙着处理杂事，没有听到学者们如何劝说，待我回到大会议室的时候，发现这些青年其实一点都不固执，基本上已经"完全? 狻崩鲜γ堑募 狻!袄鲜γ撬档枚级裕 颐嵌纪 猓 彤鲜γ侵苯雍屯 翘负貌茫恐苯雍痛蠡壹 妗！?

在大会议室里，反反复复听他们说的，似乎就这匆痪浠啊Ｕ庖淹耆 煌 谖颐亲畛醯纳柘搿Ｕ庑┭翘 昵崃耍 恰俺N 薄ｉ白茎富印钡牡匚唬 赡芫褪窃诩皇种拥蠓按蠼邢隆Ｒ 笏 蔷哂凶谐瞻蚕砥鐾都负跏遣豢赡芄 羌热徽庑┤苏猩 ㄐ 锌 嬗谢肪 灰埠莅兹ゴ叵 疵晃尬侍狻?

12 名作家学者，包括已年届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挤进原已被学生塞得满满的小面包车，一路摇着白头带，举着象征胜利(Victory)的两根手指，开向统战部。

根本不能从容就座，换句话说，简直就是人叠人的小巴士内，那些正以自己的青春、激情，将中国事态推上全世界报纸头条的学生们，竟没有一点历史沉重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唱着一出重头大戏——一出在数十亿人口中重新估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庄严的正剧。他们孩子般地将?桓龈銮凭傻男"咀樱 踔烈徽滩湳嘀宓男≈狡 堇吹ㄧ 搿袄鲜γ恰恰 裟睢Ｔ谟 忻悬按耍 昜芤种撇蛔ゅ壤嵘 簦 吩跌茨芙 庹 闹髓杭貊湛酥鳡郭

募缤罚?

统战部院内满是人，大部份是学生，也有记者和别的人。应该说，与我们同车回来的学生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张罗能力的，他们很快将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从车上叫下来，到圈内去讲话。今天想起这一幕，真象做梦一样。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观者?芙 笔钡木翱鎏缡得杌娉隼础Ｎ抑恚蹔茫 冶唤酉鲁担 δ淞Ｎ也恢 谖仪氨呦鲁档难ｄ夃撬盗诵┥裁矗 膊恢 牢液孟叩娜嘶崴敌┥裁矗 疑踔敛恢 涝谡饧负醪豢赡苊挥兴伎嫉氖奔淅铮 绞窃趺慈窖菟档模 抑恚蹔梦艺驹谀谴 x 蟹锤辞康鞯?梦何 嵽 裉斓木置 妫 蕉家 貌剑 热茫 ?们也要让；至于条件，如果同学们相信我们，我们愿向政府方面作一试探。

可能李泽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场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他们决定撤离统战部，请老师们到广场去与广大绝食同学直接见面，我则被推举走进办公楼，将《紧集呼吁》交给工作人员之后，作为学生方的代表与阎明复部长会面。

那是 5 月 14 日下午 7：00 的样子，他正坐在统战部大餐厅里一张杯盘狼籍的餐桌旁。餐厅里四、五张餐桌都是这样，看来在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务人员已经来不及收拾。席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阎明复神情焦虑。他甚至来不及跟我寒喧几句，劈头便问："广场上的同学撤出，起码暂时撤出，什么条件？"

我将我们的《紧急呼吁》递给他。"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组织合法等等。"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阎明复说。

"可他们总得露个面，这么僵着算什么？"

"如果不附加种种允诺，我尽力劝他们出来。"

"谁出来？"

"赵、李，还要谁？"

"出来以后呢？"

"不能再附加条件，这已经是今天能做到的极限了。"

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么？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

"我们去试试，我们愿意去试试。"我说。

"好，"阎明复说，言语之间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

我走出餐厅，在走廊里遇见一名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他是会议室里正在谈判着的双方政府方面的一员。

"怎么样？"我问。

"毫无结果。"他说。

"你们怎么就不能让让步？"我问他。

"让是可以让，可是让起来，你说，有头吗？"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此时还有多大神力。

"你不会退足？不是一点一点退，一步退足。"我强撑着说。他没和我争，只苦笑了一下。 不错，谈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与其说是一种方略，不如说是一种气度。一般总能获得舆论同情，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退够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会少一些。但这不过?且辉蛟 恚 恢滞g 辉谀鞘焙虻闹泄 诿裰谇樾魅绱烁哒嵌哉蝊嗑有呢喜獾娜私两 吹那榭觥拢 坪醴苣岩猿@碜髋卸稀?

也在这同一条走廊，我又遇见一名青年。想来是谈判双方学生方面的一员。他的焦急已全部摆在脸上。

"戴老师……"他主动走上前。

"绝食团代表？"我问。

"要是就好了。"他说，"我们在这儿谈，刚有一点进展，就被他们推翻，以前说的全都不算。我们是被正式推举出来的，可什么也代表不了。"

我当时说出来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努力争取。外面绝食的同学由我们负责劝说。"

"那就太好了！"他说。

在牢里我一次次回想这一场面，羞愧得无以自容。我有什么把握、又有什么资格作这种大言不惭的许诺呢？

记得到了 1989 年底，警察让我写一份对"八九春夏之交"的"认识"。

"我无罪可认。"我说。

"不是让你认罪，是认识错误。谁没错？我们都得写。"

我写了，就认这个错，认得心悦诚服。我说我五月间最大的错误就是介入斡旋。总的说来，

斡旋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充当冲突双方的斡旋人。这，从原理上讲也有，比方说有实力者——特别是军事和财经实力；有背景者——国际的或者家族的；有声望摺赂咄 氐那罢 渭一鲜呱缁峄曈 摇15.蒲Ъ摇⑽幕 说鹊取Ｖ泄 忻挥泄 庋 娜四兀 灿泄 恍野敫鍪兰屠矗 皇且蜓 喑闪顺瓒 褪潜幌铝撽 ⑸绷送贰Ｓ行揖又谢钕吕吹模 皇切幕乙镓洌 阋燕淙艉 酰 挥形艺庵植恢 钋场2.悔夏谇椤2.恢 愿韶 锪降模 呕嵩谡庵质焙蜃砸晕 傻昧?这等事。改革开放不过十年，许你小声哼哼几句不过几回，还不必说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点板还一巴掌打过来，不禁打的已是败象毕露，政府凭什么信托你？民众凭什么信托你？无人信托，你斡旋什么？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只可惜当时没这样想。

我"身负重托"，走出统战部办公楼。半个小时前还拥满学生的大院，已恢复平静。在一名统战部干部的陪伴下，由统战部出车送我从正阳门来到广场。

天已完全黑了，广场上满是人，围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心发表讲话。我们弄不清谁是谁，就朝最先遇到的一个圈子走进去。有谁问了一句"找谁？"我反问"教授们在这里么？"这话被一波波往前传，不知怎么传成"教授来了"，只听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来?颂 昧恕＝淌冢 烨號 卤萁玻 辈挥眗颐欠直妫 驯挥档饺ψ又行摹Ｕ馐蔽也趴辞澹 簕秩朔浅ＤЮ昵幔 簿驳刈 谒闹 芴俦瘛！?

"你们不是学生么？"我问。我那时以为，这种时候静候在广场的，只有学生。

"不是，我们是工人。"七、八人争着回答。我吓了一跳。工人和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走上街头，固然也有道义的推动，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国的工人，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眼见今天"一套烂章程"的工人——那时，他们被称作"领导一切"的阶级，也真的一批批被伟大领袖?沙鍌ス苷 9.苎 ！9.苎芯炕 梗欢 瘢 谒 强蠢矗 鲜蹈苫畹饲畹枚〉毕欤 髅テψ右桓龈隼 昧饔汀 涫捣浅Ｌ乇穑３ 烁 静恢 浪 亲约菏鞘裁础⒁ 裁创驳吹 潦 中难鄣 档萌媚阌坏惆痌 挥小＞退阉沂歉鲅芯抗と嗽硕 淖ⅲ遥 亲 友 收 坏胤降梗 膊荒?在那个时刻、那种地方发表宏论。我们连声道着对不起，立刻撤了出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 11 人，尽快劝学生撤出，工人们已经来到广场，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我们往南挤，很快就碰见了学生，很快就来了一名小头头，领着我们从很快让出的一条通道往当时的指挥中心——广播站走去。

所谓广播站，不过几台便携式录音机，但从声音可以送出几十米远判断，或许有台把扩大机和高音喇叭，我没有看到。学生们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说好到不能再好。估计有不少电视摄影记者包括搜集情报的干员挤在当中，因为只要有人讲话，不下 10 支聚光灯就会从各个方向打过来??

他们 11 人也已全部坐在"广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还没来得及把和阎明复见面的情形细细说明，并在 11 人(其实是 10 人，严家其此时已不知在何处)中充分讨论，主持"广播站"的学生领袖们已急不可待："请老师们快点开始吧，大家等得太久了。"

于是开始第一项，由领袖们将我们一一介绍。每报出一个名字就是一片掌声，包括大家肯定相当生疏的苏炜、李陀，也许再加上我本人。赢得掌声一般总令人欣慰，不幸我从小就读莎翁的《裘力斯?凯撒》，记得还挺熟；又对"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句名言笃信不疑，所以那时只觉不?病?

介绍完毕，读《紧急呼吁》。因为我是 12 人中唯一女声，于是由我读。读毕，由我宣布撤出条件：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哪怕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活动让出地方。

这回没有掌声了，但也没有嘘声。人群沉默着，象在等待什么。温元凯、苏晓康、包遵信……好象除了生病的李泽厚和嗓子哑了的李洪林，一个个起来发言，苦口婆心地劝。人群渐渐有了反应，似乎是，"光来看看不行，必须说点什么。"说什么呢，各种方案都有，都不现实。"老师?恰庇谑怯忠桓龈稣酒鹉啊Ｆ渲幸运障 档牧俪⊙菟底钗 剩 欣碛芯苠 椴 19. 娌焕⑿吹缡泳绲摹?

我也站起来两次。"劝说"本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种活儿，平日与人相处，三言两语，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各自走路，从未尝过苦口婆心的甜头，无论对己还是对人。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阵了。

当时说了些什么，已不能一一确记，唯一记得的，是对那些纯洁的年轻人说，"你们已经干得很棒，下面要由我们一点点来作了。你们这几天所开创的局面留给我们的，几年也干不完。"现在回想，在这句话里，我既没说清什么是"你们"，什么是"我们"，也没说清什么是"棒"，?裁词恰耙坏愕恪懂醋鳌保挥谑牵 蝗缥蚁肿罅蛾鎏挪按拷唷庇甪帷锓娜说姆从ｋ牵喊。颐鞘芸嗍芾郑 忝钦 易樱ㄈ傧俏医拥降囊徽盘踝樱 ?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向政府所提条件。我建议如果学者们的发言能在《人民日报》上转发，就同意撤。对这条的反应是：我们费这么大劲造成压力，让她发文章！（其实这一组发言中根本没有我。）

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作什么斡旋？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瘦瘦的、带副眼镜、学生模样的人从人丛中挤过来，对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话筒，以无比的激情喊道："同学们，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鲜血……生命……民主……"

下边齐声喊起来，声势起码比刚才大十倍。王超华呢？一直没有见到她；别的将我们请来的领袖们此时也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场面，我们还能作什么呢？（在狱中，警察反复盘问这人是谁，还曾拿出几张照片让我指认，但我确实不认得他。直到这次到美国，读民运人士的文章，方知那 词谴竺 ＸΦ姆獯拥拢凰 且豢讨 哉饷锤桑 且蛭 拥搅艘艘徽胖教酰 鲜椋骸按蠖夷钊 榫 承 浴薄Ｐ凑馐拥娜耸遣遣寤帷＃?

"咱们撤吧。"学者之中不知谁建议。没人再有别的意见，我们顺序从人群闪开的一条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学朝我喊，有的还激动地伸过手来揪住我的衣领："戴老师，我们不能撤啊，我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我任他们拉来拽去，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认为有如中华

民族遥远?靡　愣睦硇阅艿械米：　螻　甘　昱嘀财鸢囊杂廾廖拗　　〉摹案锩　で椤保晃乙膊蝗衔　　谡庵志置嫦拢　5.慈缥艺撸　棺愎患崆康娇坝胗　庇腥盏那痹谡　投灾拧?

回到统战部，神形俱疲的文人们被让到一间小会议室。阎明复部长很快就来了。没等我们细述经过，他先开口，眼睛谁也不看，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沉重。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那缓重低沉的语调："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去休息吧。"

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从"三峡第一爆"里看到了什么？

戴晴

昨天 (元月二十日)

下午，全国大概有上千万人看了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的"三峡第一爆"。

用记者的话说，这是个"精彩过程"—精彩在哪哩？是县城密集建筑定向爆破技术高超，还是库底清理主管部门的争时间、抢速度？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环保主管机构的催逼之下，国家紧急追加拨款，为应付 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不得不采用一系列权宜之计的"清库行动"，本是三峡工程主管人应该向出钱的全国人民和受害的库区百姓告罪的事，居然变成了"精彩的第一爆"，耍弄平头百姓的胆子实在太大了一点。

为什么在已经有了总预算的前提下还要额外拨款(头一期 200 亿元)？为什么十年前就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而到蓄水前夕才紧急赶工？

三峡工程主管人在这里不敢向百姓如实交代的是：不仅库区沿线包括重庆市在内的数十座大中小型工业城市日夜向三峡排污，沿江 135 米以下的工厂、矿山、医院、坟茔、厕所、垃圾堆..... 都要淹入江底。而将被大坝挡住、不再痛快东去、浸泡著这些污物的水库水，就成为沿库百姓的唯一饮用水源。

本来，按一般推想，这些污物和有毒物质，是应该早就按步就班地完全从库底清理出去的。只因为十年前水利部为推动三峡工程上马而进行所谓可行性研究时，根本没把百万人饮水质量问题考虑进去，才弄成今天这样急急忙忙炸楼，赶在淹水前把脏东西暂时包封起来的应急措施。

对如此粗率、掩耳盗铃式的做法，我们的新闻媒体还大叫"精彩！""精彩！"，也许这也是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一"。

据重庆大学退休教授雷亨顺先生调查，三峡库区沿线各市县均对蓄水后的水库水质不抱希望，转而纷纷想方设法另找水源。难怪"库底清理"计划一下来，地方官员们并没有忙于"清库"之事，而是琢磨著怎么在招标书里面把他们想要的豪华汽车、高档相机、新潮电脑以及香水手纸囊括进去。

戴晴接受 BBC 记者专访：呵护河流是我们的首要职责

BBC 记者：我们知道你是以反对修建三峡大坝而闻名国际社会的。令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何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政府完全相反的立场？

戴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环境方面的，因为长江对这个国家而言是太重要了，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第二个原因是考虑到三峡库区的移民，他们为建此大坝付出得太多，也被折腾得太苦。第三个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只有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央政府才能够动用整个国家的财富去建一个灾难性的大工程，并且可以完全不管普通百姓怎么想怎么看。

BBC 记者：但你看三峡工程是否还有停建的可能性？也许很困难？

戴晴：机会很小。因为在眼下的中国，敢于发表独立观点和见解的人太少，他们的力量太弱。同时他们又要承担太大的风险，政府当局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压制不同的声音。就我看，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是无法阻止这一灾难了。

BBC 记者：我们听说有上百万的人必须迁移，是不是他们都反对大坝建设？他们能否公开地反对这项工程？

戴晴：你知道，中国人有几千年的传统，普通百姓选择生存的的唯一方式就是服从中央政府。所以我认为真正从这个工程中得到好处的是各种各样的官僚们。

BBC 记者：根据政府的宣传，开发水电是一举两数得，既便宜，有节能，还没有环境污染。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戴晴：我看这是人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显然又落在了后边。对一条河流而言，人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呵护她而不是任意糟蹋她。显而易见，中国的领导人仍然生活在三十年代。众所周知，水电站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好景不再，成了昨日黄花，在美国、欧洲国家尤其如此。那里的人们正忙于撤除兴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大小水坝。人们好像突然醒过来了，已经普遍而且深深地意识到，对河流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保护她们，让她们自自然然地，无拘无束地流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的水电设备在本国根本卖不出去，而大量卖到中国来的主要原因。

从小书到大书 从大书到小书——读《永玉三记》戴晴

人类世界真是难于捉摸。

外星人或是天上的众神看我们——看这个被五分之一氧和五分之四氮包裹着的大圆球上熙来攘往的胎生哺乳双足无毛动物，和我们看蚂蚁搬家或是蝗虫过境可能没什么两样。我们在蚂蚁和蝗虫里找不到待卫长和排头兵，他们在这数十亿芸芸众生里也一定分辨不出成吉思汗、恺撒、瓦特和爱因斯坦，更不知道当这个或那个出类拔萃的小人儿，在他们的机体把碳水化合物变成红血球可以携带的养分，又在大脑皮层的左侧颞叶或中央前回流窜一通之后，会出现怎样改动教科书和地图的推理、假说、雄图、伟业。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终将失去锁链，得到整个世界；列宁则以为这一胜利可以首先在一国和多国取得；毛泽东更制定出了如果这个国家并没有很多大工业和产业工人，十之八九都是穷得叮响的小生产者的时候，就应该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才最对路。他们想了，说了，写出来，领着别人做并且成功。以后，在东半球的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飘着红旗的、蔑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但是，谁能想到，也就在这里，却又出现了种种反常：既有下野的皇帝诚惶诚恐地忏悔；昔日的战犯能改造成古道热肠的友好使者；又有功勋卓著的元帅却弃置在无人问津的山沟沟……！

这儿有过“五?四”，也有过“四?五”，有过“一?二九”，也有过“八?一八”；真是世事纷纭。有些也许本可刷新一代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运动，却象在大象身上轻搔几下，没有能一下子避免和改变一些反常现象。这个惯听《七侠五义》和《封神榜》，看够《秦香莲》和《杨家将》的民族，虽然造出了导弹和卫星，消灭了娼妓，还夺回一大堆金牌，但在意念上、在感知上，总象多点什么又缺点什么……就象邪火还未退尽就用上了十全大补；就象一个心急的油漆匠，基底还未干透、表面也没砂光，就急遽地挑着最光鲜的颜色往上抹……这是怎样的国土呢？她建树着又破坏着、创造着又束缚着、培育着又戕害着……是不是造物在这块土地上泼下的珍奇(人，资源)太滥、太慷慨，才暴殄得这样不经心？但无可摇撼地存在着，在兵燹、瘟疫、灾荒、错误路线下都咬牙挺住，看看濒临绝境又奇迹般地起死回生的，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潜在的势能。

乾隆向服游江南返。闻一画人以此为题画之不休，召之来问曰：“联游联的，你嚷什么？”画人曰：“靠皇上赏饭吃。”乾隆曰：“好！了做我的太监吧！”

伯乐破行，少壮见问安。“夫子何为哉？”答曰：“相马所致。”问曰：“相马夫子之道，何凄楚若是？”曰：“相一良马。”问曰：“良马岂不佳乎？”答曰：“佳固佳，一牵上台阶，即狠狠给老子几脚！”

画家出生的时候，黄埔军校已经开学。他无由刺杀巡抚，也不必为倒袁亡命国外。天下动乱的当儿，他正在长身体、打根基、阅历人世、拜师交游；祖国安定了，他的盛年开始了。

并非“正经写书的”黄永玉、蜷伏罐中，将他在有窗和没窗的房子里，或“无聊烦闷之余”，或“兴致”之所至，“瞎编”出来的好几百篇感喟——对桌椅、对虫豸、对跛行的伯乐、对

失鳞的龙——增补删削、加画、付印，又照出了这你与我都生于斯、混迹于斯、啜于斯的世间的什么呢？我是个不甚懂画、却每有画展总想去碰碰运气的人。毕加索也好，傅抱石也好，星星们也好，在我心中并没有那么分明的、从别人那儿趸来的优劣高下的定见。我只希望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身姿、一个眼神，甚至一片色彩、一根线条，能使我陡地感到些什么或回想起什么。我也许会开心地大笑，也许会很难过，也许会痒痒地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愿不会走出展厅什么也留不下。

记得大约十年前，作为前红卫兵，在"以鲜血和生命"正经八板地关心了一番国家大事之后，正不知是冷漠还是热切地等着看这出戏怎么收场，况且，那时候人们正压着咚咚的心跳，私下传着一幅据说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宝光寺的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从此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在美术馆偏厅的黑画展上，我见到了那只无与伦比的猫头鹰。画幅不大，挂得也很偏，我却木在那儿好一阵子。接着，现在想想实在傻气的是，突然转身跑掉，跑到动物园——铁笼里那只鸟儿真够捧场的，正象画中它的同类一模一样地用一只大圆眼睛视而不见地瞪着我。这实在令人悚然。记得当时脑子里好象飞快地闪过无数念头，譬如拍张照片贴在画展的批判词下边或寄一张给王曼恬等等，但这些当然都没有做。不过，这就足够了，作者与读者，无论是作文，还是作画、作诗、作曲……重要的是，我们足踏在同一块土地上，呼吸着污染程度差不多的空气，大家上街都挤公共汽车，买东西都挨售货员的白眼。我们都热爱过、奉献过、期待过，被无端咬一口、踢一脚、摺个跟头，爬起来舔舔伤再去热爱、奉献、期待……象他的先辈沈先生一样，画家扔下他的小书，离开梦牵魂萦的故乡，跑出去，跑向辽阔的天地，去翻阅社会人生这一本大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这是一本有着那么多甘美清醇，又着实苦涩难咽的东西。但成长而且强健起来的作者显然有比他的表叔更结实的肠胃和执拗的脾气。他不动声色地嚼，嚼，嚼，也许崩碎过牙齿，也许划伤过食道，但他不但啃下了，还将这一本大书，又缩成三册虽然可以放在案头枕边，却沉甸甸地压在读者的思索上的小书。鲁迅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初初看去，《三记》令人捧腹，但这显然不是卜劳恩式的。卜劳恩让人笑得象一匹在草地上打滚的小马；《三记》的妙处却在牵着你一层一层想个不住。你也许会笑，也许咧着的嘴还没合上，眉头已经打皱，直觉得一股酸涩翻上心口。

一猴自万牲园逸出返归出贮存岩，群猴围而搜之曰："奇哉，竟无虱，恐非族类！"猴闻之惧然，哀告曰："无虱非余所愿，人使之然也。借数颗以资繁殖可乎？"众皆曰："不可"

桌子有点不稳，连找原因的胆量都没有么？不致于一味因四条腿就自惭形秽了三条腿的鼎，最后为了看齐，竟搞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吧！一心向往与同族欢聚的猴子逃出万牲园的时候，怎么也没料到会因为身上少只虱子而被视为异类从而加以冷冷的排斥的吧。对紧箍咒上瘾是有科学依据的，属于深刺激在大脑皮层上的残留。对大圣的"不时敲打敲打"已由心理层次进入生理层次。

没有鲜丽的羽与悦耳的歌，而且只在不为人知的黑夜里卖力气干活的鸱，是无由荣享小笼子、小帘子、小食盆，并且跟着说一声"老韩好人"的。还好，只有鸭子才劝他著书立说。

害肝病(或称全无心肝)的画家的贪婪无耻，令人不寒而栗，而且这一切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龙的卜知埋在黑墨中的心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作者在这里不忍了。生活中的结局往往这样：“……(画家)携酒于海滨召龙，龙哪里会设防，至而笑曰：‘只鳞片甲，何劳君恂恂殷殷至此。’”三巡过，陈尸沙滩，昔日五色斑斓鳞，陡然间变作青灰，画家拈起一片，反复诘研掌中，颓然掷地，以足儿践曰：‘早知如此……’”

…………

鸱夜除鼠。鸭劝基著韦书立说，或回忆录，或公开日记以伟后世。鸱曰：“得矣！我不出一声已挨骂千年，白纸黑字，那还了得”

为《三记》，无论写什么，评也好，感也好，介绍也好，无疑是极不智的。这是一部只存在于你和作者之间，甚至一旦得到了，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流动于你各个神经末梢的，具有物质性却又无形无态的一种感知。就象波、就象能、就象万有引力。无需别人插手。但这确应是给孩子们看的书。它的纯朴、深邃，它透剔的理趣和活泼泼的直觉，它毫无雕琢地直抒胸臆，即使在“正经写书”人的浩繁卷帙中，不也显得那么寥寥么？孩子们那爱美的真率的心会与作者相通。说不定若干年之后，面对着“×处长”或是“×主任”的暴怒，那读过《三记》的孩子会高兴地想：

“蚊子这家伙真是斗胆……”一九八四、十、北京

从小说看土改

——张爱玲的《秧歌》在大陆戴晴

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简称，在中国，这无疑是现代化最主要的命题，不但与“土里刨食”的平头百姓丝丝相牵，也与夺权而后掌权的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

大陆生活在城里的人与土改本没有直接干系，原可以不知道。无奈共产党看重政治宣传，看重“亿万人民同心同德”。于是，报章杂志、电影歌舞轮番轰炸之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与部门传达，终于把“这场伟大的运动”弄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但正因为是宣传，也可以说，反而没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毛泽东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没有 1920 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们手执土枪梭标“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1]，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色政权"的得以生存。当然接下来土地政策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变来变去，细细揣摩其脉络，似乎主要取决于在当时的局势下，“红色政权”是只须赤贫者效命即可(富裕者抢了过后杀掉就算了)；　还是须拉上地主富农们一同效力(如抗击日寇)。邓小平 70 年代末归位之后，所烧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还农民以对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这些都是主题以外的话，这里说的，是共产党大范围掌权之始，即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那场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场火热的运动，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劲头空前高涨” [2]。这话从那时就说，一直说到了今天——当然先是党报说，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说。但是，有没有人不说，或者说出一番别的景象、别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图拉拢还是吓唬，抑或是有恃无恐，当然也可能出于极为天真的骄傲，当政的党似乎没有想将土改遮掩。只看当时留在大陆代表“言论、思想与良知”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们，几乎无一遗漏地被送下乡参加(或称见习)土改，就是明证。他们回来也都真诚而得体地以此题材创作，无法创作的，就具名写下心得与感受，于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调。无由恭逢其盛的我们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发豪情的这一茬子人，虽说得以如此张扬地发挥着土改余威，但除了油画《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对土改实毫无认识。

直到 1996 年——伟大的土改运动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我才从新近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小书里，见到一丝土改之端倪。这是两位同为本世纪 20 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中国成吨的土改报导、土改文学里，她们的叙述只可称沧海一粟，但仅这寥寥数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这就是过世不久的张爱玲和尚辗转于病榻的韦君宜。

在中国，直到 80 年代中，50 岁以下的人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爱玲。然而，1989 年之后，与相当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道，张爱玲悄然流布。这当然首先得益于读者目睹坦克而后的信念崩溃，甚于任何时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

这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成熟老到得让人发怵的前辈作家令我倾倒。这，在我刚一碰《金锁记》、碰《姑姑语录》等散文，就知道了。但这边出版的多是选本，各式各样，就算把 1990 年的《草炉饼》、把《张爱玲苏青对谈》都收了进去的"文集"，也未将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专家，二对张爱玲还没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来捉摸一番的地步，对“全集”也就没有过什么渴望。加之这边的研究者，包括被认为相当非官方、且对张怀着亲切的念想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贬抑她到了香港之后的作品，说是“坏作品”，是“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为她作传的人竟指称它们“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题作文”(?!)[3]。但《秧歌》和《赤地之恋》最终还是在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出现了——出现于大陆那场突然暴出的短暂的张爱玲热的当口。

这“热”当然是始自惊闻她离世的噩耗之后，波及了不下几十家报章、杂志和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标出“全集”，且真的把这两部作品也印出来并且从从容容地卖了出去的，只有两家：大连出版社和内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后者对原文略略作了修改，如将张爱玲秉笔直书的陈毅二字改为□□等。

《赤地之恋》讲的是城里的干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则完全是土改后的农村。她说的是一个距上海不远的江浙一带乡下丰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个在张的笔下相当少见的美好青年: 勤劳、诚实、果敢、好学、友爱、克制，恪守旧道德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壮俊美。他是翻身农民，不但分了地还分了浮财，其生产力也被“极大地解放”着——他是劳动模范，地里的收成是“九担谷”。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子，使她不致离家远赴上海帮佣。而供养的标准，就是吃上干的饭而已。(九担谷是 900 斤，对于金根这个三口之家，每天应有 2 斤半米吃了)这一愿望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妻在离别两年之后返家；一次是新出阁的妹妹归省。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义对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顿好好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他低声向她说，“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p.104)

他的妻子漫应之，结果端上桌的“仍旧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着”。她不是与小姑没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为他们有得吃。

即使这样的饭，五岁的小女儿也总是缠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乡创作电影的城里同志吃，而为此一次次挨打。最后，到了故事的高潮，农民们不但要将收成的一半交公粮、要按国家派定的价格卖余粮、要忍受低价收购的蚕丝、茶叶、麻，要自贴材料和功夫做军鞋，要交钱买飞机大炮……到了他们盼着或许能吃上一口像样的饭的新年的时候，新的摊派又来了：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p.109)

这么作的理由是：

我们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它。这实在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政治意义的。人民解放军的家属，我们应该照顾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 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军队”距喝着稀粥的村民们实在太远了，局面于是变成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交纳得起。“农会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妇联主任——分别召集大会，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这王同志是国家政权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爱国”、“对政府的态度”等等吓人的名头。但“劳动模范”金根仍一口咬定没钱也没粮：

“王同志”，他大声喊起来，“你出去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 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 (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钱最终还是被挤了出来，仅有的口粮也变作了慰问年糕。到了日子，金根挑着磨好蒸就的年糕，随着大队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饿得舍不得离开年糕担子的小姑娘紧跟在父亲身后。就在那里，事情发生了: 看秤的王同志，不知是余怒未熄还是实情就是如此，刚说了句“斤两不足”，金根就嚷起来，别人也都跟着嚷——翻身农民不仅劳动“劲

头”，他们的愤怒也“空前高涨”了。

接下来的是，饥饿的农民喊着“借米过年”“什么借不借，是我们自己的粮食!”拥到就设在村中的政府粮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高喊着“人民财产动不得”，在混乱中被打了一扁担，情急之下(也许是训练有素地)成了第一个向人群实弹射击的人。几个村民丧命，金根受伤，他的小女儿在混乱中被踩死。

故事的结局是：知道绝无活路的金根自裁。而王同志则敏感地察觉出这或许是桩间谍案。就在他对乡民动刑，以期挤出一套可信的口供时，粮库失火了：

民兵们挥动着红缨枪在那红光里冲过。内中有一个民兵坚持着说刚起火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个女人在黑影里奔跑，被他追着，一直把她赶到火里去了。 (p.163)

不用解说，没有读者会不知道，这就是金根年轻的妻。小说没有写王同志后来究竟是得到了提升还是遭了裁撤，但读者知道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嗜血恶魔，也不是一颗独笃定的没有思索能力的螺丝钉。作为一名执政党党员、一名站在第一线为共和国的钢铁厂、原子弹，或许还包括披挂着政治大义的堂馆和别宫刮揽资金的斗士，王同志也是有点小小的腹诽的：

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p.75)

而就在他子弹出膛、眼见人倒下去、血流出来之后：

“我们失败了，”他沉重地说。然后他又重复了一句，就像是他还是第一次说这话，“我们失败了。”

“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王同志惘惘地说。 (p.139)

虽然这枪不是开在天安门广场，不是开在全世界记者的摄像镜头前。

与《金锁记》比，《秧歌》或许不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之作。她自己就说过：“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4] 乡下的人和事对她说来是陌生的，写起来当然艰难。比如，她显然没有弄懂村里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但艰难之下，为什么还要作呢，何不依旧只在上海灯火迷朦的老公馆里倘佯?在《秧歌》的〈跋〉中，她对此其实已经有了交代:"里边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她相信她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因为她相信人，相信“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我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说谎的习惯，也没有说谎的理由”。不仅相信，明摆在那里的饥荒和对明摆着的事实撒谎，还有为什么会有饥饿与为什么会撒谎，着实令她不安。因为，这桩桩琐事与她得自大场合大渠道的大声音大解说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无法忘记，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并逼着她细细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权的本性。这一切在心中“潜伏浸润”久了，无由排遣，终于写出。

张是一个对大而无当的政治理念相当疏离的人，这从她对她的两任丈夫的政治倾向几乎持视

而不见的态度即可证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种各样理念的行为结果，即真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出于人的本性对周边发生的一切的反应。然而，再疏离，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从这名以细腻和鞭辟入里而见长的小说家身上失掉——或曰整风整掉或交心交掉——，诸如对美与丑的鉴别，对幼弱的同情，对恶势力的憎恶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想骗她、或者让她假装天真地为政治大义哪怕稍微捧捧场，怕都没那么容易，拿政协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员长做饵也不成。

对《秧歌》和《赤地之恋》艺术成就(或非成就)的讨论可以暂置一旁。问题是，另一种声音终于发出来了，虽然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5]。

《秧歌》毕竟是小说。通过小说了解人生、了解历史，只能是间接的、感性的。更何况还是一家之言，这一家又是从未到过乡下的大小姐。不错，张爱玲无法与土生土长的浩然比，也无法与带了任务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尽情调阅资料的丁玲、周立波一干人比，当然更不能与喉舌们比。我们尽可以多听听，然后在心里对他们诸家做个比较。还好，就在文人与文学只能“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不甘与不擅围绕者，就到一边去弄风月，于是只能“常使读者带笑(嘲笑)看"的今天，终于有学者走出来了。于是，科学地分析土改，分析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已成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镶《日记摘编》已于今年发表(《史学理论》96—2 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当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 1995 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毛主席于 1947 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李进、李敏、李纳)。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的责任问题: 谁都知道，这小书不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顶雷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编辑: 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李鹏先生的大福？注释：

[1] 1928 年井冈山《土地法》

[2] 《凯歌行进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别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和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写什么》

[5] 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在这边正红得炙手的也如张爱玲当年那么年轻的女小说家对社会人生创作等等所发的议论。当被问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时，她笑起来，倩兮盼兮间透出怜悯与鄙夷："责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储安平与"党天下"戴晴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 1978 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 年 9 月 17 日。

一年半之后，1980 年 5 月 8 日，55 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 1957 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 1959-1964 年间陆续获摘，到了 1980 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的，只剩下 10 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 27 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 5 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 90 多名，占原戴帽者的 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 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 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 1982 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 3 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 69 岁，却在他 90 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 1962 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 80 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 1969 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 1966 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 58 岁的时候，距今已 22 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 1980 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

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 20 年的国民党（截至 1948 年）和 8 年的共产党（截至 1957 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2.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阵营。从 50 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囵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 1948 年被开除出 9 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 1956 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①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 7 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种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

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 10 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1950 年 5 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 月　镇压反革命

1951 年 5 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 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 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 年 1 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 年 2 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 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 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 年 2 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 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鲧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他是抖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其肉身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扣了金钟、上了紧箍或吓破了胆。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弗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 1956 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帖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 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提反对意见的人"的白司长冲突起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气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

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

标志王蒙创作水准的，当然是 1986 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了。但如果我们回到 50 年代，将这位作者的开笔之作《小豆子》与 1956 年那篇受到来自相当一级的压力与批评的作品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出，逐渐成熟、并且对新生的共和国抱有切切之情的文学家们，正要冲破那只有纯朴的蒙昧才感到自在的一味歌颂的樊篱，向着直面生活并且热烈地干预生活转化。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 1956 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这种文字今天是极难见报了。对黑龙江森林大火的报道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早已练就一套本领，或侧着身、或闭着眼、或者低头缩颈，总之想方设法不使二者发生碰撞。而在当时，彭子冈们对此要么不懂，要么不屑。由她执笔的社论直截点到"尊重新闻记者"，喊出了即使在热切呼唤新闻改革的今天，也没有哪家报纸会公开印出的话语：

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①。这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他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像雷锋、像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加上他本人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作不到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①1956 年 11 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棐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没有人躲在暗处咬牙切齿或是磨刀霍霍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

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牟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支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支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文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礼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繁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7 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 4 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似的观望不前适成叶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 1956 年 4 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 1957 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 3 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狯，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

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容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的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9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已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

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人"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 50 年代末，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 60 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 月 27 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 7 年来第 12 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 15 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3.

【个人英雄主义】ge ren ying xiong zhu yi 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好出风头、逞能干。不肯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企图在革命事业中把自己造成"英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甚至损害革命和集体利益。

——《现代汉语词典》

1909 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

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 19 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上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行二，分家时得了 300 多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做不下去，人也做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即又出走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着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 17～19 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 200 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分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 1928 年到 1932 年。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 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像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在他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部

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留学成了他日夜索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学，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 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 20 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今天，35 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60 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英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卞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 21 岁，而 22、23、24 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 30 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这篇序写于 10 月，11 月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遇难恰在那年 11 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致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虽然他们的名字自 1957 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 10 万字的书，居然完成

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对英国式的公道（hairplav）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亲情之爱，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s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元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第二代新月派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得过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 60～80 元一个月，他则拿到 120 元。25 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夫球，客厅可招待七八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禹、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学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

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sy 大为光火，成了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 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须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善卷洞、张公洞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 2000 元官费——这就是在 1957 年屡屡被提到的"和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现社会公有。储安平 27 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终身"。

他没有组党，参加党派的时间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 1928 到 1948，还是 1949 到 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 19 岁到 57 岁的 40 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分：哲学家、律师、记者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 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 4 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分，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 4 镑，合当时国币约为 65 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 24 镑。"他如何节衣缩食呢——"那时，因脚爪之价格较猪肉为廉，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sy 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 3 岁，一个 1 岁，丢给了外祖母和祖母。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 1957 年，"章罗联盟"说提出，在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 1937 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 3 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还是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悼了这个"肥差"，经当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不能说他在那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到 1948 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不愿侧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不少光华

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 1941 年。储安平那年 32 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 3 年之后，在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 Lusy 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面的赏识。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 10 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黄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 1957 年批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 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言。尽管这样，今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于弹而靠理性与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 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他正以参政员的身分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他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是一份闲差，储安平却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色雾心平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这很像是

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编。

1946 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 OBSERVER 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 1946 年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 年 9 月 1 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4.

【勉强】①谓力不足心不愿强而行之也。《礼?中庸》或～而行之。《汉书?严彭祖传》：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云贵人左右之助，经意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彭祖性廉直，不事权责，此所云勉强，盖欲其曲意交结责人也。又日本语谓勤学为勉强，即勉力之义。日本商店称格外克己亦曰勉强，则为曲意俯就顾客之意。②犹怂恿也。《汉书?卫山王传》：日夜纵臾王谋反事。纵臾犹言勉强之。

《辞海?1936 年版》

储安平没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京迎接解放的。

那时，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跃，民盟总部（工作委员会）3 月 5 日就迁到北平了，比中共中央还早 20 天。不少学术性团体已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大家都准备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

储安平在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党派，而且不入则已，一人就人了两个：九三学社与中国民主同盟。两边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称往来颇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边是许德珩许老；民盟是费孝通——今天也已是费老了。储安平当时虽然这样向袁翰青解释："两边都请，不好意思，两边都参加吧。"私下里实在是很有点小小的得意的。

看来那时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对他们的唐突为意，不过后来储安平也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民盟人才济济，储安平在这里很难脱颖而出——不像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夫子。1959 年戴了帽子之后，这两个党派倒都未将他除名。这一举措，造成今日仅余 5 名不予改正者全部为民盟盟员这一现实。

储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学胡同，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周恩来亲莅该旅舍，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安平不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人，此时却深为感动。他后来对袁翰青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而且谈得很高兴。"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称为高贵，总可称为自由的心灵，就这样一下子被俘获了。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周的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再一个就是，他们太高兴啦：在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屈辱和牺牲之后，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光明的局面终于盼来了！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①！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这批民主人士心中的戒备、芥蒂，或许还包括他们独有的理想与判断力。满心欢喜的储安平这时显然忘了他对于"中共搞经济

恐怕不行"的担忧，也不再顾虑他断言过的"自由的有无"。新政协就要开会啦！民主联合政府就要组建啦！新中国就要成立啦！

①这一想法或许可以与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着枪进城的老共产党员干部（他可能不怎么识字，身上却有七八处枪伤）的说法相对照。对于民主人士，他的评断是："他们的功劳如一根毫毛，把他们拨去也如一根毫毛！"

政协新闻界的代表共有 14 名，胡乔木打头，储安平名列其中。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结识了"乔木同志"。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 50 年代还是 80 年代，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虽然据称他们已相识多年、共同受到英美教育，甚至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人当然也有赏识他和愿意用他的时候，但当需要揭他、贬他、踩他，乃至在 30 年之后还不肯公开回忆他的时候，是很拉得下脸来的。恰如 1953 年，当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发生争执时，喊叫着不许梁再讲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民主党派的朋友。

当时《观察》被封已有 10 个月。胡乔木、胡绳等在此期间曾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这一连串的举措，储安平想来是知道的。因为在 7 月间平沪两地交通恢复之后，他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读者此时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坚持完全民办、不受党派制约的原则，正在从思路到语言一步步适应新的社会风习。

到了 1949 年 11 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刚刚选出这一重大时刻，《观察》在被查禁 11 个月之后正式复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储安平竟然没有想到请毛主席、周总理，哪怕九三的许老、民盟的沈老题个辞；首页的撰稿人身分介绍未变，刊标也还在，只是没有了周遭的英文 THE OBSERVER 与 INDEPENDENTNON PARTY，虽然表明了不屑沾洋的气概，从形式美角度看，却秃秃的没了样子。加花饰的首页刊也还在，不过去掉了"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

最为有趣的是，复刊上来第一篇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这可不像储氏风格，不知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编当时是正吃了一点批评还是有什么人劝他顶好取这种姿态开场。他让步了，费边社信徒历来讲究妥协（COMPROMISE），这又很像他的风格。至于标题的措辞，虽然储安平一生对文辞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简直能把读者吓退的用语，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用得出。另一个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的变化是，这类天经地义应由主笔写的文章，署名却是"本刊同人"。这里看不出储安平对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修正，在这复刊词里，他的自责是不大着边际的——这或许正反映了他此时认识上的不着边际：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这篇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怀疑。比如文中有"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似不像储氏之所为。如果真是他写的，也只能用诸如"入乡随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语来开脱了。而对于这种陋习，如果连储安平一类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迹其间，致使 18 年后优美精致的汉语弄到只剩下"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

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四亿七千九百万中国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接下来的是我们在文章首页上引的那段话：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还想在中国觅术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

考察储安平的一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会作违心的捧场之语的。从上文可以看出的是，他，以及相当一批类似的先生们，在换上中山装的同时，差不多也换了一个头脑，一副心肠。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装并不是中共的创造，蒋总裁和党团系的人都着中山装。储安平们为什么不在彼时而到此时才换装呢？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储安平与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到 8 年后的"向党猖狂进攻"，再到 17 年后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景况已大不同。是他变了对方未变，还是对方变了他未变——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翻作当代政治用语：前者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将矛头指向我们一贯正确的党"；后者是"在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下，顽固分子拒绝改造"。可见在储安平的下半生所处的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对人的估评多么具有服务于形势的随意性。

在这篇复刊词里，储安平特别强调了工作方式的改变：

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各种编辑工作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这样的工作方式，真是难为他了。储安平一贯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刊物事无巨细，一概一抓到底。据林元回忆，"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观察》的鼎盛期，发行量已到 25000 份，外加一套《观察丛书》）编辑还只他一个人，我是惟一的助手。"储安平亲自定题、阅稿、复

信、改定，直到终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连每周五清晨将版送往机场（周六全国同时见报），也是他亲自去。林元还记得他们二人深夜从印刷厂出来，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连只是一只而不是两只这种事，也由储安平亲自定。很难想象复刊后的集体主义工作方式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思想产品本无"集体"可言，这点安平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有什么主编就有什么刊物，主编的思想、趣味乃至习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思想、趣味、习性，本不言自明。强调集体，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性的一种堂皇的托辞，但若厚道一点，也不妨看作风气使然。不过话说回来，刊物办到今天，上面那番话也"可以休矣"！因为今日有幸与读者见面的任何铅字印刷品，全可铁定地认为是集体作品。虽然党曾一再教导"文责自负"，且几乎每个作者交稿时都把这一条绝望地强调再强调，稿子最终总难免被"集体"一番。比如诸位现在正读着的这篇文章，就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位置上的人"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集体"决定的结果。

复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队伍变了。试比较原《观察》第 10 期（1946.11.2）与复刊后的第 10 期（1950.3.6）的作者：

原《观察》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陈友松　北京大学教授

韩培德　武汉大学教授

萧公权　前燕京大学教授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陈瘦竹　国立戏专理论

编剧组主任

复刊后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翟宁武　南开大学研究生

陈治文　南开大学

许诚　不详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郢瑞、白磬　不详

田欣　南开大学学生

肖玉之　东北银行工作人员

李有文　大学讲师

陈醒民　华大政治所所员

昔开枬　同济大学学生

再看文章内容：复刊后的《观察》频频刊出诸如《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看齐》、《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劳动先锋马星祥谈50年大生产》、《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党内理论家胡绳开始给《观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观察》的风采又具新《观察》的精神：《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郭沫若的诗作也第一次出现在《观察》杂志上——《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活跃在复刊后的版面上，当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吴大琨教授提出，《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在吴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说，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调整等等都还没有发生，作者本人当然一时无法对"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作一界定。从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达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实际上的不足：

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过去乃至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并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高到这个阶段呢？能够肯定地对这问题作"是"的回答的朋友们，应当是更少的。

这一论断，从文章上看，不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经济学（如果有的话）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本人政治素质的判断上。当然，这一判断，用今天的观点看，是过于天真烂漫了：

毛泽东主席是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现实革命条件，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者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地把我们的学习水平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理由。

费孝通教授圆熟的风格在复刊后的《观察》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结合在生产中"。但，"在意识上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赖以生产的本领是知识，是脑力劳动，有类于小生产的手艺工人"。由于这种"白领阶级""缺乏集体主义"，虽然"基本上是被雇佣者，既然不易有集体力量来保障他们的职业，就只有顺从和谄媚雇主来免除失业的威胁"，虽属劳动阶级，但往往"出卖了阶级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反而站在剥削阶级的阵营里"。并且由于"受了个人主义的毒"，而"观念上不能彻底，不能有远见"……

可悲的是，这不是惟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的和最经常的撰稿人，费教授显然还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卖力尽管卖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点过于疲软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点过于甜腻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文格渐卑庸福近。

漫画此时也变了风格，虽然漫画主笔依然是方成。在一幅画中，读者可注意到马、列二人及党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绝对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闭着嘴的工人与张着嘴的干部前后的那巨人的脚印。从画上看，这穿皮鞋的人是从后边超到前边去了，且个头极大，谁呢？不会是导师幽灵吧？幽灵连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脚印？

旧日《观察》的风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如在第 8 期上推出的一则"献刊购债"，就颇具储安平式的机巧：由《观察》献出 200 个"3 月定户"，"把收到的刊费去购买公债，读者先生一方面帮助本社多购，一方面自己又订阅了刊物，公私两利"。这一计划后来兑现了七八成，可见《观察》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这已明显属于小打小闹了。

复刊后办了 13 期，不得不收刊了，当然用的不是这个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一篇短短的"改组声明"（1950 年 5 月 16 日）：

《观察》社同人为使自己的工作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决定将本刊加以彻底的改组。《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新观察》半月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内时事刊物，由新华书店出版。其内容如下……

这一行动 35 年后用《新观察》"自述"的口气说起来，已另是一番风采，在这自述中，储安平与原《观察》已不见一点痕迹：

1950 年 7 月，我诞生了。一位历史学家和儿位有经验的编辑，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象……我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本身也在不停的变革之中。仅仅半年时间，历史学家走了，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新闻记者又走了。这时候，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女画家又将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为一本时事、政治、通讯报告和文学、艺术、生活的综合半月刊——"恬淡清新、图文并茂，上下古今、无所不谈"①……

①这四句话出自乔木。

文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话说：

1950 年以后，我就开始成为党中央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到 1960 年调出为止，我所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 年 5 月 1 日创刊的《新观察》当然属于黎耐的这一工作期之内。据林元回忆，当时政府待《观察》的老职工颇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体工作安排在新闻、出版系统，北京上海随便选。林元选择北上加入《新观察》。他清楚记得，黎淘曾通过储安平频频催他尽快成行。想来这时两位主编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筹备新刊。

但《新观察》的办刊方针与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储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经是黎澍要通过他一次次请储安平到社里来的局面了。储来得很勉强，到后来则根本不露面了。从他的爱刊如命外加上刚愎自用，到此时闭起眼睛、硬起心肠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这时已到 1950 年底。

他显然是带着与这位编过《文萃》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深深隔膜离开的。他不知道。而巨他永远不会知道黎澍的见解了。

"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申报》办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报》；《观察》也非要换个名字收编，气量之狭小，无以复加。"

储安平随后即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他当时或许有重打鼓另开张再干它一番事业的心愿，因为不少人都记得他曾经提过的各色各样的建议。他甚至亲自蹲在总店的门市，打算过问书籍上架等事宜——这都是后来人们怀着对他的怜悯而当作笑话谈起的，可见当时就不曾被认真看待。他的努力像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全部吸收进去而无任何反响。

1952 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他未见有什么特别的作为。34 年后，一位他当年不曾觐面的部属，湖南岳麓书店总编辑钟叔河再版了他的《英国采风录》（距初版已有 40 年）。钟叔河怀着一丝难于察党的伤感写道：

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过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 50 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

据说为出这本书，钟叔河还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国当记者，并且跟储安平还很可以谈谈的老友萧乾的意见。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储把英国说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再版无疑将再一次误导青年。听了这番意见，钟叔河还是决定出。不幸的是这本前发行局长的书只印到 3000 册（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国的好书大多是这种命运），连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学生们都没有见到，足见几十年了，中国的发行工作依旧令人莫名其妙。

到了 1953 年，"上边"曾对前边讲过的收编行为有了一点反省，有意成立"新观察社"，由储安平任社长，戈扬任总编辑。不料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体工作人员的反对，其中以与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为激烈。他们是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呆在非党人士的"麾下"？要么就是储安平那种自己不要命连带别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让人受不了？再就是他的不知怀柔，用今天的术语说是不懂"感情投资"着实伤了一批人的心。其实储安平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没有悟到这也可以当作"本"来赚取利润而已。作过《观察》南京通讯员的冯覃燕至今记得 1949 年他结婚时，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的情景。那是正在流亡的储先生写来的，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抱歉说无法来参加婚礼了，只好简单地写封信祝贺。"50 年代初，也就是储安平在发行局长任上的时候，冯覃燕到北京求职，"储先生到车站接我，那时每位局长配备一部三轮车，车夫兼勤务员。接到之后，储先生让我坐车先回他家，自己说了一声'还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 年，他开始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分赴新疆采访。此行看来并非出于乔木单独的决定，而是与安平本人充分商议的结果。读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储安平对新疆和新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在伊犁骚乱前后长篇连载一位不知名的投稿者的长篇目击报道，又不顾别人的反对，出版《观察》新疆专号。他一定渴望亲眼看看新疆，特别当这片广袤与慓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储安平在有事可做的时候总是精神十足。《新观察》总编辑戈扬清楚记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他上飞机的情景。为这次采访，专门给他配了一部车和一名助手，储安平对此相当满意。他的报道一篇篇发回来，在《新观察》、也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接着还出了单行本。然而，除了"乔木同志感到很满意"之外，这批费时费力不小的通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人们当时就没太注意，到今天差不多已经忘干净了。这情形不知储安平本人有没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着，把孩子们丢下无人照料。

就在这一片匆忙之中，1956 年来到了。

和 1976 年一样，1956 年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私有制在中国被消灭；至今还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了。5.

【谋】mou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 年版》

在 1957 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

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 3 月 10 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分不详而不是从未公开的 CP；第二，早在 9 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在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①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 1927 年或 1935 年之后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①，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 1939 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 1946 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 1955 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①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 1956 年 10 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 1957 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 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提、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臻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臻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 Fair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 Prf.Lascki 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 1949 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 10 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 年 11 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 40 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时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 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

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 10 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 8 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 30 年后，在 1986 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 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 9：00 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 1957 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①，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 1966 年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①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着讲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先是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嘛！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咸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提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央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领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

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 月 30 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部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 年 4 月 1 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 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外，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 1946 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中、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当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 月 9 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 月 1 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特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驾。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国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音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入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 94 位同志，其中 26 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分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 4 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 50 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吗？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 1957 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

成立杜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①。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①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5 月 7 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4 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惟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 1957 年 4 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 80 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姿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

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 1957 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 70 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 5 月 1 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 5 月 6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

"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 1957 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①（陈铭抠）；

①"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扬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她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已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 月 30 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 Very good，Veryg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

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两天；李维汉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两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始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 1957 年 1 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 4 月 30 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 4 月 30 日到 5 月 15 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 5 月 10 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

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 1910 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①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飞凤舞的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5 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 16 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 30 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 5 月初而是 5 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两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

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怕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捐出卢郁文①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①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接着，6 月 9 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 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 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 月 11 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 月 15 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 月 21 日）。

7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 4000 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持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 1978 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 月 9 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这名曾以他的谋略令一批又一批中国精英人物倾倒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领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而言，都可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

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征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6.

【命】梵文 Jiva 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 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踱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 1953 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 20 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 12 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见到 20 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 1987 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 1966 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人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11 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惠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①的储安平呢？不是 1946 年的他，不是 1957 年的他，60 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①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 100 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已被摘的可能性①。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②。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 1961 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①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璧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璧记得 1959-1960 年间。他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分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coc2

②一般人：包括他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抠门"。据此节看，他的"抠"，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瘰疬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私宅。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经 1 点了。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 A 夫人。A 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分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惟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 1947 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 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咸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缥缈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吗？这死还可惧吗？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地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地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 1966 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瑰，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和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地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固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 1966 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 1957 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 10 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 1947 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苏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

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 A 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的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吗……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 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大多的训导和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做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 1957 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 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 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 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 4 中、91 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两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总书记关于"党政分开，党不可过多于政"的郑重宣布——这不就等于说，"党天下"是要不得的吗？还有那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1988 年夏，在会见埃塞俄比双总统门格斯图时，他说："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 20 年。"他说了，他是这样说的。老友，老友，你听见了吗？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么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 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 1957 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剑感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但徐铸成活着，至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 天。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在这里，谨向储安平先生的老朋友笪移今、冯草燕、林元、袁翰青、李义、刘啸虎、袁影尘、梁漱溟、徐铸咸等诸位先生及在查找文献过程中给以大力帮助的雍桂良、周国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关于三峡工程有关问题致人大的信

尊敬的楚庄委员并转致各位有关委员、副委员长及委员长：

最近看到一部由一位欧洲独立制片人所制作的关于三峡工程的电视片[①]，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万一(三峡工程)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呢？

李伯宁[②]：万一……不存在这个事儿。如果万一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国家决策的失误了。

三峡工程于 1992 年在国务院提案的基础上获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也就是说，七届人大是这一工程的最后决策者。但人大，特别是参加投票表决的人大代表们，是没有可能就提案的技术细节亲自进行调查的。他们投票时的依据，是那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所作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副总理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以及附在这两个文件后面的《提案说明附件》。而这三个文件的成文，责任者当是那时的职能部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特别近年来直接为该工程付款的居民[③]，经过数年调查，发现三峡工程的主管机构(从筹备到论证到施工)和人员，在该工程的重大问题上对人大作了有意的隐瞒。而当被问到责任由“谁来承担”时，又将其推给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愿作为一名个人调查者，将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获得的情况对人大作一如实反应，恳请人大组织调查，防止工程所造成祸患发生。

(一) 总投资预算

1995 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 亿。而三年前，当该项工程提请人大通过时，所给出的数额仅为“静态投资￥570 亿元(1990 年价格)"。

主管人并非不知道，在 90 年代的中国，静态投资是没有意义的; 而早在 80 年代后期，金融专家一再提醒“不可忽略物价上涨对总投资的影响; 不可将贷款利率忽略不计”，且已经明白提出“￥5000 亿打不住"的警告。[④]

为什么在提请审议通过的文件中，只给出静态投资，这是不是有意给代表一个投资不大的印象？ 对实际预算将达到￥6000 亿，有没有隐瞒和谎报？

(二) 移民

在 1992 年的《说明》中，关于工程移民，所给出的是 1985 年统计的淹没地区人口 72 万 5 千 5 百人，对于工程最后完工时移民总数则绝口不提。据我最近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在 1991 年 11 月 6 日一次内部的汇报会议上，主管移民工作的李伯宁说："按 1985 年至 1990 年 19 个县市的实际情况统计，库区人口每年增长 21.93‰……，如按这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来计算，到 2008 年直接淹没人口已不是 113.38 万人，而是 130.36 万人。如果……1993 年进行施工准备，20 年完成全部移民的规划，到 2012 年，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全部移民为 131.44 万人"。到了 1992 年夏季，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关于三峡移民问题的会议上，在内部给出移民“将有 120 万以上"这一估计之后，李伯宁关照在场人说：“你们不要公布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只说 100 多万"。

其实，早在 1986 年 12 月 2 日，他就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说过，"现在大家都把移民问题作为三峡能不能上马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提出的移民概算，也是决定三峡命运的概算……如果仍按过去的老概念，提出一个大大的赔偿帐本子来，那就会把三峡吓回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马马虎虎地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大帐来，这等于给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提供一颗枪毙三峡工程的子弹。”

三峡工程移民究竟有多少？ 这其实不难计算：工程在 1993 年开始，按照目前已认定方案的蓄水位，将在此高程以下之居民，再加上施工期人口增长(21.93‰)，至 2013 年结束时，湖北移民将为 26.5 万，四川移民约为 172.4 万人，两省总计移民将超过 198 万人。这还没有将社会性人口增长和搬迁的二次移民考虑进去；还没有将 175 米到 185 米间可能临时跑水的人算进去；还没有将库尾淤积壅高水位之后给上游造成洪灾的移民算进去。

三文件所给的 72.55 万是不是在明知不止此数的情况下有意给代表一个移民不多的印象？三峡工程移民到底有多少？

(三) 泥沙

在提交人大的《说明附件》中，关于泥沙问题，特别重庆港淤积碍航问题，所给的结论是：“采取……措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保证通航”。

实际情况是，虽然关于泥沙的模型试验一直在作，直到 1988 年 7 月， 在有关专家的一再催促下，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才不得不进行大洪水年的蓄洪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三峡水库尾部将发生大量泥沙淤积，重庆主要的九龙坡港区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码头前沿淤成很宽很高的边滩，对航行条件和码头作业都非常不利；嘉陵江口的沙坝及朝天门码头前沿的淤积更为恶化。但这一结论既没有进入 1988 年 2 月完成的泥沙论证报告中，也没有向中国公众和通过该项议案的七届人大公布。1990 年，政府部门中主管者(钱正英部长)动用行政权力，告诫知情者，不许谈这个问题，说是“怕影响论证”。[⑤]

三门峡工程由于不肯重视科学家关于泥沙的告诫，开始蓄水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因迅速漫延的

库尾淤积动手改建，尽量将拦在库中的泥沙排下去，以解决除陕西段的威胁。开管打动排沙排到今天(历时 34 年)淤积还在抬高。在三峡工程上对淤积的重大险情有意隐瞒，会不会导致类似黄河上的情况在长江出现？

(四) 环境影响

1984—1987 年，在国家科委的协调支持下，一支包括 38 个单位 600 多人参加的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队伍，全面系统地展开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正负效应值之比为 1：80(180 米方案)，从生态与环境角度考虑，对工程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由于对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科学院的论证结论不满意，1986 年工程承接部门原水利电力部重新组织论证，环境影响结论变为“有利有弊……只要思想重视，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给以必要的资金投入，采取治理措施，可以将不利因素减轻到最低限度，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给人大代表弊害程度不十分严重、有能力解决的印象。

这一结论的得出，依据是 1991 年补编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即由中科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科研所联合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最后定稿阶段，中科院和长江水研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原始数据使用到结论，均存在分歧，不得不一段段分别阐述、分别具名。最后，这份报告书“由水利部主持审阅，进行修改”，修改了什么呢？ 有证据证实， 主持者以篇幅过大为由，将中科院的观点根据自己的意见删去，只保留其署名，《报告书》成了看起来由两家署名但只有一家观点的文件。

现《报告书》原稿仍存科学院，请人大调查水利部所做修改是否有意向人大隐瞒了严重情节。

三峡工程关乎百万人命运，关乎中国繁华腹地的命运，关乎中国稳定。作为一名调查者，既然已得到以上证据，不敢不向人大反应。我愿进一步接受人大的询问，并提供全部原始素材和调查线索。

原《光明日报》社记者

现北京市居民

戴 晴

1996 年 7 月 10 日

联系办法：

通信：北京邮政 8731 信箱(100080)

[①] 《THE DAMMED》auther and director：LEO DE BOCK

[②] 原水利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地区开发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自 1992 年以来，国家提高居民生活用电费，全部款项投入三峡工程建设。

[④] 见《长江长江》乔培新:〈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⑤] 1990 年 7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的交谈。

再访俞伟超戴晴

□ 上一次采访时，您曾对我讲，对三峡文物古迹保护迁移的调查规划，学者们从前年 11 月起，一直在"借贷运行"。现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已 8 个月，这项规划进展得怎么样了? 答应你们的钱到位了吗?

▲ 为规划所进行的三峡地区地上文物古建和地下考古的调查，从 93 年 11 月开始部署，全国 20 多个最主要的学术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北大、清华、天大等等，都去了。我是 1994 年 3 月被正式任命为规划组长的，一上来就和三建委谈规划经费。接下来的情况你知道了，一直未给，直到去年 4 月，那时距正式开工不过半年，就在这地方，我请来了三峡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还有湖北、四川的移民局，开了几次会。到了今年的 4 月 31 号，开工已经又快半年的时候，我才和三建委移民局，外加湖北、四川两省饥民局草签了一个合同。 5 月上旬，规划经费已按照合同下发。

□ 真是谢天谢地，看来三建委的移民主管，也就是文物抢救的主管李伯宁先生和他的继任唐章辉先生，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和所担负的责任来看，终于具有了应具的人文知识，知道这桩事马虎不得了。

▲ 你这么看? 让我来告诉你。去年 4 月开始谈经费，直到今年两会前，钱一直没有到手。今年 4 月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商会议)召开。会前，我们召集一个汇报会，向有关的学术界和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报告三峡文物保护规划进展情况。报告完毕，大家纷纷指责我们，有的说: 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你们竟然默默地干，为什么不敢向三建委、国务院喊得更厉害? 有的说: 92 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预算的时候，怎么没有把文物保护经费计算进去 ……

两会期间，人大一个提案，政协一个提案，新闻界也写了几份内参和公开报导，呼吁: 第一，文物保护的规划经费须迅速落实; 第二，这项经费数目不合理; 第三，这样的事应由中央统筹安排，不要交给两个省。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还以个人名义给邹家华写了一封信，并在人大期间口头同他谈，提出文物保护费用不能放在移民费里，应单独列项。我本人也给邹家华写了信，只谈一件事: 规划经费再不落实，工作干不下去了。这样，邹有了一个批示，

批给郭树言，郭再往下批。最后下了命令: 限定 4 月底以前一定要落实。所以说，这笔规划费，是在大家的呼吁帮助下，在工程正式开工半年后才交到我们手里的。

□ 但实际上你们的工作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吧。也就是说，现在应该已经掌握了一个必须保护迁移的大数了吧。

▲ 今年 8 月底至 10 月底，22 个县的规划上送; 12 月底两个省的规划完成; 到明年 3 月，总规划完成，共 25 本。至于究竟有多少，据我们现在调查下来，是 1270 处(见【附】)。

□ 问题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三峡工程分阶段水位上扬之前，有哪些是必须抢先发掘或迁移，若抢不下来一定愧对子孙、也愧对世界的呢?

▲ 总数加在一起——我昨天开会还说，我们给出的数字，不要太随便，宁可稍微压一点，把似是而非的去掉——400-500 个左右吧，这是没有问题必须保护的。淹没区，地上建筑，不加迁移的话，全部被毁掉; 地下遗址，水一淹，基本被毁掉。所以，有 50 多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必须尽量发掘，因为太珍贵了，它将回答这一地区一、二十万年以来到万年以前人类的活动、分布及石器制造工艺的问题。双堰塘、李家坝等数处巴人中心遗址，也都必须全面发掘。再就是古代墓葬群，《水经注》有记载的云阳故陵楚墓，必须发掘保护起来吧。还有好多处地面文物: 汉代的无铭阙、丁房阙; 明代的石宝寨; 巫山大昌镇和姊归新滩明清民居群; 当然还有摩崖石刻，从隋到清都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白鹤梁枯水题刻，最引人瞩目，稳妥的办法是建一个水下博物馆。从技术上说，中国可以作，现在委托天津大学在作规划设计，初步估计是一个多亿，而意大利的水下博物馆大概是一个多亿美元。如果不建，以后它就处在 80—100 米的水下，再也看不见了。清代的云阳张飞庙，由于当地群众呼声高，也会迁移保护。

应该说，建国 40 多年来，文物保护积累不少经验，考古发掘与研究，已有相当实力。但中国“文物富庶区”实在太多了! 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的三峡地区，一直没有投入力量。这一回，经过这一年的调查规划，对这一区域内文物古迹的重要性，就算不能说彻底，也有了相当基本的认识。我认为，国家应集中最主要的经费和人力，一刀切下来，把基本的东西保住，总算留下一点东西。其余的就算淹掉，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 问题是这一刀切在哪里，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经费? 我记得 1991 年水利部的长江规划委员会曾经给出过一个数字: 三峡工程共淹没文物古迹 60—70 处，估计￥6000 万就够了。这数字还有效么?

▲ 这是水利部长江规划委员会 1990 年提出的，不知道他按什么算的。94 年 11 月，国务院开了会，文物费用从 400 亿移民费里出，估列了一个数字，3 个亿左右，这个数目是作数的。

□ 不可能吧? 我们上次谈到的，如果水库选址在文明发达的地方，文物保护迁移费大约是总投资的 3%到 5%。以三峡的历史积淀，有足够的资格引用这一比例。那么按照总预算的保守估计 1200 亿，算下来应是 40—50 亿，怎么才 3 个亿?! 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加上附近一些建筑迁移费就是 10 个亿! 三峡 3 个亿，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签字了?

▲ 这是白纸黑字的正式文件——在去年年底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总投资测算报告中，专

业项目改建、复建补偿投资中的第 10 项给出的数字。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情况: 就在草签的前几天，我的对方是是三峡工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我对他说，今天我们两人谈话，没有别人，你自己说，三峡工程移民费 400 亿够不够? 他不说话，光笑。

我说: 虽然国务院召开的会议形成了文件，但我知道 400 亿对你说来绝对不够。从 400 亿里边出 3 个亿给我，我告诉你，同样不够! 不同的是，400 亿不够你不怕，因为 100 万农民会喊; 而我这里死人不能喊。

他说: 你看，国务院规定搞限额、作规划，这件事情我不好讲话，也没有力量讲这个话。现在是我们移民局和你们文保小组签字，这个数是限额，我不能说可以突破。

我说: 我跟你讲，我们是学术界。能拿出多少钱，是政府的事; 实际需要多少，我得如实告诉你。作为学术工作者，我要对我的工作负责，不能为上项目，看政府肯拿出多少钱，我就说需要多少。现在我能说的是，文保 3 个亿是绝对不够的，这个字我不能签。

他说: 如果上级部门要求你必须签，你怎么办。我说很好办，我辞职，你找别人。最后他说，这样吧，我们达成一个谅解，两句话: 尽量在限额里作，超出限额，可以提出。所以，我签署的合同里有“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保护经费”这样的话。

□ 有没有说允许超出的幅度?

▲ 没有，需要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有了作规划的经费，到明年初，规划的大致轮廓就能全部交出，国务院还要请其他部门的人来审核、讨论通过——我估计政府所能拨出的经费与我们的实际需要会差得比较远。我们跟长委会有一个大的有关文物保护的争执，我曾对他们三峡工程部门讲，若问我们的意见，不建不动，我们损失最小; 建了动了，我尽量抢救。这不是向你争多少钱的问题，即使你的钱提供得相当充分，也只是争取多抢救个百分之一、二十的问题，大部分抢不下来。到这时候，如果工程还非得作下去，文物也要保护到一定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呼吁国际支援了。

□ 问题是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先期动手和与工程同步推进，就文物保护而言，是不是有很大区别?

▲ 文物发掘不是挖白薯，挖出来就行，需要科学记录、科学清理。目前的情况是，即使有了经费，也肯定不够，损失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比较小的程度，这就是说，能抢下来的，尽量抢; 最理想的，也就是目前探明的百分之一、二十吧。

□ 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吗? 埃及阿斯旺工程的文物古迹保护拆迁的国际合作，不就是通过这一机构组织实施的吗?

▲ 现在不能提阿斯旺，一提，三建委就说:"我们和它不一样"。不知为什么，他们非常不愿谈国际支援。他们说:"有关海外支援，我们没有开口，你不能开。这权在我们，三峡工程不像别处，你文物局也没有权。”目前是两个问题，一经费、二人力，从这两方面，我们都应呼吁国际支援。就算最后政府给了钱，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量的工作，就算把全国文物考古的人力集合起来，也没有可能。

从实际情况出发，可分两步。第一步，中国人的世界，港澳台，去年 11 月，我和国家文物局的张德勤到台湾，作为中国博物馆界代表团，他团长我副团长。他说，这部分你来讲，我说: 三峡的文物保护，如果台湾的考古力量愿意来，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还有台中的自然博物馆，有考古力量的，我们都接受。当然，工作经费得自己提供。出土的文物，相同的，两件以上，一家可以拿一份——这个话是正式讲的，不管怎么样，张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来，我在香港见到许卓云先生，他的情绪很激烈，他小的时候去过三峡，他会在盖地基金会呼吁一下。

□ 港澳台以外的华人地区呢，比如新加坡?

▲ 这个话我们没有讲。我现在希望组织一个三峡文物保护基金会，可以是非政府的，根据我这些年的经历观察，工作不一定比政府作得少。对此，我希望政府方面能同意。三峡工程完工已是 21 世纪，按照人们的文化水准、道德观念来说，应该能从经济上人力上得到一定支持，。当然，人家投入了经费和人力，你要给人家一点荣誉。更何况这是对整个人类古代文化的认识，又不是国家机密，哪国学者研究都是好的，不要怀着过分狭隘的民族情绪。

除了一般意义的抢救保留，今天我们在三峡工程这个机会当中研究古代文化，我特别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和国际接轨。今天中国人文科学方面与国际的距离，在国内，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他不知道，一个国家，不是技术发达就能自立，没有人文方面的支撑，社会治理不好，经济发展最终也会受阻。就国际范围而言，六十年代以后，古代文化的研究愈来愈深刻，包括人类学、考古学，我们必须接轨，不接轨，会越来越落后。

□ 你的这个想法恐怕很难为人所接受吧? 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研究，失去它应有的地位，在中国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 通过对三峡文物的抢救，往前迈一步，有这个可能。举例说，古代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与今天还存活着的一个少数民族，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 这就是古代的巴人与今天的土家族。土家主要生活在三峡一带，湖北、四川，还有湖南都有。我希望把考古的研究跟民族、民俗学调查结合起来，对土家进行调查，做两个比较:一是文化上的比较，三四千年前的遗迹与今天的日常生活的联系比较。二是，作遗传基因 DNA 的研究。80 年代末以来，美国学者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看法，使 150 年来形成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概念，天下大乱。我们从三峡里可以挖到汉代甚至西周的巴人的墓葬，即几千年以前巴人的骨骼; 与今天的土家族里活着的人作基因比较研究，将几千年来的古文化和今天依旧存活着的后裔作连续性的比较研究，正是这一学科的前沿方式。同一区域内存在着古代巴人的遗存和今天土家的情形，太特别、太珍贵了。巴文化很有名，土家也是大民族。土家是巴人的后代，还是潘光旦先生通过文献研究，在 50 年代提出的。

再就是历史环境的考察。我已经和北京研究地理的学者联系，打算在三峡地区作一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地理环境的考察。这个考察可分两个部分进行: 一是遗址部分，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古代居民的生存环境; 二是单独作一些自然地质构造的剖面，先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有人类的地方，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有什么相互关系。

对我们几代学人说来，三峡工程淹没文物的抢救与研究，既一个艰巨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和难于抵御的诱惑。【附录】1271 处必须保护的三峡文物 总数 1271 地上 442 古建筑(含纪念建筑) 229(其中 7 处必保)桥梁 65 石刻造像 117 其他 31 古生物化石 14 旧石器 52 地下遗址(含墓葬群) 829 新石器 85 巴、楚人 150(其中 3 处必全面发掘)

秦汉 442

六朝 31

隋唐 7

宋元 30

明清 18 级别已批准 国家级 1 处 省级 10 处

报批中 国家级 8 处 省级 50 处

分文不发目的何在

戴晴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会淹掉一批珍贵文物。政府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政府具体负责的三建委（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当局，打算怎么处置呢？

新中国的官员们，先前的是比较熟悉革命，眼下的是比较熟悉工程技术。对文物保护，除了它在旅游和贸易上的小小功能而外，恐怕大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为什么 1988 年底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通过的《论证报告》，412 位专家中无一位文物考古专家、336 页的洋洋报告中，文物只占了 1/3 页； 1992 年国务院提请人大审议兴建议案时，对文物保护，在《总理讲话》中李鹏只字未提，副总理邹家华万言《说明》中只有一句“对文物古迹要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获得通过时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列项，只将世上独一无二的枯水题刻、石宝寨、古墓葬群等按其须“搬移”这一特征而归到了移民项下。所幸中国还有科学院、研究所和数十所有声望的大学。在三峡工程当局对此尚未列入日程——当然也就没有钱——的情况下，挤出自己本来就万分拮据的科研费，于 1993 年底开始了规划调查，也就是说，先要弄清楚，三峡工程将要淹掉的，究竟有些什么。

当时，28 所研究机构数百名科学家同时出发到现场，有的教师只住一天 6 元钱的旅店，其艰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后来成立的文物保护规划制定小组组长俞伟超当时用自己的名义签字画押，借钱救急。

这次摸底并一板一眼地制定出保护规划，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了今年 5 月，规划上交，只等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审批下来，以便着手工作，因为用当局的话说，“双喜临门”（香港回

归、大坝截流）在即，坝前水位将达 82.28 米，西边的巴东县将达 105 米（这一情况，三建委当局居然没有向负责文物保护的机构通报！)，规划中认定的 130 多处文物点即将淹没，抢救时间已剩下不到一年多一点了。令他们不解的是，日夜兼程地制定并送上的规划，三个月过去，竟是毫无回音。

怎么回事？

有人猜测，这规划是不是作得太大，花钱太多，让政府为难了？ 这话听起来让人同情，但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而且也确实投入了力量。怎奈以有限的财力人力，1949 年以来，在陕西河南等"又多又好作"的地块的发掘只不过开了个头，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的三峡地区根本还排不上号。这一回因工程迫在眉睫，考古专家们觉得再困难也得上了。不料勘察下来，竟使考古界欣喜万端。

这是由于，过去因为知之有限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巴楚文明，地下探测结论既出，呈现出一派辉煌。学者们不但探明了巴楚文化的交接处，还找到了巴文化的中心。更有甚者，这数千年前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极为兴旺地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支流上，

并产生了如沈从文、黄永玉这样强悍的族人后裔。将对巴人的考古发掘与对今天的土家民族、民俗研究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考古学的前沿——世界上尚无这样现成的一个范例。

三建委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 1992 年《议案说明附件》给出“古迹 44 处"时，集合了真正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规划》还没有作出来。但今年给出的《规划》是不是有点太过兴奋、太本位？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学者们出于专业判断，初步探明应该保护的共有 1271 项。考虑到实际予以保护的可能，这次列入《规划》的，只有他们认为应该作的 1/10，如地下本应作 829 处共 2000 万平米，他们忍痛只报了 50 处 200 万平米；如按照世界水电工程通例，凡具有相当文化容量的地区，文物保护经费应占到总投资的 3%—5%，这就是说，若按三峡工程官方给出的 1200 亿计，应为 30—60 亿； 若按三建委的负责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问时的 6000 亿计，就是 180 —300 亿；即使按照 1992 年通过的《议案》中的 570 亿计，也有 17—28 亿。在《规划》中，他们非常克制地申请的是 19 个亿。而考虑到 95 年规划组长俞伟超已得知国家只肯拿出 3 个亿这一现实，规划决定只为 1996 年最急迫的工作申请 3 亿中的 1/10，即 3000 万。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体谅国家了吧。

然而，据他们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复是： 一个钱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千方百计探询，方知《规划》送上之后，当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该项工作的专家，看能不能本着体谅政府的态度，删掉一些文物项目。不料这一回，竟连遭数度拒绝。最后，终于有一名毕业于民族学院的年轻的副教授脱颖而出，主动致信当局，提出《规划》没有体现“重点保护”的原则，给了对文物保护“分文没有”的行为以学术性的理论依据。

难怪 56 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甚至包括前红军和前官员要紧急呼吁了。

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信由执政的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盖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等了 10 天，仍不见任何动静。总书记连他们这批"国宝"都不打算理了么？ 这情

景该不会被处在一线、从而不得不常与三建委官员打交道的俞伟超“不幸而言中”吧——去年，俞馆长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是，“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政府不为专家们拨款，正有一批人不要政府的钱而干得起劲呢——君不见在新民谚“要得发，下三峡”的感召下，三峡地区的古墓盗掘与文物走私已日益猖獗。

载《亚洲周刊》1997

只有实事求是才成其为科学家

——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郭来喜戴晴

郭来喜

地理学家。 1934 年生，河南上蔡人，1956 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1959—1960 年进修于莫斯科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云南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

主要著作:

论文二百多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贫困，人类面临的问题》(1992)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1994)科学出版社

□ 众所周知，您是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 412 位专家中极为难得的没有签字同意的 9 位专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是从 86 年开始的。那次有 50 个学会推举 100 位代表，我是中国地理学会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参加综合经济评价组，还有一位参加水库淹没损失组。应该说，我从小就对三峡有兴趣，也很希望毛主席说的“高峡出平湖”能够实现。所以，参加论证的时候抱着的，是希望三峡工程能上的心愿。但是从 1986 年到 1990 年，前后亲身参加论证五年。我的感受是，对三峡工程了解得越深入，发现里面的问题越多。

□ 你第一次就自己的看法发表见解是什么时候?

▲ 那是 1988 年 10 月 16 日在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专家论证会上。这是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言，提出“三峡工程不可不上，三峡工程不可早上”。我的论点是，作为大坝电站，三峡的位置特别好:在中国的腹地，对华中华东的水利电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那时我感觉是，三峡工程上还是要上的，但工程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土石方开掘填筑量超过一亿立米@混凝土 2586 万立米的大坝世界第一，70 万千瓦的单机发电机世界第一，五级船闸、外加将万吨提升 113 米的升船机世界第一，移民规模世界第一……，不仅大，技术难度也很高，我一直提醒论证领导小组:“话不要说得太满，技术并没有过关”。所以，我的感觉，对这事必须如周总理生前所说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不出问题则已，一但出了问题，它的效益全完了不说，后患无穷。

☐ 你们那时这可算是孤立的少数。但那四百多位呢? 总不能说他们的签字同意没有一点道理吧?

▲ 我听了很多参加论证的的水利部门专家的讲话，第一，觉得他们是站在本部门本单位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更广的视野来考虑问题的；第二是过分强调三峡工程的优点，而把一些难题淡化，甚至忽略不计。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工程，这不是科学态度。中国建国以来，垮坝的事件出了好多次了。我是河南人，“75?8"事件(板桥垮坝事件)，一个 6 亿立方米的小坝垮掉就是几十万人葬身鱼腹，教训太大了。三峡工程多少?220 亿立米！要出了问题，那就不是几十万人的问题了。再一点就是感觉三峡工程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从流域开发的模式来说，虽没有一定之规，但世界上的大河工程，多是先上后下，先支后干。比如苏联的勒拿河、鄂毕河，美国的田纳西河、科罗拉多河，都是。所以我提出“先上后下，先支后干，择优而上”的原则。

☐ 但不管怎么说，花上几百亿，造一座破世界记录的上千万千瓦的电站，外加防洪航运效益，确实极具诱惑力。

▲ 三峡工程论证时把很多问题缩小了。比如投资估算，从初期的 200 多亿、360 亿，到 89 年的 570 亿、92 年的 750 亿和 94 年的 960 亿……谁也说不准是多少。当然物价有变动，可是基建费远远超过了当初的估算，而且还有很多费用没有计入工程估算。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国务院提倡对口支援，一个省支援一个县，还有很多大企业去支援库区贫困县等。云南玉溪烟厂支援万县，几千万元投进去了；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也投进了上千万； 上海支援，北京支援……这些都没有打入总预算中。我认为对一个工程如此特殊对待，与别人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三峡工程和别的水电工程投入产出就没有可比性了。把别家的算得很全，自己的算得很小，很多支出又不打在里边，科学性就很差了。

☐ 但光看这几个钱，胸怀是不是不够宽广? 作为"站起来的中国人的象征"，从孙中山到毛、邓，都希望这几个第一能够实现。

▲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感觉，三峡是个政治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所以有些话就不大好说。如果作一个政治工程，作为国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足干劲等等，那另当别论。但具体问题，如刚才说过的，是回避不了的。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是我们已经等了 30 年，耽误了 30 年了； 甚至说耽误了 70 年了。我觉得这话很不科学，30 多年前中国没有那么大国力，也承受不了； 70 年前兵荒马乱，更谈不上。就是到现在，技术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话这么说，是不是有一种以势压人的意思?

□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我最近两年的调查，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左右。但还是有人讲真话，科学家、工程师们……

▲ 在国务院最后一次召开的三峡论证会上，我有三个发言。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要讲自己认为应当讲的话，不可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能怕冒风险。在科学问题上，如果加进其他考虑而不再实事求是，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几次讲话，招来了不少帽子，主要是李伯宁。他在中南海点了我的名字，不止我一个，还有一大堆人。

□ 李本人是专家么? 这类点名是不是在论证会上?

▲ 其实论证会，后来我才知道，都是有目的、精心安排的。1990 年 7 月国务院开的那次，在会下，就有好几位做我的工作，希望我签字投赞成票。我知道，从水利部门讲，葛洲坝工程结束后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加上十几万家属，有一个去向安排的问题，建三峡工程他们有很多设施可以利用，以安定生活。从这方面讲我也很同情他们，希望他们有好日子过。但从全国来讲，这几万人十几万人毕竟是个小数，所以不能以此为出发点，去论证那些大话的正确性。我决定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按照规定报名大会发言。

我是 7 月 6 号报名的，稿子也早就交出去了，却给安排在 7 月 11 号。为什么? 我估计这里边有名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要留出时间，组织几个人针对我的观点进行批判……

□ 你肯定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起码在当时那个场合?

▲ 没那么容易吧。11 号，我上台发言。我说，6 号报名要讲的那个题目，已经有了文字稿，大家以后可以看，我就不再念了。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出于民族责任心，把许多问题重新思考，又写了一篇，现在讲我的新观点。

□ 你这不是叫人难堪吗，那预备好了的批判稿还用不用了?

▲ 照样用。三个专家按计划批判我原来的那篇，其中一篇叫《答郭来喜》，从机械方面，包括船闸、发电机制造: 回顾从建国初期的几百千瓦到几万直到三十万千发电机组制造的历史，说机械制造是有保证的——其实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攻关课题组才刚刚成立。

□ 但这算不上上纲上线的点名，哪怕有隐瞒、有虚报，说的也都是技术问题。

▲ 你别急呀。接着就是李伯宁的了。他先表扬了一大堆人，都是赞成三峡工程的。他的观点无非是“凡赞成三峡就是爱国”，言下之意不赞成就是不爱国，也不管这些赞成的观点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话说得是不是出了格。比如其中一位说到“要消灭自然灾害”，我问他“自然灾害是消灭得了的吗? 地震你能消灭吗? 台风你能消灭吗? 只能说抗灾防灾减灾。"象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反科学！只因为赞成三峡工程，就把它抬那么高? 另外有一个专家讲，华东又缺油又缺煤，所以必须修建三峡工程来支持它。我说华东是缺煤； 但石油，不讲陆上的，海上油田就有重大发现，那是不是华东啊? 这些例子他们很难驳斥我。他们必竟是水利部门，希望上大型工程，可以理解，但是要以理服人。

李伯宁还说赞成与不赞成的两派是我人为制造的。其实赞成或不赞成，早上、缓上、不上的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讲话，大有文革中打棍子之势，我非常反感。于是，他讲过之后，我连夜又写了一个发言。这次没让我讲。我把它交给大会秘书组，说给我印出来。我在那里留给了李伯宁一句话: 在爱国问题上我可以跟你开展竞赛，别看你是老革命。

□ 这是第二次了。1992 年人大通过那一回，你有没有发表意见?

▲ 那是 1992 年 3 月 25 号。从广播里听到邹家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我就连夜写了一封信。首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三峡工程，从体制上讲就有问题。一个水电工程为什么要拿到人大会上来讨论? 三峡工程可以人大讨论，京九南昆铁路为什么不拿来讨论? 那也是几百个亿的项目。这就开了一个先例，以某种手段来对付有争议的重大经济决策。人大代表就是一届，他举手同意，以后的责任谁来负? 更况且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一般都不了解情况。你让他表态，他怎么表态? 尤其是大会不提供另一方面的意见，也不给出其他可供参考的方案，他们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辞。

□ 你的信是直接寄给大会的吗? 代表们是不是像"正面材料"一样人手一份?

▲ 我写的信，题目叫"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十个问题"，先是传真给委员长万里，请他转。后来又复印了若干份用特快专递分送到几十个代表团去。我在信的开头说: 作为一名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多年的科技工作者，郑重而又恳切地吁请各位代表，对这项举世罕见的超大型工程，从严审查把关。可惜的是，这信印虽然发了，但是很受局限。后来知道有几个代表看到了，有位院士说，郭来喜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敢讲真话。我提的十个问题，这几年看来还是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些问题更严重了。

□ 据我所知，和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一样，他们拿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中下游防洪，你的信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所触及?

▲ 这正是我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正确评估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对 1870 年型洪水而言，三峡工程 221?5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只相当于 58 小时的流量；如果上游的暴雨与中下游地区重合，仍会有较大的洪水危害，因此不能把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过分夸大。至于 1991 年华东特大洪水，它与长江中上游来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不应作为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

□ 这 200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有保障吗?当年三门峡工程 360 亿立方米库容中也有 80 亿立方米作为防洪预留，可是还没等洪水来到，甚至水库还没有建好，库尾淤积已经使得使得原先设计难以实现。这情形会不会发生在三峡工程上? 据说"蓄清排浑”的运用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 所有的人都知道，长江泥沙的高峰和最大的洪水量是同时出现的，这时你到底是出于防洪而拦还是为减少泥沙而排洪? 即使通过大坝底孔加大排沙量，这个长达 600 多公里的峡谷型水库，怎么能使上中段泥沙通过排沙孔下泄而减少有效库容内的淤积? 美国科罗拉多河的米德湖水库就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而它的水库长只不过 177 公里，仅相当于三峡水库的 29?5%，年输沙量也只有 1?9 亿立方米，只相当于三峡水库来沙量的 35?2%。实际运行结果，

泥沙并不沉积在设计者所主张的死库容内，而是沉积在有效库容中，使库尾严重淤积。只因可科拉多河没有通航功能，这现象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 说到库尾淤积，三门峡工程是开工不到两年渭洛河口就塞上了，三峡呢? 对 1981 年四川大水大家还都记忆犹新，三峡工程的库尾淤积对这一类型的洪水的防止会有什么影响?

▲ 三峡水库建成后，达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蚀基面抬高，水流必然减慢，影响洪水下泄，延长滞洪时间，肯定会加重上游地区的防洪负担。更况且，水库运行若干年后，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庆朝天门水位可达 202 米，比现在的情形高出 7?7 米，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长江两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损失?! 特别在论证报告中已明确写到:"变动回水区和坝区的泥沙，淤积问题已有模型试验成果，但如何治理，特别是重庆港区水域的治理问题，尚缺少试验研究成果”，这就是说，水库变动区的碍航、库尾淤积有可能使重庆以上的长江、嘉陵江形成拦门沙而碍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0 年 7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交谈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并且说钱正英部长不让谈这个问题，怕影响论证。

□ 一般人，我想也包括在人大通过时投赞成票的代表的印象是，恰如邹家华的报告里说的，“三峡工程建成后，将改善通航条件，为繁荣长江航运事业创造条件”，难道这些晦暗之处连他也是瞒着的么?

▲ 也不是这么绝对。论证报告里就有: "三峡水库的调度运用涉及个各方面，防洪、发电、航运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许多航运专家都认为，如果三峡水库经常运用于拦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峡电站承担调峰任务太重，都将严重影响三峡工程通航条件，使航运效益受到损害。”重要的是，这些结论是专家组的意见，不是哪个人的见解。只讲表面的巨大效益，不谈其内在的矛盾，给人以什么都好的错觉，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还不必说，三峡工程施工断航其间，四川每年上千万吨的货物出入，采用什么办法加以补救? 靠现有的铁路、公路能承担多少运量? 要增加多少投资与运行费用?

□ 但邹家华报告特别强调的是"巨大的发电效益"，说是相当于 14 座火电站，每年能节煤 5000 万吨……

▲ 三峡工程能节省，难道兴建别的水电站，发出同样的电力就不是节省了? 用这样的语言论述三峡工程的巨大效益岂不是毫无意义? 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个工程的移民。三峡地区本来人地矛盾就非常突出，113 万移民"就地后靠"，在坡陡、地薄、缺水、海拔高处就地安置，能不恶化环境，加重水土流失吗?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研究所对三峡库区开县移民环境容量做了系统研究，他们认为开县“人口多、耕地少，环境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人口容量所剩无几，甚至有超载现象。三峡工程的修建，土地淹没，城镇迁建等势必造成更紧张的人地关系，环境将遭到进一步破坏，以致走上恶性循环的轨道。”本来库区就是个耕地不足的贫困地区，淹没的都是沿江的肥沃良田好土。在减少了 42 万亩地之后的土地，反而又能承受更大的荷载，还不恶化生态环境，这能令人信服吗?

□ 似乎是，三峡工程的效益实在太大，太具诱惑、太迷人了。据我看到的史料，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里边，似乎只有朱德一人一直没有赞成。到了 1963 年，毛主席自己也表示“我也不想干了”。对这项工程利弊的估计……

▲ 三峡工程利弊俱在。谁都知道，水库将使库区水位抬高，地下水位上升，将使本已发育的塌方、滑坡、泥石流灾害加重，使老滑坡复活，岩崩加剧(库区沿岸共有滑坡塌崩 270 处；库区有泥石流 271 处，其中 99 处在长江沿岸，每年泥石流物质共 1000 万立方米，新滩、链子崖岩体规模大，存在坝后坝的危险。这一地区污染已经相当严重，建库后，流速减慢，水体富养化扩散稀释能力减弱，将更加重水体污染； 影响四大家鱼繁殖、中下游平原区土壤潜育化、沼泽化都会加重，包括长江海水入侵将严重影响已经发生地基沉降的上海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没有弄清。仅论其巨大效益，不谈其负效应和预防对策，能说是合理的吗?

□ 你的信里有没有提到造价? 三门峡和葛洲坝的"钓鱼"特色令人难忘。三峡工程呢?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若是在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今天也"钓"起来，可真是让人吃不消了。

□ 三峡工程总造价静态投资 570 亿元(1990 年价格)有谁担保不是钓鱼工程? 开工之后再追加投资，谁敢说不给?上不去，下不来，怎么办?

三峡工程的巨大效益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利在明处，弊在暗处，现在只讲利不论弊，难倒是唯物的吗? 澳星升空失败应从中引出教训来。我们不要经济一好转，头脑就发热。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成其为科学家。

国共纷争

◎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 1999 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

有时间翻阅学者专著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 20 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 27 与 F—16 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 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 1949 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

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 老渔洋里 2 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 1921 年 7 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 12 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 年的中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

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 2 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 1920 年 2 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 2 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 2 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

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 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 1924—27 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 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

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 1938 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 1926 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 1926 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 1926 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 3 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 7 月 15 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

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 月 14 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 150 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05 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 1927 年 7 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 1927 年 7 月 12 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

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立于 7 月 26 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 8 月 1 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 150 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 800 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 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 60 至 80 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 1920 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 20 年代，它（包括 1924 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 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 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

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 1927 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 1949 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 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 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 年斯大林去世，1956 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 1949 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 1956 年，到 1958 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

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

在三峡筑坝，有功还是有罪

戴晴

1896 年 9 月，日本颁布《河流法》； 而同时，当局也正热切地筹划如何使用战争赔款以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1] ； 百年之后，1996 年 9 月，在名古屋一条美丽的河流以及那扼住清流咽喉的大坝前，日本一批觉醒者，发出了他们的《21 世纪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他们呼喊出日本人——或说全人类，在看到产业革命所推进的繁华之下的全部危机之后，所应持有的哲学。

就在这同一天，也是在一条曾经非常美丽的江上，中国人正日夜赶工。他们抓紧这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在这条 6300 公里长的大江中段最美丽的峡谷里，建造起一座据称是融汇了人类所能达到最高技术水准的超大型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不顾这已是一条大量携带泥沙的河[2] 、一条承载着繁重交通负担的河[3]、一条因森林遭滥伐而两岸多滑坡的河、一条须养育四亿人口已不堪重负的河。

这是一项受到最广泛批评的工程——除了抓住机会赚钱的公司和抓住钱炫耀技术的工程师们而外。国际上，从草根组织到媒体，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由于有了田纳西、阿斯旺、依泰普，他们的态度可以想见； 有趣的是，在中国国内，竟也一反往常一片“坚决拥护”，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不同意见的表达首先出现在为当权的共产党视为“助手与团结对象”的政协委员们中间。他们当中不少人享受着共产党赏赐的隆隆声誉和相对较为优厚的生存条件，多年来一直小心做人、本分自处，以此作为保障地位安妥的交换。此次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他们不但极具分寸感，且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将论争局限在科学范围之内。

在这样的意见也难于表达的时候，独立的民间出版物第一次出现。《长江 长江》（日文版《三峡？ ？ 》即来自此书）如果不看“前言后语”，也只是记者们对上述人士技术性见解的通俗阐述。它的意义在于，新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喉舌”的概念开始被突破，有着“官方记者”身份的“人”开始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行事——“前言后语”当然另当别论，它明确提出了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两名作者 1989 年以来自然也被中国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

上述两类人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虽然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其权力机构也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但自 1949 年以来，这一机构从代表产生到具体运作，无一不在共产党的操作下。然而，到了 1992 年，在通过三峡工程议案时，竟出现的 1/3 代表未表同意。这又是一个突破： 它一方面表明了这一工程广泛地不得人心，同时也反映这样一个现实： 全体人大代表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耳提面命的时代业已结束。

其实，就算在共产党高层，仅从 91 年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质询和意见表达来看，已与毛泽东时代有了相当的区别：他们已不仅仅只在政治意义上大作文章，而是考虑到了环境，考虑到了外部世界的意见，甚至考虑到了对不同意见的容纳。至于他们的意见就其结果而言似乎并未奏效，或许可以看做是由毛所开创的党内独裁的势力，包括政治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依然相当强大，转型尚须一定时间。

三峡工程究竟是谁的工程？ 谁将从中获利，谁会受损？ 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该不该付出环境的代价？ 作出这样决策的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 70 年来，在一个接一个独裁者手中，它已是几度上下； 最近十年来，公开的论争和私下的交易，更日趋白热化。它早已不是一个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强行推进和开始萌动的抗争，融进了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全部特色：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环境保护观念的萌发……；同样，在她的外部，正当《长良川宣言》所代表的对待世界与自然的哲学已然萌发的同时，不但国家之间还囿于原有的政治格局，无顾忌地攫取与无止境地享乐也还没有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中心地位退去。

三峡工程正在这样一个情势中进入人们的视野。

载日本《世界》杂志 1996 年

[1] 甲午战争赔款的使用分配： 扩充军备费为 2 亿日元，而建设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的费用为 380 万日元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 （一）》p127

[2] 1988 年数据： 悬沙输沙量为 4.62 亿吨； 即 1.31 公斤/ 立方米，外加卵石 27.7 万吨； 粗砂石 3 万吨，居世界第四位

[3] 预计 2000 年时下水过坝运量为 1550 万吨

在权与笔的护卫下

——评卢跃刚长篇社会纪实《大国寡民》戴晴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用 500 页的篇幅，讲了一个发生在陕西咸阳泾河边、一个不很大的村庄里的故事：丈夫打妻子，妻子不堪忍受，逃跑、闹离婚，男家不许女家不让，最后丈夫下手将妻子毁容。

这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听上去似乎和成千上百类似的爱恨交织家庭剧没什么大不同，但卢跃刚用了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进到了故事里边——不为叙述方便，只因为这位以“死缠烂打活老虎”著称的记者自己也卷进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了结的两桩案件中：一是须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毁容犯罪：当时年方三十岁的武芳被丈夫用稀硫酸烧得面容身体严重损伤[1]；二是报道了该案的《中国青年报》和该书作者，被施虐方控以“政治毁容”，成了一桩民事“诽谤”案的被告。

这可有点不像是普通的家庭剧了。

卢跃刚不得不走进那个小村庄、走进一级又一级武芳曾求告、哭诉过的衙门、会见一个又一个盼他、惧他、恨他、愿意帮他和打算看他笑话的人中间，开始了他艰苦的、不无危险的调查。现在，他写成了这部书，把一个他终于弄懂、并且以详实和无懈可击的一手资料托起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武芳本是一个勤快、爽朗、情感丰沛，不但读过书、还生相当漂亮的姑娘，不幸因为家里穷，由父母做主嫁给了邻村一个与她不大般配的王姓青年。婚后、特别生下孩子之后，身处八十年代，已经打开了眼界的武芳，对这个沾染偷、赌、还常常对她拳脚相加的丈夫已不堪忍受。故事由此发生：走避他乡外出打工的武芳，被两名村干部，动用了当地警察，开着村里的汽车，一边答应“保障人身安全”、“给办离婚”，一边将她强行拉回，安置在后来的作案现场“接待站”，以便丈夫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睡她”。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已不像一般的村庄和一般的家事纠纷处置了。

武芳不服劝、也坚决不让“睡”。干部们退了出去，最后走的一个人口说着“睡、睡”，熄掉了房间的灯，退到人头攒动的院子，只留下手里拿着一瓶酸的丈夫。接着，他的一个兄弟和三个嫂子进到那黑了灯的房间，五个人七手八脚按住武芳的手脚，扒下她的衣裤鞋袜，将硫酸撒向她的脸、耳、头、胸、腹……。

武芳被送进医院。

应该说，这起蓄意伤害犯罪尽管手段残忍，案情并不复杂。任何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其关键在于：

1）为什么由村干部出动将人拉回，有没有蓄谋？

2）丈夫为什么要用酸，谁的主意？怎么得到的？

3）那已经构成共犯的兄弟和嫂子为什么要在熄了灯之后鱼贯进来？

4）为什么关灯，谁把灯关上的？

应该说，这桩人证物证具在的伤害案，只消按照正常程序调查、并对主犯、从犯和共谋犯提起公诉并判决即可，但事情的发展与人们按照常理所预料的完全不同。

87 天之后，武芳因为没有钱继续治疗被院方抬回家。她得知，虽然丈夫还在拘押中，那兄弟进去几天已经放了；嫂子们没事；公安局检查院来过几次，简单问几句就再无下文。

她等着，一年多过去，那把她骗回来的干部、还有那拉灯的，毫毛未动；那提供硫酸的兄弟已经在家娶亲生子，案子大有不了了之的意思。

武芳在医院经过了四次大修补手术，母亲说"芳儿像羊一样，被人家活活地剥了一层皮呀！"；她自己也哭求："妈，你救我做啥哩！你救女儿是害女儿哩！"，在医院还一次次试图自杀……然而这回，她不打算死了：

她们（和她的母亲、姐妹）跑遍了省市县委和政府，跑遍了省市县妇联，跑遍了各个新闻单位。她们喊冤，她们下跪，她们悲泣哀号以泪洗面。武芳已经没有了女人的顾忌。光给人看毁坏的脸还不够，她掀起衣服，成百次地给人看头部乳部腹部惨不忍睹的创伤……。一个女人摘下头罩，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脓看血，掀起衣服给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陌生人看斑痕累累的胸膛，诉说、恳求、哭泣、下跪……（《大国寡民》80 页）

三年之后，在咸阳市人大的干预下，公检法的轮子转了起来：主犯被处决，那小兄弟判了十三年。行刑那天，村里隆重开祭，同时对服刑犯的家属优容。

武芳在这个以"烽火"命名的村里生活了八年，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和那小兄弟，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借他八个胆也不敢干……"村民们说。这回那胆子那里来的呢——"那个拉灯的人"还丝毫未被触动，案子并未了结。

"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再次开始从乡到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的上告，死也要讨回公道。

《大国寡民》的作者就是这个时候被卷进来的。卢跃刚走到陕西、走到咸阳、走到礼泉，查到了初始档案记录中那三个嫂子的证词：

当时在外面说话的人也比较多，不知谁说，"他三个嫂子来了。你进去帮你弟把媳妇裤子脱了。"……一会儿，武芳住的那个房子灯灭了，我和我两个嫂子先后进去了。

可见是受怂恿。怂恿者是谁？

正服刑的从犯的妻子因村干部对她的许诺并未兑现，已经委托律师对 "判刑的事实不对，判刑太重"为丈夫申诉，她说：

他哥给他要硫酸（没有说明原因)。要硫酸后六天至七天，大队把王茂新媳妇（武芳）叫回来。

（出事那天，三个嫂子和兄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

大约九至十时左右，王农业给我三个嫂子说，进去把武芳袱（关中方言，即裤子）脱了去。（105）

那么，用酸烧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

偶然间，几乎可说是途中邂逅，卢跃刚遇到了一个曾与那丈夫关在同一监号的人，他告诉该书作者：

王给我说，他估计他在“忙前忙后（关中方言，指麦收前后）就可回家”。听了这话后，我说，“你可能不的（得）回家。我在家听人说，你把你妻子烧得很厉害。”王说：“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长的儿子王农业给我办哩。”我说：“他为啥要给你办哩？”王说：“我给你说了，你不要给别人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干部看不惯。我用硫酸烧我妻子是农业教我的办法。我拿不住，弄得厉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烧我妻子时，是农业拉灭了电灯后我才实施的。此事发生后，农业给我说，让我进监狱后不要怕，不要给人说有他，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时间（内）保出监。几次我哥都给我捎过话。

（《大国寡民》107 页）

至此，一个名叫王农业的人：事前出主意、具体策划、介入作案；不仅现场怂恿、还于事后掩盖等等，已经十分清楚。其实，用不着卢跃刚调查，案发不久武芳在医院第一次接受调查时，就告诉公安人员：“农业最后出去的，他拉的灯”；而办案人清清楚楚地说的是：“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53）

问题于是变成，这个王农业是谁。

1988 年案发时，他是武芳嫁过去的咸阳市礼泉县烽火村水泥厂厂长兼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上届陕西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在《大国寡民》结稿时，正在活动本届省人大代表连任。毁容案发时，人们把他称作“王市长的公子”——他的父亲那时正在咸阳市副市长任上。

但区区一个三级市市长的公子，就得以如此一手遮天？

这就是《大国寡民》要对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话。

王农业之父王保京，是共和国的一面旗帜、一把“烽火”。据其自报，1946 年十五、六岁时就为“地下党做工作”、49 年当"支前小队长"。已经查实的是：49 年当粮店小伙计时撒过欢迎共产党的传单，但随即以“冒充公安”被拘留；虽然在村里名声不好，但成分好、“对党有感情”，有政治眼力。正如一名当地干部所说：“我们号召搞互助合作，他就办互助合作社；我们号召学习文化，他就办夜校；我们号召科学种田，他就搞玉米生产……”，于是：农会主任而互助组长；而合作社社长；而人民公社社长；连年获丰产奖章、出席积极分子、劳模大会；上北京、上莫斯科、见毛主席；第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行政和党内职务升到了市一级；九十年代退休时还发出时代强音：“主动离职”，以《赤子回归黄土地》受到省党报头版头条盛赞。

这实在不大容易。谁都知道，共产党建政五十年，连顶尖人物都“你方唱罢我上场”；攀到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工农劳模，也不过风光一时。王保京这样识不得几个字的人，靠什么保持他不衰的记录？《大国寡民》给出了答案：

1952 年，政府号召"丰产"，他找到县长，夸口他能玉米亩产 1200 斤——这是他“放开胆子按政策吹牛”迈出的第一步；

1953 年，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的膨胀（31.6%）与农村粮食征收的增长（8.9%）不成比例，政府出台搜刮农民的"统购统销"、以及对该项措置予以组织保障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这的决议》。王保京率先响应，“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运而生。

大跃进的 1958 年，他带头放"卫星"：先是"亩产由三万二"，随后跟着形势长到了 10 万斤、15 万斤、30 万斤，三个月后，这数字变成了亩产 240 万斤，最后响亮地喊出了那传遍全国且记入历史的著名口号：“人由多大胆，地由多大产”，并以此挣得了“农民科学家”桂冠。

本应反左最后变成“反右倾”的 1959 年，他叫出的是让主导政治力量听着熨贴的“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力量”；而到了 1964 年，在毛主席作了一点违心的检讨之后，王保京在报上高呼的，与后来一路走红直达副统帅位置的林彪如出一辙：“好心办坏事”、“成绩是主要的”——在关键时刻对独裁者充分体谅。

1966 年，"不兴玩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革命激情游戏"，王保京先想成立著名劳模造反组织，没成气候，但“学大寨”天赐良机是没有错过：烽火于是成了陕西的“小大寨”。这昔日劳模抓住风潮，再度在文革中大红大紫：那激情年代的全套把式对王保京说来轻车熟路——学毛著、唱歌、献诗、批斗……包括把自己七十多岁的小脚母亲弄到场上打篮球、弄到台上表演《三个老婆批邓》。政治压倒一切，王保京如鱼得水，烽火的事业也达到了它的颠峰：

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保京，谁就当官。（278）

待到文革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到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又闭幕，政治方向看看要转。这时：

倡导“实事求是”，清算“评法批儒批周公”运动，清算“批投降派”运动，清算“农业学大寨”运动，清算“学小津庄”运动，清算极左思潮，上到“四人帮”、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对着来的。……对烽火村的总清算要开始了。

但毕竟到了改革年代，有了以“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的态度坚持清查的人员。80 年代初，总算初步查出王保京自五十年代以来怎么隐瞒土地面积，怎么虚报粮棉产量，以及在积累政治资本的同时，又以此为资本向国家讨要[2]。

王保京这座谎言大厦还保得住吗？

尽管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媒体与权势再度运作，1981-82 年，不仅省报、省委书记，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都来过烽火。不知这批“笔杆子”如何研究、请示、汇报，并在何种原则下最后定夺，结果是：

全面肯定烽火 50 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322）

到了 1983 年，在权与笔的护卫下，摞起来有一、二尺高的调查材料进了档案馆，几乎落到了与其他重大、生动的中国史料一样沉睡的命运……“永久的胜利者”王保京似乎已经不但笃定善终，闹得好还能以此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舆论/权势"衣钵传宗接代……。但中国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村镇毕竟吹进了些许清新的风：烽火村的青年农妇武芳跳了出来——谁“劝”都不听，一心争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保京的“大内总管”王行兴说过：“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心里呢！”，“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帐早晚要清算”（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尝不知，有了"农民"身份这张大牌，他用不着惧怕官场上的政治对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农民——“他给（烽火村）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得好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如果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327）

武芳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邓小平改革以来，报告文学曾在禁锢的新闻与媚俗的文学间，试图代底层民众发出一点声音。八九年挫折过后，虽见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温软、甜腻“报告”频频出现，但这只是老的“专制/喉舌"时代的余音。《大国寡民》才是今日中国的代表之作，卢跃刚才是始于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最终强壮成熟起来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进武芳故事的同时，《大国寡民》呈现给我们一份 50 年代至 90 年代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体报道编年史”。在我们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发迹“德行”之后，这份浮夸与弄虚作假、当时政策要什么就放胆呐喊什么、充斥着诸如“人民公社红花怒放”、“党旗飘飘烽火魂”、“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累计百万言的“喉舌”杰作，可称作党将传媒视为统治利器，以及营造这一利器，即抽去文化人的灵魂，将其工具化的硕果，也可以称作中国文人——如果把周扬、邓拓、胡乔木等宣传员和对他们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话——的奇耻大辱。所有的人都熟知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如果有人对于靠“两杆子”把“老蒋”赶到了海岛，还怀着些许阿 Q 式的骄傲的话，这回看看当政之后五十年，由这“两杆子”造出的烽火典型和武芳案，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份编年史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的。

《大国寡民》给我们另一份沉甸甸的惊讶是，它发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过 50 公里的杨伟名等三名农民共产党员在 1962 年写给该党的主席毛泽东、和他之下的各级党组织的信。这封信因受到毛的亲口批评，成了严重的“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中农出身、仅读过几年私塾和数年基层工作经历的杨伟名受到的批判与整肃可以想见，具体说，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与二战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几乎化为齑粉战争机器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历五十年和平建设而匮乏如此，在外人眼里，似乎这时期的中国人，必是一个个怯懦糊涂、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杨伟名这封以“一叶知秋”而载入史册的信，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底层中国百姓所具有的

智慧、胸襟与胆识，也知道了改变了中国命运与轨道的所谓“邓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为底层农民条分缕析地论述；也知道如今出自当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话，如将所谓“养活十亿人口”视为自己一功、视为自身政权天然合法之依据等等，多么不堪一击：究竟谁养活了谁，谁弄得大家饿饭，恐怕已经不是下岗工人要问的问题。杨伟名和他所经历的一起：通过合法渠道，平心静气放映情况、阐述根由而遭来自最高当局的有意压制，更使人了悟专制对独立思想（包括这思想的载体，包括这载体并非“著名人士“而不过田间一介农夫）摧毁的罪恶。

如果没有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行兴那多达数十本、时间覆盖近 40 年的日记，对王保京现象的揭露恐怕会显得比较概念、笼统。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这名看来似乎属于典型为虎作伥的“大内总管”，竟然廉耻尚存；对“坏事作尽”必遭报应，也还心怀畏惧。当然，要是没有陪着“农民科学家”读大学的经历，不知这崇拜权势的乡下孩子王行兴，会不会有延续数十年的内心挣扎；在对主子鞍前马后伺候着的时候，能不能不忘时刻“留个心眼儿”。“王行兴日记”或许给我们些许信心：一是为知识所打开的心灵之扉是合不上的；再有就是，联想到已出版的李姓御医手记，今天那些在不同档次上伺候着的角儿——他们真是多如过江之鲫、抓起钱来也从不手软——或许还有谁也心怀怵惕，并给后人留下证词。

在该书的后半部，王保京终于遇上了一个对头。《大国寡民》给出了一名看起来与武芳案没有多大干系的人物郭裕禄：一样的劳模、农民企业家和省委委员，只不过有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差”—— 新劳模郭裕禄出在改革时代。应该说，这名王保京的刹星与他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相隔不过十五里的两个村庄的头面人物的差异，是生活在中共特别的政治体制下的农民为求生存（当然也包括求发达）的两种选择：

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

这样的人、这样的乡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才真正活起来、富裕起来。

其实，不同品格导致不同命运，并非从王、郭二人开始：

五十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和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年；六十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出现了以杨伟名所代表的“农民”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364）

这回谁将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践足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又赶上了改革时代，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智慧农民郭裕禄不再“只干不说”：既然给了他一个党内职务，就算谁都不说，他也得说，“一开（替王保京谋权谋利的）常委会，郭裕禄就把它搞砸”，锋芒所向，直指王保京为代表的、披挂着那个刚刚过去（甚至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的全部特色的恶风习、恶势力。王保京和他的“关系网”（包括为他笼络又靠他邀功的笔杆子们）当然饶不了他，诬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 1996 年底，省委书记出面和稀泥；八个月后，这位将烽火总结为“一个好班子、

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的书记卸任，新一任书记到任。

正可谓层层战犹酣。

随着法制与公平竞争的确立，到了下个世纪，王保京们恐怕已经不是资产规模达二亿五千万的郭裕禄的对手。这是这本书真正的光明的尾巴——况且不是硬加上去的——也是有着无数弊病的邓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脚的地方。

到《大国寡民》结稿时，作者被诉的“政治毁容”案裁定终止审理；烽火村硫酸毁容案进入了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武芳呢？她好吗？当地村民说的是，“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54）o---

[1] 武芳经抢救后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烧成一个“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疾（《大国寡民》48 页）

[2] 据《大国寡民》给出的数据，烽火从 1958 到 1995 年，国家无偿 "输血"现金、实物（静态）[2]，至少 250 万人民币；至于向财政、银行、信用社的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至 1997 年，已累计 2540 万元。（317-318）

失败者的胜利戴晴

——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 1942 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 4 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 100 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灿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 10 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 他热情还是冷漠? 宽厚还是刻薄? 爱不爱醇酒妇人? 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 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子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 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幻像：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维特斯(通译为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维斯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的复兴》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随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行进，200 年和 350 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 1936 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 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原载北京《世界文学》1987 年

奉旨造反义和团

戴晴

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国，除了那一堆"一"字辈的公共假日（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还有几个总要被有关人士想起来并纪念一番的特别日子，比如文艺圈纪念《讲话》，也就是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作的那场把他们由自由战士变为党的工具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统战的对象们，特别是反蒋的国民党元老新进，则纪念共产党也认可的辛亥暴动；对所谓“义和团运动”，好象没有找到有头有脸的拳民后裔，佛道释三家也都不肯沾边，而农民暴动和共产党可是有割不断的天
血缘，史学界遂受命挑头主持这“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念。

那正日子的选定与主题“反帝爱国”颇为相合。一百年前的 6 月 13 日，是拳民最意气风发的日子。虽说一年以前他们就接受了朝廷的好意，在新巡抚关照下，把原先的“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但一直到了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拳众们才真正露脸：一向禁卫森严的九城向这些红布包头、红布兜肚的粗汉们全面开放，任凭他们到处设坛作法，操刀执杖，喊打喊杀，出入王府官邸，担当教师爷和门房大爷，白米白银一批批赏下来……最后，在清廷正规部队配合下，拳民们“奉旨造反”，以围攻使馆震惊世界。

五个礼拜之后，不过两万名拼凑起来的正规作战部队（史称八国联军），就把他们（拳民加清军）解决掉了。老佛爷车驾匆匆西去，留下零星清军和拳民与洋人巷战，留下北京城的平民去承受敌军的报复性洗劫。他们大都是山东河北贫苦农民：天旱、粮食歉收，求告无门；教堂和教民在乡里趾高气扬，让他们一百个气不愤……。这些本来都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横死于枪炮之下。小朝廷是搬到西安去了，他们的生计谁管？

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至此已 130 年。自乾隆朝错过了愿意和中国平等往来、互换有无的英国特使之后，枪口下的明征暗抢激出了一批“师夷长技”的洋务派这批重臣大员守着祖宗的“体”（意识形态），事事“官督”（以中央集权压制民间），社会变革效率之低、负面效应

之大，贪污腐败不可遏制，终于使实力不足而激进有余的文化人成了气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戊戌变法。对文人的镇压有何难哉？

何况还一箭双雕，也给了缓慢的、一进三退的洋务派（既拳民口中的“二鬼子”、“三鬼子”）好看。从镇压中捞到好处的是那些顽固守旧派。他们“万岁不离口”，只用洋货不尿洋人、公干无能，私捞却是行家——国家经济怎么能不崩溃、百姓怎么能不贫极而反？而偏狭、无知的最高统治者，竟幻想依仗暴民而泄愤——发泄她对洋人之恨：他们竟敢给向她绝对权威挑战的成年皇上撑腰！庚子一战，清王朝是完了。义和团却被戴上“反帝爱国”的堂皇冠冕，作为近代革命谱系上正宗的人民英雄，歆受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其合法性支撑的政权的供奉。不知北京的史学界今年如何纪念“义和团运动”100 周年。80 周年时候曾有过纪念，那时历史学家黎澍还在世。他出席了，对“义和团”却只字未提。在这一符号还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的时候，在学术自由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他选择“王顾而言他”。我推想，即使如此，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不过一年前（1979 年），他刚刚说过：建国 30 年来，历史学已经沦为强权的奴仆。

女人不爱坏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跋

戴晴

世人一直在争论（而且一直没有定论）的一个题目是：究竟一个人的品性，还有他的能力：比如勤或惰、贪或廉，以及数学、音乐、绘画等才华，究竟更多地出于先人遗赠，还是后天训练。

按照 1960 年代初流行于中国人中间的"审美心理及价值取向"，我是被强塞进军营、意图经切削打磨之后而造成一"洲际导弹工程师"的。那军营中的毛坯们当年也个个企足而引颈，渴望一日以血肉之躯竭诚报国。40 年过去，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的前后同窗们，当官、经商者之光彩华美，早已盖过那些孜孜兀兀埋头于工程者远矣——当然，40 年是一个不短时间，从"我为国"到"国为我"（可惜都没有完全依据法律）的转变正顺利完成，本来应当在实验室或发射场消磨终生的前军营毛坯弃牺牲贡献而奔权奔钱，也属平常。问题是，间或，流水线上也会有另类产品逸出——这就是我了。

细想当年千方百计转行，不再拿烙铁而拿笔，并不是想费心巴力地攒文字，只想给孩子们翻译书：刨食即游戏，胜任且愉快。那最初的动因固然是我的已经能磕磕巴巴地念书女儿在她的年龄上无书可看，真正深藏着的，则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天性：每看见洋码子就禁不住捉摸，捉摸着怎么把它们变成神形酷肖的汉文。这挚着固然还比不上吸毒参赌，但也非同小可：记得当年纪轻轻在军工受训，几乎节节课当堂打盹；而到了后来，在已经人过中年并且已经拖家带口的窘况下，嚼起洋码子——课文还是《人民公社》《刘胡兰》一类富于教育意义的宏文——却是喜滋滋乐陶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翻译家父亲遗在我身上的染色体在暗中帮同使劲，已经成为事实的是，我终于在我在已该退休的年岁，违背社会派给我的角色，再拜老师，干起了一生最想干的事。

初初上阵，照常理，本该找本简易的练练手，无奈刚作此想，就碰上了这本“小”书。说它小，指的是篇幅；而就其内涵而言，恐怕没有人会这么说了。也就是说，当哲人、而且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以他们的手、他们的唇、他们的更为隐秘的人身器物，做着如亿万常人（包括“常兽”）自古以来和从今以后都做着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在怎么转（或不转）；以及，那些本由此类人运转他们发达的大脑而攒出来的“人类头等大事”——种族、国家、哲学发见、政治理念等，在他们自己的为人处世中怎么起着（或不起）作用。

更况且这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女子！不错，她们是“半边天”、是“铁娘子”，是大腕儿和顶梁柱——在竞技体育、影视、看护及色情领域。但在哲学界，在思想界，在她手执绢帕，擦去的不是孩子眼睛上的眵而是人类认知上的蒙昧的时候，这女子就太奇特也太珍稀了。尤为不寻常的是，这奇女子，竟然又以她的大智慧大勇气在私情领域做起了让爱她文字的人没法不黯然神伤的愚骀怯懦之事。

这四字考语说的不是青年时代的阿伦特。成千上万女学生愿意为师长奉上灵肉，其中佼佼者最终成了那偶像后来穿衣吃饭洗脚咳嗽的伴侣，已为世人所坦然接受——虽说在思想与学术之重镇哈佛，历来对此决不轻饶。这本小书令人震惊之处，却在于她在受到无以平复的戕害之后，在她已经成年、已经有了心心相印的夫君之后，竟一次次不妥协地上门“丢份”——自欺欺人的狡辩外加屈辱的侍奉。再糊涂的人也一眼就看明白，这不但违背她的政治和学术理念，也背叛了她本该更珍视的为人原则。

初恋就这么强劲？

读者会说“那看是谁了”，哥德、爱因斯坦、贝多芬，值！这显然是看才了，掉进了“郎才女貌”的俗套。若论才，谁比得上希特勒？阿伦特怎么不爱他。“你这叫胡搅！”读者说了，“这种大坏蛋……”是大坏蛋，女人不爱坏蛋。那中坏蛋和小坏蛋呢？问题于是变成我们界定的坏和所能容忍的“坏”。

这本书给出的海德格尔的恶行，如协助当局检举叛国者；划去为当局所不喜的恩师的名字（从题献上）；不与（同上理由）女主人说再见；对亲密助手坚持“政治第一”……，如果拿到我们中国，拿来与我们“经受住了历次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考验”的好同志比一比，孰个轻、孰个重，孰个是、孰个非，清楚明白。更况且，人家是开启人类智慧的先哲，翱翔宇宙的现代人怎么反倒落进了司马光一千年前的老套，抬出“乱臣贼子才有余而德不足”呢？平心而论，海德格尔那点子事算什么嘛！盟军已经把人家折腾个底儿掉了，你有完没完？人家都 70 老几了，都死了多少年了，跟个女人那点子事，还拿出来嚼，德国人有毛病了不是？

谁有了毛病，毛病又在哪里呢——大思想家小女人阿伦特？穷追不舍的德国人？还是“与人为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事不糊涂”、“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国人，就比如“字是认识，就是弄不懂那意思”的本书译者和读者？以及，男人那样而女人这样，他们那样而我们这样，究竟是一个偶然还是一定程度的必然？如果是必然，那根由又在哪里？

“五四”以来，研究百年中国近代化的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之举步唯艰，怎么学怎么不像，根子在文化：主德抑或主智。但细考这本小书，怎么像是倒了个个儿：本来，主智的西人，原则上不会有“德不济才”这类苛求，除非你犯了法。这回呢，他们穷追猛打，我们主德的儒人之后（譬如今天破土而出的“儒商”）反倒觉得何必这么大惊小怪。看来世道真是变了，

就在这百年间。什么呢？

这是一本不容易下咽的书，更是一本让你读了就像没读、跟谁都争论不清的书——包括书中那位可爱的共产党员（阿伦特夫君）。读过车载斗量的“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我辈，有没有一点特别的感觉？

最后想说的是，谨以这沉重的练习，敬献于我的老师董乐山先生灵前。他在重病之中校订了全文。他说“你是个自由派，这回要拘拘你。”他又说“生命有限，不可在无谓的事情上浪掷。”

1999 年 9 月 9 日。北京

如此民主决策

——对黄顺兴的采访

戴晴

黄顺兴，农业及环境保护专家，1923 年生，台湾樟化人。1942 年毕业于日本农业高等学校畜牧专业，1964 至 1969 年任民选县长，自 1972 至 1980 年任民选立法委员。1980 年创办《生活与环境》月刊，1988 年以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

主要著作：环球之旅、历史的证言、台湾农业的前途、看大陆(1990)、走不完的路、北京见闻录(1993)。

▲作为农业专家和环境保护学者，您 1985 年转道日本回来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大陆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是否了解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危害？

□几乎 40 年，台湾民众对大陆情况处于消息关闭和封锁状态。对大陆的情况，老实讲是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所得到的消息只是两个极端：一面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赤匪青面獠牙、百姓水深火热；一面是来自左倾激进青年的暗道传闻——人类理想的社会、美妙的人间天堂。没有人提到环境问题。正如当年台湾，在只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对于环境根本没有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说，不敢指出单纯追求增长的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的破坏。后来，到美国参加一个芝加哥东亚学术中心主办的环境研讨会，遇到留美台湾教授林俊义，他向我谈到大陆这方面的问题好象很严重，这是 1985 年 7、8 月间。我感到心焦，引起想亲自到大陆看看的念头。农业和环境保护原是我的本行，所以一回来，立刻看出了问题。

▲就居住而言，大陆离您很遥远，森林消失、河流干涸，对您本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影响，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您那么关切？

□环境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地球的问题，不仅仅属于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它是没有国境的。更何况我是中国人，大陆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无论离开多久，总是息息相通。

▲记得您刚回来，喘息甫定，就开始了到各处的考察。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三峡工程的？

□不多久吧。那时论证已经开始，人代会和政协会都在争论上还是不上的问题，我为了弄清真相，就开始收集资料。

▲您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争光的伟大豪迈的工程？

□正因为这种空泛的“伟大”、“豪迈”，才越发糟糕。所谓“大”，不管是非洲的阿斯旺坝，还是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工程，凡事涉地球上的大河大川，都不可轻举妄动。它们是地球的动脉，一条河川从形成、固定，到维持，要历经几亿年。中国人口如此密集，核电站也好、河流上的大坝工程也好，一旦为害，非同小可。对这类“大”动作，我原则上根本反对。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这谁都知道。但发展经济，第一，是不是非要那么多的电能？第二，有没有替代方案。第三，就算无可替代，也必须把对环境对人类的局限放在第一位考虑。三峡工程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三层考虑。

▲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您迫切关注的问题，有关各个专业部门，包括人大机关、水利部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没有提供条件，帮您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研究？据说在开会前曾经有一个强调人大常委三峡工程考查团。您对三峡工程的关注人所共知，您有没有参加这次考察？

□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吱吱唔唔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到了开会的时候呢，即 1992 年那次人大，那可是将通过三峡工程《决议案》列入程序的。这回总应该协助您了解全面情况了吧？

□不但没有，还制造重重阻碍，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到了会上，发现为达到通过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我找到秘书处，问他，你们准备的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我两面都想了解。他说台湾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给你。我说：你们做正面推动性宣传，花那么大的气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只薄薄的几小册，怎么就不能发给每人一套？三峡工程的决议案要在大会上表决，不了解全面情况，怎么发表意见？也许有人愿意放弃权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办法给我找来。我知道意见提归提，他们完全可能不理睬。所以，开会之前，我就在家中将 10 本负面材料复印好几份，发给希望知道全面情况的代表，如在南京天文台工作的台湾代表刘彩品等。不过到后来在会上，秘书组还是给了我一份反对方意见，说“黄老，这是特别给你的。”我说“我不要特别，了解全面情况是每个代表的基本权利。”

▲没有文字资料，不同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听到呢，比如请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到会介绍？

□到小组来说明的，有水利部和长江办的那一夥人，当然全是促进派，哪有持不同意见的？台湾团提问的代表不多，反对意见也有，比如上海港务局副局长范增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峡水坝建成后，由于生态变化，长江口一带的积砂问题会很严重；还有三峡船只过闸时间拖长等等问题。南京天文台刘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学论证资料不足、论争不予公开和预算不符合事实等问题。我将所读过的论证资料加以综合后，加上我自己的见解，向他们提出质疑，包括工程预算 570 亿的问题。我诘问：为什么不计利息？若计入，总数是多少？另外，流砂疏导和淤积估算不清楚，为什么不能采纳替代方案？水库寿命、地震、战争、天灾人祸发生时的对策，以及稀有物种灭绝、历史文物淹没，这些问题，我都曾在小组会上提问。对此，他们全都推给长江办主任作答。有的根本答不出来，如预算、筹款渠道等问题；有的答非所问，只将他们的提案重复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说不敢作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想获得大会通过吗? 但象您这样提问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在代表中不占多数吧？

□是这样。在小组讨论阶段，我尽量和别的代表联系，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让尽量多的代表在表决前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材料，大会不下发，我想，那我就个别送吧。没想到送也送不成，因为大会封锁，不同地区的代表之间不准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团的秘书处。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对方根本不可能收到。

▲这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尽管邓小平说过，字体(黑)为避免犯错误，应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赵紫阳在位的时候说得更明确：字体(黑)重大的问题须经人民讨论。抽象的“人民”毕竟好糊弄，但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这时候，您对于以合法手段，使大部分代表知道实际存在的对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要是从前，确实也就是这样了。但在我刚当常委的头两年，曾通过人大常委秘书局，提出过好多意见，包括在第二次常委会上提出的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那次我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国会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上的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那个国家，包括独裁的蒋介石政府都有，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那时是赵紫阳主事，他是主张人民代表机构透明化的。万里那时也开明，意见就是由他转达的。后来，好了，从第三次，开放了记者室，挑选了五、六个吧，副总编之类。休息的时候，一个记者走到我的座位边。他问可不可以和我谈一谈。我问是不是采访，能不能报导？他说不能，虽然有几家报纸可以派员列席(不是采访)，发稿还是大会统一。我说，如果这样，我没有必要和你谈，咱们只做朋友好不好。他说，我和你谈的，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我可以写《内参》。我问《内参》是什么，他说那可重要了，头头们看的，别人想看都看不到。我说：“我是人民，人民是最高的，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外参，而不是内参。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采访。”

▲您的这个建议后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又有过别的建议吗？

□那就是 1989 年通过的《议事规则》了。全国人大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我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记得那时我一再坚持，有几位委员也明白表态赞同。那年赵紫阳还没有下台，最后终于通过了。

▲这个《议事规则》在以后的大会上起作用了吧，比如 1992 年 3 月那次表决三峡工提案的时候。那一次，您是怎么运作的？

☐人大《议事规则》第 54 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 10 分钟；第二次 5 分钟。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此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 月 31 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

▲在会上一切进展顺利吗？

☐那天，我看第一案、第二案已经过了，下面就是三峡工程的表决，就开始喷药——你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胸腔里装着心脏起搏器，情绪激动是很危险的，提前三分钟喷，可管半小时。果然，表决开始，我登记了的发言没有被安排。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通通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就是从为国家、为民众的角度，提醒政府动手干这么大的工程要慎重吗？

☐我也想不通。一届政府，一个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在全国、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为封锁一个代表的发言，怎么到了不惜公然违宪的程度。我想，可能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头脑发热到三峡工程非通过不行、就怕我的发言给这通过造成哪怕一点点干扰的程度。我又想，动机如果纯正，为了国家人民，听听大家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呢？没有必要这样嘛！更况且，学者们提到的不过是方方面面的技术问题，你如果在这方面有把握，为什么不敢让人家说呢？

▲问题就在这里了：恐怕即使在技术上，他们也是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为什么要推？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

▲后来，听说您在激愤之中作了一个决定？

☐对，就在外边休息厅。记者们围上来，有人提问，他说："这人大常委，你明年还想干吗？"我说："怎么干!？我现在就不想干了!"话一出口，突然想到他是话中有话呀，反问他："你是哪家报社？"他不讲。我估计是新华社的。

▲您自己当众这样宣布，对有些人说来真可谓正中下怀，但真正底层百姓大家觉得特别可惜。当时是不是气话？

□不是气话，我早就不想干了，本来已辞了好几次。

▲您是只是觉得字体(黑)这次中共做得太过分了，还是对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失望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灰心了。凭我一个人，就是再干 50 年，还是这样。我个人再努力，碰来碰去，全碰在体制问题上，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解决得了的。我觉得不该再在这里耽误下去。我今年 70 岁，也该从公务生活上退下来了。本想等到满届，也就是今年，再顺理成章地退。现在提前说出去，也并不仅仅是气愤。

▲现在《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已经通过，据报纸宣传，正拼命赶工。您对三峡工程前景有什么估计呢？

□中国的环境形势非常危险，三峡工程不过其中一个，比这严重的工程都在推进、发展、恶化，再不紧急着手补救，将来后悔就晚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负担过重，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灾祸，让你一时无法收拾。更严重的是，人口多的同时，素质越来越低：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人民就产生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再有，体制是关键。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会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至于三峡工程，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看到 6 月份《人民日报》一篇报导，对三斗坪移民的采访；还有《都市青年报》一篇《三峡移民资金变成招待费》，披露不少问题。又如三峡工程中的一项工程，据说全年应拨款 8000 万，到了 6 月底，才到位 1000 万，成了"粮秣未到，兵马已先行"，仗怎么打？按理，他们既然冒天下大不韪开工，无论大肆吹嘘，还是印钞票，应该是全力支援才对，但在李鹏病了之后，这两种情形出现了，依我看不是偶然的。舆论控制如此严密，也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华人在反对，一直紧紧盯着，消息怎么会“漏”出来？列入计划而钱不到位，究竟是故意还是不得已？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许正意味着权力机构内部的某种变化。另一条，你有没有注意到，本来要对外发行三峡债券，又停下来了。行不通的原因何在？债券一旦出售，所有的债权人都有权了解他所付了钱的那桩事的全面情况，这时，想要捂住反对的声音就更困难了。而有了这个声音，民众就更不敢去买，成了恶性循环。台湾的一些只要有钱赚，什么都不顾的公司，想插进来，考虑到反对的声音，有些踌躇，包括我的直接告诫：“罪恶的钱不要赚，更不要说还赚不到”。筹钱的渠道不畅，起码可以阻挡它一段时间，我们就更有时间将一切讲明。所以，你问对这一工程的前瞻如何，我的回答是，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当政者比较明智、比较实事求是；管财经的人，不冒险，你拆你的烂污，我却要顾到我这一届的政绩，不擦你的屁股，这样，1000 万，不死不活，让你干，舆论越来越不利于你，到时候停顿，还来得及。如果三峡工程的不拨款和真实消息的走漏，是这一个圈圈中的一环的话，最终将这一灾难制止，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左倾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的悲剧

王若水走了。

以左倾激进而激扬革命，顺理成章地入党掌权，却因依然怀抱纯洁理想而质疑革命。这样的人物，在中国还剩几个？

生于 1920 年代中期的王若水，与比他早生了七、八年的陈涟、袁永熙夫妇，（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傅作义的女儿、张学良的弟弟，富家女韦君宜，以及一批当时名牌大学学生、外加年轻的胡风追随者们……），基本上是同一时代、同一阶层、同一倾向、在没"经历过党内路线斗争的洗礼"时也基本具有同一价值观的青年。

这批有根基、有学识、背叛了富有的家庭、对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怀着宗教般热诚的知识青年，大都被共产党网罗。我们已经从无数文艺作品中知道他们"在红旗下宣誓"时候的如何热泪泉涌，但很少有人明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早晚不一地被冤屈、被折磨乃至凌虐至死之时——那些热情地向他们伸出"粗黑的手"的工农同志，对中国革命前景的理解，与他们其实天壤之别。人家受剥削的苦人儿要的是翻身解放、"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对王若水辈期望的自由、民主不过当个好词儿听听。至于这些理想主义者仇视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独裁专制等，在当时和泥脚杆子革命家期望的"打翻旧世界"，还来不及起什么冲突。

王若水显然是作为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在刚一建国就受到当局重用的。那时候毛泽东还常被称做毛先生，他主要的政治标记还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我们可以想象王若水们是如何把民主自由的追求放在一边，以执政党员的骄傲和自信，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一项，就是按照本党的安排来剿灭"无产阶级"所不容的知识和知识的载体：知识人。

不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怎么看待那一茬接一茬地经他参与（起码旁观）而给灭掉了的他的师长辈。相信在他心底，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独立的思想与言论并没有如真正卖身钻营的文宣打手们那样的嫉恨，但胡适、俞平伯、梁漱溟等人救治中国的方针，本来就与当年左倾激进派有差异，更何况如今已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新中国"、和赏识他才华的"我们的伟大领袖"。

直到大饥荒之后，王若水还没有和他的党拉开距离，虽说在《人民日报》中层干部这样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一无所知。

历史上一个偶然（或许也可以说是必然）是，当毛泽东打算以文革来实现他的理想时，他选择了上海的左派，而把王若水等正宗喉舌们撂到了一边。王若水做下的一件有名的事是批评激进色彩比他们还鲜亮得多的张春桥、姚文元。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对党的主流亦步亦趋，但他用的依旧是给当今密折奏事的传统手段；而进言的对象，实际上正是左倾激进的总代表。到了这时候，他还没有明白以激进为底色的对专制的妥协，其实是他们这批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理想的背叛。

估计随后十年的冷板凳，使他从一名毛泽东思想宣传家，退到列宁主义，再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依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按照中共化的理论体系发言，哪怕抬出来的是老鼻祖的"人道主义"，也为当局所不容。

王若水思路清晰、思想缜密，为人聪敏又温和。他不是靠钻营而是凭才干做到"喉舌"副主管的高位的。而以他所登上的位置不再窥测攀附，而是站起来代表自己发言，总因为内心有点什么没有泯灭。

虽然不幸成了当局"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当其冲的靶子，直到生命的晚期，王若水仍不是一名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的献身、壮年时代的屈从与妥协，进入老年后有限的觉醒，其实是二十世纪初一批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这特定舞台上客串的一场悲剧。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戴晴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 1900 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 1931 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

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名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 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惩罚，比方说像当年对付顾顺章一家那样，落到他们这些被认为"比公开的敌人还要险恶的"前同志的头上。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其所为，恐怕与长征时用担架抬着红军要人和他们的太太、而完全不顾自己饿死累死的战士没什么两样——当然郑伯伯、我的父亲、还有那些战士们在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拼死保护的要人们后来的所为，以及他们的“后世同志们”今天的贪婪与腐败。

郑伯伯去了。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而非今日官员的大话与奢靡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却了无生趣是正宗中共党史，有了一丝生动可信。¨

1998 年 8 月 1 日

忍对黄河哭禹功

仅将此文献给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和尚在世的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 黄河

(二) 鲧和禹

(三) 三门峡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 年 8 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报告提出：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 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1]

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 年 1 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 [2]，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 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② 规模宏伟——蓄水位 350 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装，装在那里?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 1952 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红旗的国土。30 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3]，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 360 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 1952 年 10 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4]。当时，虽然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 1980 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 6 年，能不能用堤、埽的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 30 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 2000 亿到 3000 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 300 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5]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 1993 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

不两全齐美？好！这个主意好！"[6]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5 亿元拨款，5 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 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 7 人，1954 年 1 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 120 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 年 2 月到 6 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

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 1960 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 年 4 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 8 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 350 米，总库容 360 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 37000 立方米/秒降为 8000 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 2220 万亩，远景灌溉 7500 万亩。

④ 装机 90 万千瓦，年发电量 46 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 207 万亩，移民 60 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 147 亿立方米(总库容的 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 25—30 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 300 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 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 1967 年，来沙可减少到 50%；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 50 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 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 1967 年来沙改为"减少 20%，50 年末期减少 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 40 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 1975 到 1990 的 15 年间，已断流 19 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 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 350 米以上至 370 米之间，每隔 5 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 8000 立方米/秒降至 6000 立方米/秒；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 年 4 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考虑到 50 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 360 米；如果希望寿命为 100 年，水位当为 370 米。

1956 年 7 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 360 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 333 万亩，移民 90 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 年，李葆华每天

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14]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1957)的 2 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 1956 年 9 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庭济 32 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15]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 25 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1991 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 30 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 600 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 3 万立米，由于陕西省"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16]，1958 年 4 月 21 至 25 日，在那次因推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 完全没谱儿的梦[17]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18]，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 月 21 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走进了会议

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 360、350、340 米的方案时，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 335 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 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 1964 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21]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 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度是：“同意按 360 米设计，350 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 340 米"；彭老总这回有点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22]

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 12 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 360 米设计，350 施工，蓄水控制在 340 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 360 米的浪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 340 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 340 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 340 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 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苏联设计按 350 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 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必要。[23]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 338.5 米，就是"迁移 30 多万人，陕西是 23 到 24 万这样一个数目”。(读者可能记得 350 米是 43.7 万，360 米是 73.5 万；后来实际数目是 41 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24]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 320 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 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点。”[25]

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泼了冷水”。那时是 1958 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26]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

1958 年 11 月 25 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 年 6 月，坝筑到了 340 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 9 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

读者可能还记得 1957 年 6 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候，最后说的是：“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 12 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在 1960 年 11 月至 1961 年 6 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对这 12 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 50 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 1967 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 年 2 月 9 日，当坝前水位达

332?58 米(尚未到 338.5 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27]，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工程还在继续。

1961 年 4 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 353 米。10 个月后，62 年 2 月，第一台 15 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上照例大报喜，但主事的几位，恐怕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 4.5 米。从秦岭下来的清清的渭河(读者一定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是"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瞒不住的事实是，由于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 年 3 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头，披红褂彩不足一个月的第一台 15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 1962 年 3 月。

运用方式作了 180 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28]，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 年 4 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 335 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29]。具体建议：坝前水位降到 315 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工程拦沙? 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 1955 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气可鼓而不可泄”;“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 年 8 月，1963 年 7 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问题严重，

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 50 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 30 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毛主席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30]

炸掉，有那么便当么? 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 年 12 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 1957 年 6 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这一回，除了“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31]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 '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32]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33]

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 80 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30 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具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库。[34]

说得够轻俏。就算暂且将环境的破坏放在一边，这所有的钱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凭空被剥夺而哭告无门的平头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少?

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请了去。他主张“大放淤”：“ 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把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35]，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三门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 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堵上之后 2 年开始出事，4 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36]。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王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37]

改建工程 1965 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水位 315 米时，下泄流量由 3080 立方米/秒增至 6000 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 1957 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革而收敛自己，到了 1969 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 315 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 10000 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 1—8 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 12 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 13 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 5 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 1973 年 12 月，挖开了 8 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 315 米时，泄量由 6000 立方米/秒增至 9060 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 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 5×5=25 万千瓦(原设计是 14?5×8=116 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38]，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

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否属实?"[39]

事情并没有完，到了 1980 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 3000 万(大修、更改、基建)，至今尚未完成：1990 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 315 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 9443 立方米/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40]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 3 米多。1992 年 8 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 60 多万亩，约 5 万返库移民受灾，近 3 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更大灾害。[41] 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 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 5 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 1 米)全都落了空。[42]

如果读者以为此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说明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 360 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 333 万亩，迁移 90 万人；后来，1958 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 335 米时，还要淹没耕地 85?6 万亩，移民 31?89 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 8?49 万人，实际总数达 40?38 万人(其中陕西省关中平原 28?53 万人，占 70?6%)。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 3?99 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垸、沟壑区的 12?11 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43]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 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十几、二十年下来，见自己原来的家园怎么又没有水了？在原处由黄河泥沙新造出来的田怎么又让大兵给占了？他们要求返回，要求部队退还土地。

1985 年 5 月，中央决定(中发办 29 号文)，从部队和地方国营农场退还 30 万亩耕地，给返迁移民，“其中 80%为低洼盐碱地和河滩荒沙地，2 万亩被冲毁。15 万人中，已迁 9 万，尚有 5 万特困户待研究。"

到 1989 年，国家再拨 2 亿返迁 15 万，不够。陕西省提出"补充报告"，需国家再补充提供 3.233 亿。此时，三门峡水库在陕西境内移民已达 43 万人。

到了这个份上，三门峡工程的任务变成：

……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抓紧进行改建，围绕着进一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使有效库容得以扩大，尽早完成打开两个底孔的任务，继续研究再打开最后两个底孔，……将来，在三门

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后，终于做到库区的淹没机会和淹没程度，将与无库自然情况无大区别。[44]

改建后的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 30 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下游淤积和防洪怎么办？读者读到下面一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45]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不是在论述三门峡，而是浪漫派们新的瞩意：三门峡工程这时已不承担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库大坝，总库容 126?5 亿立方米，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 20 年左右，之后还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46]

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么，三门峡水库怎么摆呢?特别考虑到当初把话说得如此满。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不但掌握了含义丰富的汉语特别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红色专家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47]——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1959 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48]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 20 年一个接一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 1980 年代末，在庆祝三门峡工程 30 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 30 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 30 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 30 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 30 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49]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体制、制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那么有形的损失呢？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 30 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 15 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 50 多万亩；

②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50]

③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 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 1949 年更大洪水标准。"[51]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 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52]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 1955 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 年，决定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 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 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 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53]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把什么放得过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 0.17 至 0.23 米”，这意味着 4 至 6 年就是 1 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54]

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 1989 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 3～4 米；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 4～5 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河道每年淤积 4 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 15 年；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 50～60 年。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不一定决口改道。[55]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或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竟有多大呢? 当时说的是：

波及 25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 80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56]

看温善章 1989 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 25 万平方公里，是 3000 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而那 8000 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 50 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57]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 14000～15000 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 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 6000～8000 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 90 亿立米的大库。[58]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 1980 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 1989 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 1989 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 4 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 1987 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59]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门峡工程，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60]

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 30 年代，荷兰人、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 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

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 50 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 年 6 月和 12 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61]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 1950 年代，就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62]。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63]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 年 10 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情况。… “三

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能灌溉多少地？"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三门峡工程"毛主席点点头"。[64]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 年 1 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这笔钱不分，可能原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 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极左三魔头"[65]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66]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 70％以上。连钱正英自己在 1990 年也不得不承认："1958-1960 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67]她还没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前。周恩来说："这个词我不能题，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毛主席为它操心最多，这个词一定要等毛主席来题。"[68]

只恨这“颂圣”工程太不争气。到了 1964 年，紧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给中国留下了太平年代千万人饿死的空前记录之后，人为的“黄河清”也已经快要把泥沙引到西安。圣人呢？毛泽东这时候说的"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语气之间，已经很有些嫌下属低能的圣怨了。

平心而论，“周恩来为三门峡操尽了心”，没有错。但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就算当着“人民的好总理”，只怕浮现在意识上的第一念头，还是政治上的利害。40 年代中后期，当他"领导黄河堵口归故斗争"时，"中心"就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到了 50 年代，国体、威望、豪情，加之与苏联的关系、与毛这位雄猜之主的关系，不可能不在一些犹豫着的、权衡着的环节起作用。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从 50 年代起，邓子恢们的、黄万里温善章们的，包括陕西省的意见，就那么听不进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怀有政客臣子情怀。中国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五星红旗一飘，涕泪滂沱之余，觉得这么好的国家和政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干、还有什么干不好么？李赋都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作为水利世家的后裔、现任治水官员，应该说，该懂的他都懂，却在关键的时刻，以专家的身份，支持政府决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减少泥沙”这种幻想。他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69]

应该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当时流行的观念，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类宣传小册子的话说，就是：

三门峡工程的兴修，说明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认为是不治之河的黄河，即将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鲜明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气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与巨大力量！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筹码下到了“优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义”上，不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更况且李赋都对“优越的制度”又了解多少？只看后来"黄河清"主将“党内水利专家”王化云怎么看制度对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们的建设要一个很好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可是五七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搞‘四清’， '四清'以后又进入文化大革命。我们沿河的各级党委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情况下进行治黄工作的。[70]

正所谓“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共产党政治起家。农民减租、工人增薪，都扯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来个大翻覆、大斗争，就是右倾投降。难道大惯了，斗惯了，政治惯了，不这样，就辜负了时代?

对黄河，“培修大堤、加强护岸、堵支塞串、固滩整险”[71]是太不带劲了，要“治标辅助治本”；没过两年，这提法也太过小气，要“根治”；但“根治”的不过区区洪水，无法体现

“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72]，顶好"综合利用"，指标还不能定得太低；当黄河干流上高屋建瓴、激动人心的 360 甚至 370 米方案出来之后，"气可鼓而不可泄"，"快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门峡工程，不就这么哄出来了么?

“左”，自共产党诞生、成长、建政以来，从未被认真清算过，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思维定势和政体支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实在不能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而被标以“左”倾、定成死案的，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说李立三所干的那一场“一省数省”还算是带有他本人性格与学养特色的话，瞿王两人，不过斯大林的棋子而已。 将"左"记在他们头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开脱，算不上党内严肃与平心静气的对“左”的探讨与清算。

从 1935 到 1975，整整 40 年。在这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最重要的 40 年间，除了出于谋略或者再干下去饭就没得吃了的时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漫地、无知地、蛮横地、由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从而变得实际上没有制约地、将全付精力与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伟大领袖了。 而在中国旧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共产文化背景下，混以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他个人的权势、机谋和残忍，不会不裹胁着一整批忠忱的、阿谀的、有所求或有所惧的，包括更多的无可奈何的中国人一道向“左”！ 向"左"!! 向"左"!!! [73]

三门峡工程不过是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门峡与三峡

1994 年 11 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 37 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 1/8";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 41 万，三峡 120 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 1000 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

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 10 倍；三峡按 1986 年的 360 亿到 1995 年的 6000 亿，早已超出 10 倍——而 1995 不过是开工的第一个年头。

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除了 50 年代的人的真诚纯朴和 90 年代的人的刁猾取巧而外——按照毛主席的好学生“人的因素第一”的原理，这一点是忽视不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修建三门峡时，潼关的淤积还只是少数人的担心；如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两项工程的挂帅人物都是所谓党内红色专家，他们都是以“左”倾学生而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业务训练，也没有过以扎实的考绩为标准的晋升或淘汰经历。由于出身经历的

“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但莽撞自信，且善于撩拨专制者的虚荣——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专制者在水利这一领域的需要。三门峡是王化云，三峡是林一山。当然，他们都有留过洋的博士作副手，以彰示决策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 35 岁；介入三峡争论，75 岁。 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本文的标题就取自他自编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萌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 360 米、350 米方案，提出 335 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 175 米方案。他提出新 160 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 37 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 他的预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 1957 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呢?难道不到移民造反、重庆告急、航运中断，就是不肯接受这类不够宏伟、不够浪漫、花的钱也不够气派的建议么?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温善章工程师呢，他还能等到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写《回顾与评价》吗?

1993 年初稿于北京?郑州

1995 年校定于北京

----

[1] 《黄河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 《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 见王庭济《1956 年三门峡工程局访苏日记》(〈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苏联人认为"任何河流上均可以修电站"，他们"新建电站 41 处，设计容量约为 1600 万千瓦"，"保持水电队伍不散"。

[4] 如果将纯粹作为旅客而匆匆过黄河略去不计，这是这位湖南成长的伟大领袖第三次亲临这条大河。第一次是 1947 年底从延安撤退途中，说到"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第二次是 1948 年，随中央机关乘木船东渡。就在那次，他说了那句“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这是他住进中南海后第一次出京视察。(见林一山 杨马恩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5] 前揭书

[6] 前揭书

[7]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8] 陈枝霖《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和国民经济评价》 (《三门峡水利枢纽动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9] 1992 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0] 1954 年中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11] 1954 年苏方《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12] 凌志军：〈从治黄看决策〉，《人民日报》1990 年 6 月 18 日

[13]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14] 1992 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5] 王庭济：《访苏日记和记录摘抄》〈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

[16]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行文至此，作为作者，更关心的其实是长江上

的三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四川省会持什么态度。在 1992 年三峡工程获得通过的那次人大会议上，雷亨顺、张仁梁、华德君等代表都严正地、正中要害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然也如黄万里、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一样，他们掷地有声的发言并无人理会。与当年陕西省不一样，四川代表当中，拥护这一“伟大工程”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锦、黄济人、向德科等(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简报总 56 号)。1995 年底笔者从三峡地区调查返京途中，邻座一名操川东口音的人对我说：“我们重庆人恨死了萧秧。这种官儿，为了自己的交椅，出卖四川的利益。”

[17]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制定出所谓"高指标的第二本账”，标志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纳入“大跃进”轨道。在这次会上，曾一本正经地确定了“钢指标在 1 年内提高到 2500 万吨，4 年内提高到 6000 万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等等。(见《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8] 这时，距离反"反冒进"的八届二中全会还有十多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都熟悉，周陈薄李四重臣全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出身世家、以翩翩贵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就是在南宁会议上被吓疯的。周此时的心情之紧张与压抑，可见他的政治秘书范若愚的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人物〉1986 年第一期)。

[19]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0]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1]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2]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3]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到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已不能再这样讲话。那次，他说的是：“‘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 年 5 月)

[24]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6]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7] 李晨 兰艳华在《三门峡水库环境影响回顾与评价》中写道："三门峡水库以 335 米高程进行了移民……从 1957 所开始到 1961 年，移民基本结束，陕西省最多，共移民 19.64 万人，其中有 10 万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产量低，年收入公 30-80 元，且水源奇缺，须到 3-4 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陕西河南两省 1957 年远迁至宁夏、甘肃边远地

区 3.93 万人，因生活贫困和不适应水土等原因，经中央批准，1962 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罗启民 刘红宾在《三门峡水库移民总结》中写道："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收入、粮食产量等与库区差异太大，移民自迁出起就不断闹返库，且越演越烈，从个人零星返为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返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三站峡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28]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9]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陕西省)148 号提案

[30] 曹应旺 《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31]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2]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 〈水电史料〉1990

[33]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4]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35]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6]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7] 这是对伟大领袖所盛赞的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的应和。

[38] 关于三门峡电站的运行情况，李金先在《三门峡水电站运行情况调查》(〈人民黄河〉1983 年 3 月号)曾有具体描述：

改建之后，1973 年#4 机组开始发电，至 1978 年，#3、#6、#2、#1、#5 相继投入。每台运转 6086 小时，年发电量 8?75 亿度(原设计为 13?1 亿度)。为什么? 李金先认为，由于多泥沙河流的汽蚀和磨损作用，停机频繁、设备利用小时低、机组的大修周期短、检修时间长。据统计，各机组的总停机时间：

#4—在七年半的时间里为：23507 小时；

#3—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为：28800 小时；

#2—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为：15484 小时；

#1—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为：10075 小时；

至 1981 年 6 月，五台机总停机时间为 84019 小时；1973—1979 年，每台机组平均年运行

5474 小时，占全年小时数 61%。

对这几台机组的经济估评：共发电 50?6 亿度，价值为 3?39 亿元；而投资只有 2?26 亿元(不知是否将维修的财力和人力打进去)，所以仍是——"效益显著"。

究竟应不应该在黄河中下游建站发电，只须将其与清水河中的\强调{广西融江麻西电站}作一比较：同一机型，同一家制造厂，麻西电站机组连续运用 40000 多小时，累计发电 15 亿度，大修时只有极其轻微的损坏。

[39]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40] 见《中国水利报》1983 年 9 月 2 日

[41] 〈中国水利〉1992 年 4 月

[42] 《人民黄河》 85 年 5 月号

[43] 《三门峡移民水库农村移民补偿标准调查报告》〈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内部参阅) 1990

[44]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30 年大会上的讲话》

[45] 《黄河下游防洪减淤的最优方案——兴建小浪底水库》

[46] 小浪底坝基为沙岩、黏土岩，基础条件复杂，拟建土石坝高 145 米，于左岸集中布置了 15 条泄洪洞、排沙洞，还有发电引水洞和地下厂房，其中围岩的稳定、高速洪水冲击、高含沙和高水头水流对水工建筑物包括闸门槽和水轮机的磨损，都是尖端的技术难题。80 年代围绕小浪底水库是否上马又有过一次大争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谢家泽对小浪底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

[47]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30 年大会上的讲话》

[48] 李葆华《高举红旗 大搞水利运动》

[49]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30 年大会上的讲话》

[50] 十多年前，罗启民在《三门峡水库的塌岸与防护》(〈人民黄河〉1983 年 4 月号)一文中，对塌岸情况有如下描述：

1973 年后，"蓄清排浑"运用，由于蓄泄变化，蓄水时，风浪的冲击造成岸坡坍塌；泄水时，不仅将塌岸的松散体带走，而且能冲刷到老岸，造成新的不未定坡岸。于是，上自潼关，下至三门峡，塌岸长 201 公里，最大日塌岸宽 50 米，最大每米塌岸量 1052 立方米，最大塌岸宽 281 米。塌岸入库的土方占淤积的 16?2％。此外，塌岸还毁坏耕地、村庄、设施，威胁生命。如：1979 年 10 月 9—19 日，东古铎大队(三门峡到潼关段)：塌岸 150 米，塌毁耕

地 300 多亩，扬水站(5 万元)塌入库中。

[5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 1950 年的总结和 1951 年的方针与任务》

[52]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53]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4]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 年—8 期

[5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6] 转引自温善章前揭书

[57]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8]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9]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87/5/30)

[60] 转引自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1]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2] 见李志绥《毛主席的私人医生》 汪东兴、叶子龙，在毛身边勾留时间最长的亲随，公开职务为中央警卫团长等；胡乔木，以毛的好恶为基准的理论与意识形态随侍；张玉凤，由主席专列服务员升任机要秘书，随侍达十多年。共产党上层几乎无人不将他们看做太监总管与嫔妃。

[63]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4]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5] 另两位是柯庆施和王任重，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深谙内情、饱尝左苦的前中共高干们的概括。

[66] 毛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67] 钱正英 《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1990

[68] 王千国《亲切的教导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69]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 年—8 期。但是，就在这年的 6 月 2 日—3 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开座谈会上，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

都讲的是:

应建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他特别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溉 4000 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 100 万眼井，就可以浇灌 3000 万亩，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

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对河南，他的原则：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 50 年就垮了。主张井灌、发展山区小型水利工程。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远落后与实际要求。”

也是在同一次会上，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先生——不知李先生今天是否还在世。如果已经辞世，仅以此作为作为对这位优秀人物的尊敬与纪念——说：“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路线。”谁是这两条路线的代表呢?他说："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

笔者 1994 年读到这段 37 年前的文字时，反复看了几遍，怀疑报纸把大型、小型、前者、后者排错了地方。如果没有排错，不是李先生当时太客气，就是 1957 年河南的“党”确实作风扎实、大得民心。他接着列举事实，批评“和党的路线相反”的“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全省一万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 1500—2000 万亩，洪水灾害在其中不过占 30%—40%。以 40%计算，洪灾面积不过 800 万亩，颗粒无收的只有 400 万亩。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洪治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以 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 3%，以 90%多的人力和钱去作 3%的工作。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一道水，两边水汪汪’，越修越坏。”

他不同意“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他说：“全省 10000 多名水利干部，水土保持编制干部不到 40 人，钱也不相称，花 30 万引黄水、长江水灌溉，不重视切实可行的打井下泉：不但收效快、收益大、花钱少，也可少占甚至不占土地。”他热情地建议说：“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一块钱，农民投三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了。”

李先生于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他上述的意见，当然属于"右派言论"了。

[70] 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7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 1950 年的总结和 1951 年的方针与任务》

[72] 1949 年 11 月接见解放区水利联系会议部份代表时的讲话(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73] 这是笔者少年时，所有学校"推荐"朗读的一首苏联当时最当红的左派诗人马雅科夫斯基

的代表作的标题，据说最为列宁所推许。

思想自由与言论尊严——《张东荪学术思想随笔》跋

戴晴

生于光绪十一年（1886）而卒于中美开始恢复邦交（1973）——或许可以将它看作中国终于走向开放时代的开端——的张东荪，其生命所覆盖的，是中国由专制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化的过渡期。于是，作为学人，作为士，作为西方文明的介绍者和现代化转化的积极推进者，他的学养、他的主张、他介入的论争与卷进的政治旋涡，无不带有新旧搏激的过渡期特色。

综观其一生，张东荪最主要的社会角色是政论家和哲学家：先是为开中国现代思潮之先河的报刊撰写智识开启及政论文章，继而主持报政，同时译书、编书、写书，并且办学、执教，最后定位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以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特别是追根溯源的哲学思索——贡献于社会，并力促社会之进步，是他贯穿始终的人生内容，包括由于政局之刻不容缓而奔走于箭在弦上的政要间。

他最早的教育，是严格的国学训练；最初的兴趣，是纷复人生的哲学解析；而迈向外部世界后，感受到的最大的冲击，是学问之海的浩瀚和探讨的自由。他是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街头政治运动——热烈的支持者，却认为传统文明不但不该抛却、割断，也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他是当时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介绍、阐释者，却没有学术买办常有的“食洋不化”或“挟洋自恣”，而是以平等的心态与比较的眼光，“由同情的理解而投入与之对话”。正是出于这一姿态，使得他在后来的衣食不继、战火纷飞甚至身陷囹圄的景况下，陆续写出《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四部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属于现代中国、并贡献于肩千年之重负且屡试屡踬的现代化进程的著作。这是在深切的国学根基和到位的西学领悟力的基础上，对可称之为中国哲学的扎实的贡献——属于中国学人在广泛了然并吸纳当时世间智慧后的呕心创作，无妄自菲薄、无夜郎自大、也不标榜门户，只悉心探讨“以哲学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与有社会性的实际生活之关系究竟如何”。可惜局势使他不能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终于等到没有战火的年代，且正处于自己的探索的峰巅时，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虽然后来又捱过了他物质生命的三分之一，却只能是一名发不出声音，从而几乎未留痕迹的观察者了。

鉴于中国延续千年的“学人/幕僚"传统，以及，或者说更为重要的，由于内部及外部的政治经济格局，独立的、强大到足以制约强权的中产阶级及其与之共生的独立的知识界历百年而无由形成。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学人一直游移于受冷落的纯书斋学者和专制者智囊型宠物间。处于新旧社会之转型期，张东荪认为继承儒学与理学传统的士须承当使命，"旨在造成一种'道德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只是主持正义。使一个社会内有是非的标准，完全靠这种人的'清议'。"因为，"一切威权力权倘不加以制限，无不流于滥用，因而腐败了。必须另有一个自下而上的以为'对抗'。这个对抗力（counter force ）足以矫正上者，使其得有清明之气。”

基于这一理念，张东荪坚持公民、特别是具有思索与判断能力的智识阶级对社会变革的直接

参与："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否则，即是"不拿人当人（即不当作有独立意志与自由判断的主体），而拿人当作工具。"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什么能超过对思想自由与言论尊严的坚守："原来古人有思想，著之于文字，无不是出于本心，从来没有以言论为他人作工具的。这乃是近来（或后来）的现象。我以为出卖理智的良心比任何都可耻。现在报纸的言论都是代人说话，固不必论；而最奇怪者是学者们也专作他人的啦啦队。……我们所以主张必有思想自由，也就是不欲文化为之停滞而已。所谓说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觉得非如此说不可。这是由于自己对于真理有切实感，因对于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于是觉得污辱言论即等于自堕人格。

所以读书人之人格就看其对于本人的言论自己有无尊严的保持。凡为人作啦啦队的都是自己愿意把他的言论作物品（即商品）来出卖，我以为非校正此风不会有学问，不会使文化有进步。"而没有学问、没有文化的进步，结果只有一个——在专制统治之下，"报纸是他的喉舌，教育是他的宣传；历史是他的辩护人，艺术是他的回声差遣。国家就只是他的专用工具。"

他主张对西方文化全面译介，主张中国实行非暴力现代化转化，主张政治民主之下的有计划的经济——而民众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政治批评的权利，则是一切之根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予以剥夺。"哲学家之研究知识，原是想对于人类之有文化，即从自然演成的社会变到由理性规划的社会，作一个理论的检讨"。

而检讨的目的，对社会而言，"一个文化要有自身的活力以从事于自身改造，则必在其内部常如火山一样，能自己发火。这个火就是其活力，而代表这一活力的就是这个民族中（或这个文化中）的理想家，于此所谓理想家也就是哲学家。倘使哲学家而不能以理想提供于国家，则便失其为哲学家了。"

直到今天，在几乎所有毛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得到平反之后，"不忘朝市的张东荪"1 在中国依旧意味着不屑与禁忌——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处于种种危难时，出于民主协商的理念，他跻身政坛，与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数度合作。

与其他一些名声煊赫中国学人不同的是，他既不曾为邀宠而阿谀，也不曾因罹祸而讨饶，他的性情和他的抉择，铸造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经非暴力手段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换，已成为世界瞩目的课题。这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长达世纪的探寻中，无数人曾在各个层面上付出努力，至今仍是一片茫然。作为专制体制下视自由高于一切的学人，哲学家张东荪之命运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1 见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 199425p

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

就 1998 年长江大水访防洪专家陆钦侃

陆钦侃：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1913 年生，193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 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加 1946 年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研究工作。1949 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1988 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方宗岱）。

○ 问 ▲ 答

○ 今年长江大水，险象迭起，“历史最高水位”、“百年不遇”等说法不一而足。请问依照科学的描述，这回的洪水到底有多大？

▲对今年洪水，可从选定测点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警戒水位的天数来判断。对长江中下游平原而言，我们所选的代表性测点是上游宜昌、中游汉口和下游大通。今年长江的洪水与 1954 年相似，即上、中、下游都发生大水。但是，若以宜昌、汉口和大通这三个测点上的数据来衡量，今年长江全江洪水来量，比 1954 年小。这是 1954 年和今年正式公布的数字：

最大流量（立方米每秒）最高水位（米）超警戒水位（8 月 17 日止天数）

1954 年 1998 年 1954 年 1998 年 1954 年 1998 年宜昌 668006360055.7354.502828 汉口 761007120029.7329.435451 大通 926008210016.6416.316253

○ 1954 年大洪水后，对长江防洪作过什么安排？

▲ 在 1980 年，水利部曾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召开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谈会，经讨论研究后，向国务院上报一份《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从实际情况出发，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是，遇 1954 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

○ 作了什么具体安排呢？

▲当时拟订出的主要措施有:

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 1954 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 44.67 米提高到 45.0 米；城陵矶由 33.95 米提高到 34.4 米；汉口维持 29.73 米；湖口由 21.68 米提高到 22.5 米；南京为 10.58 米；上海定为 5.1 米。对其他堤防，由各省分别制定标准。

2.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和湖口附近区，共分洪 500 亿立方米。

3.停止围垦湖泊。

4.整治河道扩大滞洪能力。

5.加强防汛。

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内安排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 34 项，需投资 48 亿元。由水利部掌握安排 10 亿元。

〇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今年的洪水虽大，不但仍小于 1954 年类型洪水，且仍处于 1980 年由政府组织专家郑重提出的长江中下游防洪标准即 “遇 1954 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以内。如果当年所部署的防洪工程如期完成的话，今年的严重灾害是可以减免的。

▲是这样。

〇但今年入夏以来沿长江看到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

▲1980 年所提“近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至今已十八年。《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所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同马大堤、江西沿江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护岸培修，洪道整治工程，至今尚未切实完成。结果堤防大量出现险情，甚至决口，主要是没有认真及时加固。

〇及时加固就行了么？据说沿江土堤年久失修，处处“跑冒滴漏”？

▲年久并不是问题，主要是失修——没有按照标准认真进行加固。国外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多瑙河，筑堤防洪的历史都很长；遇到大洪水时，也都是依靠堤防作为防洪的根本措施。

〇确实没有听说过人家一遇大水就动员若干万人上堤抢险：恐怕不是广大军民不够爱国爱家乡，而是堤坝比较坚固。是否我国堤防技术不够？

▲我国在技术上可以修建高达 100 多米的土坝，长期挡水不会渗漏垮坝。至于几十米甚至只有一、二十米高的堤防，为保卫人民、城镇、工矿企业、交通设施和农村的安全，也应当按标准认真加固。

〇实在不懂完全可操作的规划竟无端拖下来。记得 1988 年关于《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计划。在对比不同的防洪措施时，还具体谈到“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 18 项工程，由中央投资 15 亿元。从 1981 年起到 1987 年，已安排投资 3.99 亿元，有 12 项工程陆续开工”，看来这项计划确实执行了一段时间。可接着又说：“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 1980 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后来怎么样了呢？有没有筹集到资金？有没有继续工作？

▲实际情况是，按照 1980 年所提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部署，据 1987 年调查湘、鄂、赣、皖四省上报，整个堤防体系达到规划要求，尚需投资 63.4 亿元；分蓄洪区安全建设尚需投资 45 亿元，合计 100 多亿元。

〇是不是后来国务院对这一计划改变了态度，有了新的打算？

▲我理解并没有。因为 1990 年 7 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还说:“长江自 1954 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测风云，要居安思危，早筹良策。当前要继续抓紧 1980 年平原防洪方案的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请国家计委、财政部给予重点支持，水利部会同沿江各省抓紧组织实施，加快建设步伐。”

〇果然一语成谶。我的印象，第二年 1991 年淮河、太湖大洪水，也包括长江中下游，造成大型灾害。应当是一次警告了吧？

▲岂止一次警告。到 1995 年大水时，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 2562 处；1996 年大水时，再度暴露堤身未达标，以及堤质的诸多隐患；今年大水时，又发生渗漏、管漏、塌坡、涵闸等几千处险情，甚至决口成灾。这都是堤防质量没有认真加固存在的问题。平常时间掉以轻心，洪水来临紧急抢险，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又难以达到质量要求，汛后还要重修，既不经济，又不合理。

〇堤防出现险情的并不限于长江……

▲我国其他河流也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是水利部门的主导思想，几十年来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维护；平常不认真加固堤防，等到大洪水时才临时防汛，上堤抢险。如不改变观念，以后遇大洪水还将造成巨大灾害。

〇但 100 多亿总不是个小数，恐怕正是“有些推迟”的关键所在。

▲100 亿元与洪灾损失相比，恰恰是个小数。这笔钱不肯花，那就看看不花的结果：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发生多次大水灾，1995 年五省统计洪涝受灾面积 6916 万亩，成灾 4381 万亩，受灾人口 7489 万人。死亡 1302 人，直接经济损失 592 亿元；1996 年中下游六、七月份(未包括五、八月)受灾面积 7305 万亩，受灾人口 7000 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700 亿元；这两年洪水都比 1954 年小，但受灾耕地和人口都比 1954 年大。今年的洪灾损失具体数字还未见公布，估计总不在千亿元之下。这三年长江中下游洪灾损失共达二千余亿元，还给沿江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痛苦，甚至人身丧失，以及许多间接损失。

〇合起来也超过 2000 亿元了，这正是三峡工程当局公布的对这一工程的总投资——其实我们知道，正如中国其他钓鱼工程一样，这一数目是绝对打不住的。三峡建设总公司的负责人至今还在强调：“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可以把长江上游洪峰水量拦蓄在水库内，减少长江上游洪水下泄流量，对保证长江中下游人民安全度汛有很重要的作用……”

▲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作用究竟有多大，让我们看看具体数字：长江的洪水量很大，三峡水库仅能控制上游来水，对中游湖南的湘资沅澧水、湖北的汉江、江西的赣抚信饶修水等支流洪水难以控制。1954 年洪水 6—8 月三个月长江上中游八里江以上干支流来水总量达 6570 亿立方米。其中，上游宜昌来水 2976 亿立方米，占 45%； 中游诸大支流来水 3594 立方米。这是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米的三峡工程得以控制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是有限的。

〇对于这一事实，坚持以三峡大库防洪者怎么说？

▲ 有人主张以水库蓄存基流——这只是想当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库容？还有一种想法是措峰：初步设计审定的以枝城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 95 亿立方米，但中下游还要分蓄洪 400 余亿立方米。如果考虑湖南四水进行预报措峰，以城陵矶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 183 亿立方米，中下游还要分蓄洪 300 亿立方米。在这样的局面下，沿江堤防还将维持高水位。

〇如果不靠三峡水库蓄洪，保护中下游有什么有效办法吗？

▲我们已经知道，1954 年洪水溃口分洪成灾水量是 1023 亿立方米。在中下游平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实现后，可增加下泄洪水约 500 亿立方米；利用分蓄洪区滞洪，可以解决约 500 亿立方米。

〇这就是说，三峡工程对减轻长江中下游洪灾作用有限？

▲是的。对长江中下游当地暴雨造成的涝灾，三峡水库也是无能为力的。今年长江洪水比 1954 年还小些，上游来水也不大，就算三峡水库已经建成，可拦洪减少中下游洪灾损失也不可能很多。所以说，加固加高堤防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〇虽然上、中、下游三个测点知道今年洪水没有超过 1954 年，但有些河段如沙市、监利、城陵矶、九江、湖口等处洪水水位逼高，还是达到以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堤坝在这里溃决，照样酿成灾害。为什么总体来水不大，却沿江险情频频？

▲洪水位逼高是泥沙淤积和盲目围垦造成的后果。长江泥沙增长，导致河床和湖泊淤积，壅高了洪水位。而泥沙增长的直接原因乃是水土流失：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不断减少，上游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五十年代初为 29.95 万平方公里，1985 年增至 35.2 万平方公里，达三峡以上流域面积的 35%。

〇三分之一强的土地随水流冲下！连通支流、并一直起到干流分洪作用的湖泊呢？

▲长江中下游两岸原有大量湖泊，1954 年通江湖泊共计 15329 平方公里，至 1980 年，仅存 6605 平方公里，减少了 8724 平方公里。湖北省的洪湖、西凉湖、东西湖等不少通江湖泊的湖口被堵，与长江不相通了。湖南省的洞庭湖区和江西省的鄱阳湖区，都新增不少围垸。减少了湖泊原有滞洪容量，对洪水位逼高的影响更明显。湖泊盲目围垦逼高洪水位，这是人为的增加洪水威胁。

〇报载“一位防汛干部对暴洪灾害的反思，不要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江泽民主席也批示“今年大灾以后，建议很好总结一下中国水利建设。”陆先生，今天是您 85 岁的生日，作为一生都在思索中国江河治理与防洪的专家，面对今年这样由于主管官员失职而造成的全民大抢险，从而促使决策者再度反思的局面，您有什么建议？

▲希望国务院明了，切实做好平原防洪工程，是减轻长江洪灾作用较大和比较现实的方案。建议国务院下决心，给予必要的投资，责成水利部门，将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工程限期完成。对规划内容，沿江防御水位等，根据新情况作适当修改。特别对于防洪的基本武器堤防，需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切实加固。同时加快流域上的水土保持工作；控制湖泊围垦：已定较大分

蓄洪区需建闸控制分洪，并作好安全设施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得不偿失的一些围垸坚决退田还湖。

我们了解香港和香港人么？

戴晴

从历史教材和回忆录上，我们知道，近代中国人每与中原强权冲突，英国治下的香港，无例外地为革命提供庇护。从开罪清廷维新第一人王韬，到 1949 年共产党建政之前的宝贵人才储备，无不和香港紧密相连。笔者本人亲身经历过的被阻于国门之外、作品遭封杀查禁，都直接感受到港人温暖的援手。

更不要说 1989 年的“春夏之交”——正因为港人对北京民众的声援、对落难义士的救护，以及此后年复一年饱含爱心与期待的烛光追念会，才使得这一镇压没像过去历次一样给抹得干干净净。还有失学的孩子、求助无门的患者、水灾地震、矿井崩塌，每当危险苦难肆虐，香港人都立即出现。

所有这些不事张扬的政治参与，内地这边好像一直没怎么当回事，功劳全是当时的英雄和后来的掌权者的，港人做了什么，从来一笔带过。香港人自己好像也没怎么当回事，默默地奉献之后，又默默自己回家“扪钱”，率真而沉静，而且一做就是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

7 月 1 号，在如今已经变得更喜欢情人节玫瑰和生日蜡烛的内地人心里，七、八个人在上海的一间屋子或者南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个会，So What （有何了不起）！如果再联想起内战、韩战、肃反、反右、大饥荒直至文革和今日的权钱交易化公为私，一党专制执政执成这样，那生日还有什么脸面纪念？

不巧江泽民（也许是邓小平，总之是对共产党怀有深刻感情的人）把香港回归选在了“七一”，这眼看着没彩头的日子又多了一分提气的借口。无奈港府在“港人治港”这点上，对北京过于心领神会了：没冲突好说，但凡有点让中央不高兴的，港府无不周到地迎合上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和内地所有官员一样，特首本来就是北京选的，不对中央负责，难道对根本不曾选过他的“选民”负责不成？

不能算逆来顺受，只能说大势所趋，香港人接受了这眼下人类文明体认阶段还无法更改的现实，成了共产党的间接治下之民。六年来，他们观察着并分析着，不同意见之间也都探讨着，在经过了政府赤字上升、经过了社会福利缩减、经过了个人资产缩水，并眼见着最引为骄傲的言论自由与职能部门的高效清廉，不知怎么都在打折扣，香港人不得不细想了，直到这次《23 条（国家安全条例）立法》。

谁人不要国家安全呢？但谁能说今日之中国，没人在以“国家安全”之名营私呢——为自己没有监督与制约的权势、为大义凛然之下太容易捞取的外快、为没人敢说个“不”字的挟私报复、为凑个数字上报成绩盯人、关人、折磨人，亮出的不是国家机密就是国家安全，这样

的“保障”，香港人再能忍，怕也不敢领教吧？

在这个原本只有独裁者才津津乐道的 82 周年和 6 周年，香港平民走上街头，直接表达对专制制度的担忧与厌憎。“七一”这日子，因为有了这 50 万明理、守法民众的抗争、终于闪耀出别样的光辉。

（美国之音）(7/11/20032:29)

我在八九学运期间的五次失误

"六四"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以今天来看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北京市民，一名有著一定知名度和一定社会联系的专栏作家，有不少应当反省之处。起码，我能回忆起在运动中我有这样的五次失误：

第一次，是四月二十九日。在统战部的一次茶会之後，我同一名激进的学者一道，开始起草一封"给中共中央的贺信"，祝贺当局在"四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明智地没有以武力对付抗议的民众。"但是这封信没有写完，也没有发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以有限度的抗争向强权争取本来属於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做法，能够向愿意以妥协来维持改革局面的官员送去正向的信息。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事实上，当时政府中的温和派，一次次打破历史惯例、极为艰难地尝试著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方式的态度处理局面时，几乎没有从抗议者的一方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所以，当时是强硬派一直站在一边看笑话，看温和派白忙而一无所获。

第二次失误，是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我到师范大学去，看见刚刚出发的绝食抗议队伍。如果我足够勇敢、足够自信、并具有足够的责任感，本应走到学生中间，提醒他们，那时的局面绝不是没有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我更应该提醒他们，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来不珍视人民的生命。在四九年之後的和平时期，遭到镇压、清肃、监禁、流放，以及在强迫推行的政策之下饿死、斗死、暴死的人，不下三千万。在八十年代初，北京人民大学学生游行的时候，一位八九年仍然在世并且具有极大政治权力的元老就曾经说过：学生子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後来的事实也证明，八九年中强硬派为了争夺党内权势，并不在乎死人。

第三次，是五月十四日，在争取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明确表态，不乾预当时著名的自由派言论在党所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之後，作为编辑与记者，我把当时名声最响亮的十一名学者作家请到我当时工作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安排发表一组他们的言论。後来，在广场上的绝食抗议的领袖要求我们到同学们那里做劝说工作时，我没有坚持留下来监督这一组珍贵文章的发排，而是跟著大家拥向广场"救急"去了。我本来应该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言论能在第二天见报，会是一九四二年以来，对党控制言论的一次最有意义的突破。

第四点我应该反省的是，早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就已经从可靠渠道得到消息，共产党打算将所谓"四个坚持"从《宪法》中拿出来放入自己的《党章》。改革派的这种打算，将是中国在随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改善人权与法制的基础。但是，由於担心向我透露消息的

官员受到惩办，我一直不敢将这个消息公诸於众。

第五，在五月十九日深夜，当我在北大读书的女儿跑出去拦军车的时候，我立即追出去把她截了回来。我当时对她说的是："你以为如果军车停下来是你拦的结果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军队？它是武装的政治集团！它停下来，是因为驾驶它的司机得到了停的命令。"如果我当时能把我的这些基本常识告诉更多的百姓，或许会减少一些长安街上的伤亡。(1999-06-02)(作者简介：戴晴，80 年代后期著名记者。因其李先念养女的特殊身份，89 学运中试图充当绝食学生和体制内改革派之间沟通的桥梁。未获成功。6.4 镇压后失去自由，关在秦城监狱。现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访问学者。)

我的四个父亲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在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学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敢道滹沱麦汴香，

臣惭仓卒帝难忘。

艰难险阻亲尝尽，

天使他年晋国强。

蔼蔼苍松伴紫芝，

颌眉妙墨出瑶池。

朽株新被祥风拂，

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义征服了顽固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

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份，几乎不用下功夫学？他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因为，妈妈作为

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来的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节，他的感受一定非常复杂。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４０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电般地结合，政治，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生死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郎才女貌两相忘，

赢得倾心是庆璋，

绝俗文章师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强。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迹，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与才气。在那首打油诗旁边，是叶参谋长的批语：

好不要脸！

但也不是所有的与宴者都如此顽皮。‘胡公’周恩来的题辞是：

形式与内容统一，

大璋和大庆同心。

他的贤妻给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相爱合作，

善处始终。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ＣＰ的母亲都以“革命”的名义容忍谅解了。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房。牢饭，发霉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狱卒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

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命。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４０年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

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自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７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辛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二〕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

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

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共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二十

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

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写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后写了１６年才写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并且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革命先烈万岁！

１９８３年2月2日　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开讲家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

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

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

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又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做一件坏事……”

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

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烧给你喝……”

他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俯过身去，那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回去看《李将军列传》，这是我最爱的一篇。”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何须看，我早就背下来了：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家无余财，终生不得封侯。

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遭遇，本以为可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前，先死于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受辱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自刎。

我的公公为什么在这一刻特特嘱我读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共产党建政之后，他倾注全力于他所主持

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广一样，没等他以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委”，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时间端正路线、开会、背诵主义教条，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竟是汉代李将军。

这是他要我读的么？

医生、我的婆婆，都催我离开，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情绪波动。我伏在床边不肯走，他们把我拉起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我现在给你鞠个躬吧，爷爷——”

我站在床边，深深弯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灵的敬礼。我曾在黎澍先生灵前这样深深致礼，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没有看我，也没有动。

我果然没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后。他是在异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离去的：他切嘱我的婆婆，绝对不许开官方主办的追悼会，不要官方悼词，不要通知任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终也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是刀笔吏！

５２年前，他从家里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讲“阶级”和“斗争”；此刻，他只要家里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亲人们送他走。

他弃学出逃的时候，顶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时候，切嘱要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学生装。

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自挽诗》：

是非功过两茫茫，

死后何须论短长。

平生不问毁与誉，

扪心无愧自蹈扬。

结发上阵书生气，

此际只余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处是吾乡。

他不愿去八宝山，我们将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这诗，王德嘉誊清之后，就镌在那方汉白玉碑上。

我的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都已经去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父亲。

我领略过父爱么？

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在那梦里，不知谁，也不知在怎样的一个情景下，总之有人确切告诉我：

“你的父亲么，就在那儿……”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张我平常睡的、空无一物的大床下，有一只空火柴盒，一只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种薄薄的、火柴还没有用完就会破损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后来的细节记不清了，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涧大河……我们——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护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个闪失，它会丢了，永远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哪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又怕这梦，怕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是这样么？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书中，读到“审父”二字时所受到的惊吓。我呆住了——审父？父亲难道可以审么？

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为走在“六?四”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确切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然在理念上接受“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

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父亲们一一离世后；

我—在—审—父，当“父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

我一在一审一父，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穷追猛打。这是一个时代，一种强权，当中国人醒了，成长了，不再幼弱无识地对“大救星”紧随紧偎；

我一在一审一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

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来越少。

我对它无比珍爱。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于北京秦城监狱

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原文注释：⑴　这是我的乳名，因为生在重庆，父亲又名“大庆”之故。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产党中央与“远方”的联络渐疏，第三国际要中共帮它建立自己的设于敌后的电台，父亲冒死赴北平。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华社社长。⑷　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所做的还是在修正他的无产阶级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尔巴乔夫，我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罢工，是因为对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这样为苏联的改革成功祈祷，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⑸　共产党向来看重党内位置，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读文件）的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为党内新贵。得知国民党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１９３１年，瞿在党内大势已去。当中共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西极端危险，且带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王稼祥、聂荣臻、毛泽东包括毛一次次怀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⑹　妈妈因临产逃过了日本宪兵队撤退前的处决。１９４６年，国共合作，部分共产党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党的关系，立即转述亡夫的请求。组织的答复是：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自己将有很好的学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⑺　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的褒奖状：“河北省大兴县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⑻　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心中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向读者作戏。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革命大话。不过，他常常喜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后，不妨翻翻。”⑼　她那时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彻底批判毛、刘精心营造的政治禁固的觉醒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觉醒与批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⑽　当

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好象还是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古庙里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器奏出。这曲子他常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悲凉中的坚忍，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东人，轻俏绵软的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恐怕还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的祖先有关？⑾　五十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吴晗有着很轻松自然的友谊，十三陵刚刚开掘，吴就领着他，当然还有我们一大堆累赘，顺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读书，看到他在广州期间曾尽力照顾绝无一丝阿谀的陈寅恪，心里更觉温暖。⑿　我１４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

清平乐　《植树》

三月薰风

吹遍秃山顶

挥镐植树林

石硬心更硬

这黑板报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经常“主动巡视”每个孩子的房间）。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薰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减字句。”⒀　他们兄弟二人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弟弟唐有祺赴美习化学，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门下，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⒁　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在大庆石油学院时，他的“滥用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死人的政治动员大会的。他是校领导，当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忍受。他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主席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力学。□　Michael　Zhu　摘于《明报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编者注〗１．中共党史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要将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叶剑英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得以逃脱，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然而徐向前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２．文革开始时曾有广泛流传的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３．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了彭关于党内斗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朱同叶向真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戴晴、司马璐等专家评说中共八十年功过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报导)今年 7 月 1 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的日子。目前中国正展开中共党史的宣传活动。80 年来中共走过的道路以及它对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有着强烈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有人认为，中共是一个利用恐怖和谎言作为统治手段的集权专制政党。

中国著名作家戴晴女士说，现在每天听到最多的报导，就是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好像它从 80 年前建党以来一件错事也没有做过，她认为，这种宣传是共产党维持统治的手法：

戴晴说："如果不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为它的统治不是老百姓选了它，而是靠武装夺取的政权，而且靠武力维持着。所以根据它上台的不合法性和它自己心里不自信，它必须用这种漂亮的大话来掩盖过失。"

戴晴表示，中国民众真正出自内心赞美共产党的时候不是没有。当新政权刚刚建立之际，全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讲真话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戴晴女士说："到了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了任何说真话的空间，它是用庸俗话和利益化来垄断全党，他们觉得干吗要说真话，干吗要让顶头上司不高兴，让他不高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已经不是从理想、从真理、从信念出发。"

司马璐先生曾经在 1937 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延安抗日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在香港研究中共党史，出版党史专著十多册。他说，中共早期的党员有很多理想主义者，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对俄国革命发生兴趣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司马璐说，在建党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两派的论争，列宁派占上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目前这样的集权专制组织：

司马璐说；"一派的人主张，要发展对共产主义有真正了解的人为党员，以教育为主。另外一派人主张，同时列宁也是这样讲的：共产党就是要讲激烈，讲服从，凡是能够服从组织的，行动听指挥的，不管他对共产主义有没有了解，都可以做党员。"

司马璐认为，这样一个信奉暴力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里吸收很多的人加入，依靠的是使用多种手法，其中包括政策多变，宣扬领导权威，两手策略，前后不一，里外不一等手段。司马璐说，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了中共领导人的两手做法。

司马璐说："共产党对很多事情有双重标准，对外讲，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对内讲，毛泽东对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看法却完全相反，毛泽东说，平型关打得太早，仗等于是替蒋介石打。毛泽东甚至说，日本人侵略越深，对共产党发展越有利。"

司马璐指出，共产党认为讲假话只是一种革命的手段。

司马璐说："讲假话是从领导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讲得很清楚，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工具。"

司马璐举出陈独秀的冤案，中共在江西时期整肃 AB 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冤假错案等例子说明中共在建党前 30 多年的转变过程。戴晴认为，延安整风是中共走上一言堂道路的转折点。

戴晴说："延安先是整风，把还有一点点新闻自由的报刊《解放日报》改版，最后通过抢救运动，用威胁的办法，使得全党只能有一个声音，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

司马璐认为，延安整风除了使用威胁的办法，也使用利诱的手段，如果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国民党特务还可以有奖励。

司马璐说："有一个学校的大部份小学生全部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因为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就可以发一盒饼乾。这种说谎给整个的党带成一种风气。"

中共老党员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谈延安整风时也讲到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说，当时在中小学生中挖掘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年纪从 12 岁、11 岁，10 岁，一直到发现 6 岁的小特务。一个小特务的姐姐对韦君宜说："你只要给他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司马璐表示，中共领导人讲假话是为了保住权力，为了相互利用。而下面的干部讲假话从消极方面来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共产党整人手段相当残酷，所以干部有时连沉默的权力都没有，比如反右运动，人人必须表态。他说，从积极方面来说，讲假话是为了向上爬。

前中共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苏绍智引述了出生在德国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德论述极权主义著作的观点。

苏绍智说："她(指汉娜.阿伦德)说，恐怖是集权主义真正的本质。第二谎言是集权主义主要的工具。后来萨哈洛夫夫人发挥了一下说，恐怖和谎言成为集权主义遗传密码的一部份。永远消不掉，要遗传到下一代。"

苏绍智认为，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集权主义的政权，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还坚持称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因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然而，美国汉米尔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李成说，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平等、女权和民主等观念，当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接受。

李成说："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革命有很强烈的进步意义。所以 1949 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实际上得到了民众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倾向于共产党。" 李成教授说，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掌握政权的合法性。

戴晴评李慎之(2)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

戴晴

没有人知道他被打成右派而遭受的磨难，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再次“犯严重错误”面对的煎熬，在他奋笔疾书的最后几个年头，李慎之无暇顾及这些“遗闻逸事”。他要以他做革命战士和“党的宠儿”的历练，说出中国最深刻的疾患，和刻不容缓的救治。

他先向“封建”这个被说成中国一切不幸之渊源的冤大头开刀。中共元老李维汉弥留之际特意求见邓小平，提出文革悲剧源于“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得到有改革意愿的邓的首肯。这里的封建，谁都知道，指的是“无人能制约毛泽东”。

把绝对权力归于封建，李慎之不同意。他辩称秦始皇称帝之前的封建时代，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为灿烂博大的时期。造成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乃至后退的，不是封建，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上的专制与极权。

他举出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以皇帝老子‘予一人富有万方’的威严，在计划经济和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实施“权力通吃”。

不仅制度，更在于精神；不仅领袖，更在“子民”。而国运前景之可悲，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在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里，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他痛切告戒有志学子：滥用“封建”这个词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

概念廓清的同时，他历数专制与极权如何给“新中国”带来的灾难。细察他的著作，李慎之从来不用“某人”或者“众所周知的原因”等等小小的躲闪来保护自己，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是秉笔直书。他感叹“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他痛惜任何革新的萌芽，“皆因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

怎么办？他以曾经革命、并靠革命取得了政权的胜利者的身份坚决否定革命。中国不能不变，但只能缓变、渐变、和平演变。大家觉醒，戳破谎言，争取“说真话”，并“从小处着手”做，在实现制度民主化过程中，完成子民公民化。

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他走了，这位大声喊出并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正是我们此刻想对他说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

了呢？

（转自美国之音）(4/24/200320:17)

"欺君之术"：中国在改革高潮中的媒体控制

图片说明：中国著名作家戴晴在哈佛的亚洲中心作了题为"欺君之术"的演讲。大纪元记者林之昊摄影。

大纪元记者林之昊波士顿报道/中国大陆著名异议新闻记者戴晴，应几所大学的邀请，到美国作了为期四周的访问。戴晴是原《光明日报》记者，开 办《学者答问录》专栏。她以敢言为海内外各界所瞩目。由于不满当局「六四」的镇压，她在事发第二天 6 月 5 日宣告退党，为此坐了一年的牢。如今，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环境下，依然写作，坚持自己的自由理念。

11 月 20 日星期四，她在哈佛的亚洲中心作了题为"欺君之术"的演讲。戴晴说，中国人的媒体欺上瞒下，从袁世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时的那份《顺天时报》，尽说他称帝是"民众的愿望"。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干得更绝，一切的媒体必须为党服务，媒体是党的喉舌。哪届领导人不是"红色皇帝"。1949 年后，在"人民当家作主"这句口号下，人民失去了思考权，失去了发言权；最重要的，真正地失去了知情权。

现在有句俗话叫：新闻中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如果你看到媒体宣传上号称"形式一片大好"，那实际情况就是危机四伏了。因为在中国，党控制一切，从国家资源到国家军队，从大众媒体甚至到人民的意见。

戴晴说，毛泽东一上台，就把所有媒体做了大肃清。反党的都被取缔，亲共"进步"的给予保留，中立的都进行改造。并组织了国家级机构"中央宣传部"，专门用于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自己也说，要"枪杆子"、"笔杆子"齐下。当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毛还是很受苏联的控制。为了不得罪苏联，取得它的经济援助，毛泽东不得不给苏联的"特派员"王明一个职位。于是就叫他去做"最没用的事"-- 制定宪法。王明真是很投入地去做了这件事，制定了"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宪法。制定完后毛说，"我们有宪法了，它很好看呢。"言下之义"并不好用"。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领导人说了算，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到现在为止没有用过。例如法轮功，人们只是想为健康炼一炼功，宪法上也是说可以的，但现实是"不"!

到了邓小平时代有所改进。戴晴说，邓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想在各个领域都进行改革，改正政府的错误，帮助文革受害者。戴晴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为此放弃工程师，改行作了记者。当时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十分开明，他在新上任不久后，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那段时间

的中国的媒体是少有的繁荣期，但时间很短。

六四后，一切的情况都变了。朱厚泽由于不肯作自我检讨，被罢官。邓小平的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下来，只有在市场经济方面还在继续，于是就变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也是有过滤性的，进来的都是垃圾，象商业浪潮、性解放等。而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意识”却被挡在外面。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思想自由”，媒体的控制和网站的封锁使我们知道的东西很有限。出版自由更别谈了。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宣传部的要求，书就会被禁止，报纸被查封，编缉被调换。戴晴说，现在没有一家国内的报刊能登她的文章。象《南方周末》这样还能说点真话的杂志，总编还是她的朋友都不敢登她的文章。有一家刊物斗胆登了后，立即被查封。她本人在十六大召开期间都被公安监视，不许出门。戴晴开玩笑说，现任“中宣部长”丁关根的绰号是“盯关跟” -- 牢牢地“盯”着你，一不服从就把你“关”起来，你要做什么一出门就“跟”上你。

当问到对新的“第四代”领导人有何看法时，戴晴说，她认为这一批人都是在有限的知识和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和蔼可亲”(nice guy)并不说明有能力带领中国进入新纪元。她对中国在近期内民主化不乐观。她说，中国就象安然公司，表面上很繁荣，里面遭透了，甚至比前苏联还糟，只是媒体上不透露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戴晴的观点不具代表性，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对中国的民主也有分歧，特别是“新左派”。戴晴就此说，人们谈到中国就会想到腐败的“官员”，但他们最没有想到是中国的腐败的“学者”、腐败的“教授”，腐败的知识分子。“新左派”还有一个名字叫“爱国贼”。那些想在当权者这边分点好处的人是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自我解嘲道，“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不多，我们很孤独，但不管环境再艰难，也要说真话。”

戴晴说，中国的发展有两根线。一根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我们跟台湾共同的地方。所以在台湾发生的，在中国也会发生。还有一根就是共产主义，这跟苏联一样，那么在前苏联发生的，在中国也会发生。不过要等到中国的“普京”出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变化。首先，互联网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共产党再封也封不全。还有，海外的华人在变，他们有的有很高的学位，有的很有钱，有的已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用自己的能力在不同阶层和方式影响的民主自由。好像《大参考》，凭一个人的力量，就把中国封锁的消息，传给了那么多的国内人民。戴晴说，这些年轻人就是中国的希望。

（大纪元）(11/23/20023:46)

三峡工程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谁是三峡工程的张文康(2)

戴晴

这次验收，对于水库 660 公里长的沿岸危险地质现状：崩塌、滑坡和地裂之多发，也是只字不提。就算我们已经忘记 1987 年全国政协科技组前往调查时，一方上百立米的山体就在他们的船头前边滚下（这造成该组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工程立即上马）；忘记此后没有间断过的地质灾难（最近的一次是去年三月威胁巫山新镇和一万新移民安全的 2000 立方米岩浆）；忘记已经花去上千万元、把新县城建在不稳定地层上的的奉节和巴东……难道连长江水资源委员会所做的调查：仅 2001 年的 1329 处该地区确定的滑坡和泥石流危险的地段也忘记了？

如果说“地质状况区区细节”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么一年多前的“三峡地质防灾事关重大中科院众专家主动请缨”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共党自己的喉舌报导，“与会的科研人员们一致认为，库区滑坡灾害的防治关系到三峡工程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库区子孙后代生命财产安全的千秋大计。……要在蓄水前集中力量抓紧治理。否则，蓄水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先不说一项大工程的地质科学调研到施工十年后才“请缨”这种国际玩笑，这回的验收怎么不见该项治理的结果？此时的不置一辞，有意还是无意？　主管人可能会说，这次验收合格，主要针对 6 月 16 日的船闸试通航。那好，我们就说说航运。 五级船闸从技术上说可以试通航了，一线升船机呢？我们记得，在 1992 年工程方案获得人大通过的时候，服务于客轮、过闸耗时 30 分钟的升船机与服务于货轮、耗时两个半小时的五级船闸，在完工投入运行上是同步的，还特别强调“升船机提前投产”。现在，升船机在哪里？如果还没动工，究竟为什么？谁该为这一重大失误负责？　　到 6 月蓄水，工程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二阶段。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 10 年间，有关工程的好几项重大政策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比如防洪，水库蓄水位究竟是 145 米还是 135 米，如果是前者，221.5 亿立米的防洪库容还能保证么？连这个数字都保证不了，三峡水库防洪还是不可替代的么？在 1998 年大洪水后，前总理朱容基和湖北省当局已经另做决定，另外拨款 25 亿以传统方式（疏通泄洪区、加固堤坝等）实施长江中游防洪。对此，三峡工程主管有何解释？

又比如移民。现在库区百姓已经创造了一个新词，即“李总理政策”和“朱总理政策”，前者是“上移后靠当地安置”；后者是“尽量外迁”。这正合了反对者早在 1980 年代就针对移民主管李伯宁的“上山种橘子”反复提醒的“移民安置环境容量”问题。李伯宁当时正忙著压下真正移民数字以获得工程通过，什么容量不容量，根本不当回事。现在你们打算怎么解释？

至于外迁的农民究竟有多么满意，据我们所知，两年前上北京向中央反映移民官员贪赃枉法的三位云阳代表到今天还关在牢里。到底有多少大小官员靠这数千亿元的工程款肥了自己？除了戴兰生、黄发祥、王素梅、谭和平，还有多少没挖出来的够判死刑的贪官？

陆佑楣不久前对媒体否认三峡工程有贪污，好像这位顶著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国务院总理）头衔的陆佑楣，不是工程的主管，仅仅是坝体的头目。外人常常挖苦中国工程师治国，看来陆副主任不枉为这一模式的代表了。他的这一优点最近又有长足发挥。在他应邀到北大演讲时，学生问到三峡工程的寿命。他不提黄万里和陆钦侃两位先生关于坝前石子堆积和库尾泥沙淤积对水库运行的致命影响，也不提开工不过两年就因为淤积而成为径流水库的三门峡工程，却断言“影响大坝寿命的关键因素是混凝土”（希望读者记得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潘家铮说的“用了很多的水泥和钱换取了不必要的强度保证”）结果是北大学子“深深的感受到三峡工程是崛起的是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陆副主任说谎的技巧比张文康怎么样？

（VOA)(5/29/200323:44)

中间力量的可贵

戴晴

应该说，这回的“7?1”民意诉求，以及当局——考虑到它专制的本性以党握军权的现实——难得的平和回应，与 14 年前北京“4?27”游行之后，开明的高层官员顶住本党历来的跋扈，开始倾听民意，颇有相似之处。

有 50 万人的无声抗议做后盾，自由党的田北俊成了拨动千斤的关键砝码。北京的两位，廖辉与刘延东所代表的，起码不是国安部与中宣部——谁都知道，这是中央集权两鹰犬——的意思。“香港可以自由确定通过‘23 条’的时间表和内容”，这一表态看上去平平，但只看新华社对港人的“7?1”诉求只字不提，就知道它有多么重大，决策层对它的认识与处置上的分歧有多么严重。当然廖辉已经不是当年的廖承志，他没有可能像他的令尊那样潇潇洒洒并毫无芥蒂地问“中央有什么屁要放”，但董特首毕竟已没什么犹豫地宣布了延后——这一宣布其实就是北京的意思，也是大家了然于胸的。

共产党当局因为声势浩大的民间压力而改变政策，这在它执政的 53 年里，极为罕见，从而也极为难得。这情形 14 年前 4 月底曾经出现过，激进的学生一绝食，局面立刻向强硬派张好的罗网里掉；3 年前的 4 月也出现过，朱熔基温和的处置，好像给了激进练功者迅猛发展的空间，一通快意之后，“610 办公室”成立。

这结局会在香港重演么？看“7?1”之后高官们关上门闷学“三个代表”（统一思想与统一口径），说变局完全不会发生，恐怕过于乐观了。但港人与中央毕竟隔了一层，让董特首下台，也没有像“打倒李鹏”那样刺耳。

其实这回最有利的一点，是和平示威就是和平示威，没有人可望从中大获其利。就算董下台，北京还政于港人，谁当特首仍须公推。这一法制传统保证了香港不容孳生振臂一呼的革命领袖。

如果北京强硬派抬头，拿出 1959 年对付西藏的一手，以平息叛乱实现对香港的完全控制——不但生蛋的鸡没了，想让台湾就范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一定把这前前后后都想到了。

六年前，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常常猜想，回归之后，究竟是大陆影响香港，还是香港影响大陆。我一直以为，从制度的先进看，当然是后者；但大小比例悬殊，恐怕难于操作。这回我知道“此言差矣”，因为受了自由与法制沐浴的香港人，包括阿婆与小弟弟，正在教大人物如何在“宪政”下做官。而从廖辉、刘延东的反应看，大人物并非只到董首府为止。

（美国之音）(7/12/20032:46)

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戴晴

在 5 月 1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官员再度被境外记者追问：政府怎么看军队退休医生蒋彦永的“愤然揭发”。和每次一样，这个倒霉的一线小官，拿别的大话云山雾罩一阵之后，表情僵硬地挤出几个字：不了解。

没有人相信认为他和他背后的当局在这个时候会对蒋医生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这名执政党小官，和别的大大小小的这类人一样，满脑子全是“上边规定”、“统一对外”、“组织纪律”……以及“不能让这号人得逞”。

哪号人？有话要说而且觉得到了危机时刻不得不说的人；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不为财富、不为红颜，只为良心遭受折磨非得“自行其事”一回了的人；出于专业本能和医生的良知，明知自己言论所指的对象，是有权、有枪、有整套的宣传机器，自己今后的处境可能很尴尬、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的人。

一线小官脑子里的非“这号人”是什么人呢？总的说来，是“不关己事莫开口”的“沉默的大多数”。专家们呢，长官这时候需要专家们么？需要！最需要的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赫赫的专家身份说党的话，比如 1958 年时候的钱学森和三峡工程上的张光斗，还有程度不同、档次分明的中钱中张、小钱小张。有了表现，“组织会看到的”，双方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没眼力架见儿、苯笨到家的“杠头”，比如马寅初、黄万里。

4 月上旬，SARS 在中国到底发病多少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主管在全世界的追逼拷问下依旧不肯诚实面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这一切，与蒋彦永医生本没有直接关系。这位 1940 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医学院的 301 医院前外科主任，甚至不属于应急 SARS 的一线医生。但他“非常愤怒”了，因为仅以他在自己岗位上的耳闻目睹，和随手在自己同事朋友间做的简单调查，已经足够戳破政府主管的谎话。当然，他是军人，又是执政党的党员，又是 1950 年代以来延续半个世纪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很清楚知道一个月前就已经下达了的对 SARS 病情“不许宣传”的“纪律”，和这“纪律”后边的份量。他可能已经在类似“纪律”、“精神”、“招呼”之中度过了大半生，并亲眼目睹了无视或忽略“纪律”、“精神”和“招呼”带去的后果。但这次他郑重地、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的“证词”送交媒体（最先送的是他所在的党掌控的宣传武器中央电视台，可惜无人理会），希望在这事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局面下，正视现实，共同投入对 SARS 的斗争。

结果是，全世界知道政府官员的撒谎，他也从此被“冷冻”。

他的袍泽，302 医院的退休教授姜医生和广东的钟医生受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他们本来都是好医生，敢负责、有担当，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唯一的小小差别是，蒋医生走了火，而姜医生、钟医生碰巧没有。当局或许会说，对，就是这样。你蒋彦永要是不乱放炮，打乱领导部署，如今可能正当著在总后卫生部专家组，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为人民立功呢。

如今——让你闹！

如果蒋医生不是今天的蒋医生，而是一个更谨小慎微些、想自己更多些、甚至更有耐心更“相信领导”一些的人；比如他没找 CCTV 和凤凰，更没找 Time，而是把自己的“证词”换个方式，变成向领导汇报甚至哪怕是越级汇报，他也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情急之下，见国人不理他，竟斗胆转向外人。

在他的脑子里，病毒和防治病毒是无国界的，防止疫情扩散是全人类的事。4 月中旬之后的事实和当局的姿态，显得也确是如此。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足够充份估计：草民性命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发展（或曰发财强国），孰个轻孰个重，他当医生的与当官的是有相当不同的掂量的。君不见，不“稳定”何来经济发展，何来既得利益者们的“恭喜发财”？

——原载《美国之音》

(5/14/2003 15:19)

恢复国际社会信任不能不从蒋彦永做起

——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二）

戴晴

鸦片战争以后民间流传过一句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连轴怕”的第一项如今照旧；第三项从来就是自欺其人；只第二项“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情形尚有些复杂。

道咸同光年间，还没有国联与联合国，洋人到中国是明抢。就算有了亚洲第一快船，无奈打不过人家，只好割地赔银子。而今不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了核能力，还荣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扪心而论，我们的掌权者对洋人依旧心怯三分：维权守土比不上俄国，坚持己见比不上法国，追究战争责任比不上韩国……整个撑着一个泱泱大国架子处处显得没底气。为什么？一个字：穷。穷之上，还要加上两个字“措大”。穷措大的典型表现是：本没有钱，却爱花钱，特别敢花借来的钱，借钱的时候又绝不放下身段。比如这回抗非典天大的事，中央财政拨款 20 亿，而此前公款吃喝每年 1000 亿，50 年国庆大典 1000 亿，三峡工程 2000 亿（这是官方给出数字，实际开销保密），还有总统座机、国家歌剧院、2008 年奥运等等花哨玩意儿……没一项不上百上千亿，而且全是党说了算、领导说了算。

这些钱从哪里来，除了祖宗留下的、透支后代的，另一个大头就是靠洋人，包括加工出口、吸引外来投资和出售种种权利（土地使用、资源开发、市场占有等）。

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对中国关闭，也没有洋人再到中国来花钱。当局在 4 月 15 日之后投入全力控制疫情，宣传机构嘴里说的，当然都是关爱生命，但如果回想一下并不算太久以

前发生、而且不见有根本解决措施出台的矿井塌方、学校爆炸，以及农民根本不敢生病这类现实，又很难不让人觉得，草民的命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这回的全民上下大动员，有相当成份是做给国际看的。

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维持出口、拉住外资，以防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动荡；特别是以后再也不撒谎、决心增大信息透明度、创建基础医疗等等，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但时至今日，似乎多是议论与火线表态，未见任何制度性改变。

如何看待蒋医生的“愤然揭发”,如何对待这自作主张挺身而出的“老同志”，遂成为当局是否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肯做些变革的试金石。或者换句话说：要想恢复国际社会对你的信任，不能不从蒋彦永做起。因为对他的评价，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条底线，即执政当局对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他们在重大国是问题独立发表见解的态度。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境外记者对此事一直揪住不放的缘故。记得 CNN 记者一个月前就问过卫生部高强“怎么让我们相信你”，高强回答“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他可能为自己熟练的外交辞令而得意，我们差不多要朝他喊：在蒋医生的事情上大度点、诚实点，比什么都强。

蒋彦永和他的“冲冠一怒”，不是军事机密、也不是外人不得干涉的内政。他的勇气与见识，正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榜样。当然据说蒋医生如今还有吃有喝地住在家里，这比动辄发配、掉脑袋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好了许多。但对他的扼闷与冷冻，恰恰反映了现政权依旧脱不掉继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衣钵、实施集权统治的可憎特徵。正是这一特徵，而不是蒋医生对全世界说了实话，才是使得洋人不敢把你当成平等的夥伴加以对待的根本原因。

（原载美国之音）(5/15/200315:39)

抗疫与中国民间组织

戴晴

世上的事物，对生活其间的人群而言，其作用与影响都有正有负，即使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在已经把非典列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的中国，网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 "党治不了的，非典都能治" 的顺口溜，真真是"说到百姓心里"：

非典“治病”

大吃大喝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公款旅游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文山会海、欺上瞒下、卖淫嫖娼，党治不了，非典治了。

这里说的是坏事。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还有不少好的事物，有许多属于人类经数百年摸索牺牲而终于获得的共识，无奈在今日之中国，仍为一党专制的政体所"严防峻拒"。比如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比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侵犯……还有虽晚近

些，但在许多国家已蓬勃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运行重要支柱的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NGO）。

应该说，所有这些，在非典期间的中国都如清明前后的小草一样，在处处冒头。比如天津镇民拼死保护他们集资修建的学校；比如网上自发的对非典疫情和救治办法的传播；比如在原先只有"喉舌"才许出声的重大领域出现的评述与抨击……在此期间，非赢利的民间组织也沉静、务实地活动着。平日他们关注环境、社区，帮助救助妇女儿童和小动物，如今在抗非典的特别时期，他们在网上征集志愿者，开展"黄丝带行动"，开通心理辅导的"天使家园热线"，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人脉关系，填补政府统一号令下的疏忽与不足……。

本来，在非典爆发之初，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呼吁：国难当头，正是扩展社会空间、消弭阶层对抗，实现社会宽容与谅解的大好时机。NGO 的组织者和志愿人士，正是日渐成熟的民间社会的代表，正打算以他们一贯的仁心、耐心与细心，搭桥、补台、扶助弱者……而且分文不取。十年来，他们举步唯艰，但公平的观察者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批人代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生长点。

现代社会生长点

有趣的是，在中国官家掌控的传媒上竟不见关于他们的只言片语，而他们超越自己直接领导的行动，不管起了多大作用，竟受到顶头上司不断警告。

民间组织从历史上看在中国虽然不很发达，但并非完全没有痕迹可循。远的不说，近代以来，宗祠、商会、同业会……都曾在中国人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到了 1949 年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统一调配资源，决绝地斩断一切横向的和区域性的联络，实施战时军事化的"全国一盘棋"：事事一统到底，人人服从中央。顺者昌逆者亡，官家组织之外的一切聚众行为都是居心叵测。笔者幼年时，曾经历政府对"一贯道"的剿灭，如今听到这三个字还本能地栗栗然。

时至 1980 年代初，民间组织在中国已经绝迹，包括念经的和唱曲儿的。为维持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有结社之自由"，以笔者见识所及只剩下一个支撑门面的"鼻烟壶研究会"。

1980 年代的开放与开明给中国人带来新的活气，有了一点余钱剩米、更兼爱国爱民之心膨胀的准中产阶级，终于在国家的灾难与不足--环境污染、荒漠化、教育与医疗缺失、野生动物绝迹……面前，走到了一起。联络他们的，不是宗族与集团利益，更多的是爱好与理念，还有常常遭人耻笑与误解的责任感。

其实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曾经（或正在）为官家效力，还有不少本人就是共产党员，但不知怎么，一说要自己组织起来，当局的脸立刻拉长。但中国毕竟已经"入世"，经济发展包括官员们发财都要依仗与外部世界"接轨"。与全世界有更多的共同标准与共同语言、往往更为外人所看重与信赖的民间组织，成了当局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烫山芋。

对来自当局的猜忌与刁难，他们心知肚明：共产党当初怎么把国民政府弄得焦头烂额的，不就靠着一个个地下组织么？由环境组织发展起来的绿党，在有的国家不是已经问政了么？上班有单位、退休有街道，非得自己再来个组织，怎么可能不认为是在和共产党叫号？

一句话，官家脑子里"阶级斗争那根弦"，不管怎么穿西装、坐奔驰就是松不下来。

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

没时间和那批把着权的小官僚纠缠。走出体制的束缚，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是他们眼界与心胸使然。这批先驱者已经脱出仅仅是自然人、经济人的境界，更看重自己社会人和文化人的角色，以及精神上的绿洲与蓝天。

（原载 BBC）(5/14/2003 19:41)

谁是三峡工程的张文康

戴晴

隐瞒疫情，张文康等主管官员遭到裁撤，原因很简单：如果听任他们在如此关键的位置上继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中国百姓因疫情蔓延死上几百几千不说，全世界的嫌憎与排斥，将使得对外依赖一日重似一日的中国经济严重受挫。

张文康 4 月 2 日亮出的，其实是标准的共产党官场身段，这我们在无数场合，包括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天灾人祸应对上，已经非常熟悉。记得当时胡锦涛的一句“绝对不许瞒报”，真有振聋发聩之势呢，只望这戒律，不仅仅在此一时，也不仅在抗 FD 一桩，那可真是中国百姓的福音了。比如值此三峡工程蓄水通航之际，我们这些沉默的出资人（所有在中国的用电者，都以没商量的电费提价方式，贡献“三峡建设基金”，每年 20 亿）最想知道的就是：三峡工程有没有向我们隐瞒什么？如果有，谁是它的张文康?

10 天前（5 月 21 日），三峡工程当局举行了“二期工程蓄水及船闸试通航前验收鉴定”。我们注意到总工程师潘家铮的闭幕讲话没有在《三峡工程报》上刊出，仔细揣摩之后发现，原来他充份肯定伟大成就之后，稍稍报了点“忧”，提到大坝“纵缝重新张开”、“某些坝段顶部水平变位较大”这类纯技术问题，认为“用了很多的水泥和钱换取了不必要的强度保证和大量的裂缝！”

当然这讲话后来出现在网页上。我们的好奇（以及捐了钱之后的担忧）遂被钩起：这重开的裂缝和坝顶的水平变位到底有多严重？连潘总说说都不行么？我们还注意到，在这次蓄水前的鉴定验收上，大坝及相关设施都周到地点到，却无一字提到将来水库水质，根本不理会国家环保局和民间环保人士一次次的严重呼吁。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所说“沿江城镇污水处理厂与规划进展有差距；工业污染治理项目进展不太理想；船舶污染和江面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较慢”；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们提到库区江水“刺鼻的恶臭”，“污水四溢的下水道口”；而累积了数十年的垃圾场（含有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上万所医院、诊所、屠宰场、化粪池，以及坟墓和被鼠药毒杀的无以数计的死耗子，不知该不该列入鉴定验收范畴。我们想知道，这回这些执行“技术性”验收的人有没有起码的环境知识，他们知不知道，当 6

月 1 日导流底孔的闸门关闭之后，上述那些东西要浸泡在静止的和差不多静止的库区江水里，而这水还是大量人口的饮用水源。不久前，19 名中外绿色志愿者沿库区徒步考察后，郑重提出“推迟蓄水”，三峡工程当局是不是也依照共产党历来的习惯和自己把持一方威权而根本不予理睬？

鉴定验收而不理会库底清理，确实是工程主管人的一贯思路。因为在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总投资上，根本就没有这一项。

这回的“有限清库”（比如无法清除而暂时采用密封措施）资金，还是中央财政特别拨款。一旦水库污染酿成灾祸，谁的责任？让缺乏环境知识、没有环境意识的人担任工程主管，又是谁的责任？三峡工程的张文康是哪一位？

(VOA)(5/28/2003 13:9)

新闻立法是测试中国前程的试金石

戴晴

中国百姓不是傻子，中国学者也不都是应声虫，就连共产党的官员，也并非个个尸位素餐。谁都知道新闻立法与中国前程的关联，包括继承毛泽东衣钵的“左派”。在这一关键立法上的较量，也就成了毛之后的共产党领袖打算怎么往前走的试金石。

1942 年毛泽东成功地将传媒转化为宣传工具后，直到他无奈宾天而文革终于结束，几乎没有人对这一政权的根基之一“笔杆子”提出过异议。“伟大领袖”在他众同志的簇拥下犯的错误，让他的后继人开了思路，从七十年代末，新闻立法——也就是对执政党和当权者要有监督——的呼声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推进改革的共产党领袖的首肯。

1980 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每届人大政协会议上，都有有关议案提出。到 1984 年，党自己批准了新闻立法的筹备工作，“新闻法研究室”遂在人大和社科院双重关照下成立，有关人员开始了新闻法草案起草。应该说，学者们的立足点（人的基本权利）与开明官员的立足点（繁荣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有差距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妥协基础上的磋商——标志就是八十年代后期新闻出版总署与新闻法研究室对《草案》的反复争论、修改。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在这里真能大书一笔，因为这其实就是中国改革走上正途的曙光。

1989 年，紧随着学生们街头示威之后的准革命，“无产阶级强硬派”终于得到机会将改革转向。而在那当口，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还正听取专家意见，承诺《新闻法（草案）》公诸于报端并展开讨论呢。随着坦克上街和总书记去职，新闻法研究室解散，主要推进者离职。毛泽东 1942 年定下的原则再度成金科玉律——这回这“笔杆子”要保着的，除了安享革命成果的“官僚无产阶级”，更添上了“改革”喂起来的“权势资产阶级”。

对他们的监督呢？任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么？“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么沉默下去？

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徐惟成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这种由党魁主宰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查封报刊、裁撤主编、层层审批在整个九十年代就没有停过。登峰造极之举是去年对四名在网上讨论言论自由的青年以"颠覆国家"入罪。

即将莅临避暑胜地"论秤分金银"的这一代领袖们，门面用语是"三个代表"。做寿出台的这十多项零碎法规，很像是在这个大日子之前给百姓的一点小甜头。只望交椅排定之后，哪怕为了自己顺利执政，也顶好拿出点过硬的货色，给供养着他们的纳税人看看。

－－原载美国之音(7/4/200221:51)

汤干了，鱼死了－－叶剑英的养女戴晴再度开口

《南德日报》对戴晴的采访(译注：这是１９９９年9月３０日德国《南德日报》（Ｄｉｅ　Ｓｕｅ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发表的一篇采访。我想可能有人会感兴趣，把它翻译出来，发表在网上。——译者)

戴晴成长于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家庭：父母是革命烈士，养父叶剑英元帅是毛泽东的好友。戴的事业也令人惊叹：红卫兵，火箭技术工程师，在情报部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在八十年代成了中国最著名——因为最富于勇气——的记者。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天安门惨案后一天，她公开宣布退党。后来她在狱中被关了一年，并从此不再被允许离开中国。在国外，戴以反对三峡工程斗士的身份而著名。５８岁的戴现在生活在北京，《南德日报》常驻北京记者凯?斯特利特马特（Ｋａｉ　Ｓｔｒｉｔｔｍａｔｔｅｒ）采访了她。

南德：戴女士，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从此站起来了〖译注：原文如此〗，现在中国站在什么地方呢？

戴：这就要区分两个概念：政府和人民。政府已经站起来了：它得到了国际承认，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人民如果站起来了，就应该为他的祖国感到骄傲，愿意生活在他的祖国。为什么在加拿大海岸会有中国难民船出现？为什么在美国和韩国使馆门口会排着长队？从江泽民和他的部长们的儿子，到腐败官僚的孩子，到贫穷的，把他１４岁的小孩送走的普通农民，从上到下，大家都在逃离中国。

南德：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戴：如果您说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比困难时期高了，比文革期间高了，对，当然对。但可以这样比吗？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问：如果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下，在一套正常的社会制度下发展了

５０年，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有多高？政府给予人民的，还不够。

南德：有一首歌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戴：我们唱的早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样的中国了。１９４９年他们还说是"解放"，可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允许有异议人士存在。中国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毛先是把"反革命"都干掉了，然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最后又解决了自己的战友。他要对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的灾难负责。

南德：那邓小平呢？

戴：他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１９８９年天安门广场，他窒息了发展了十年的人民的声音。１９９２年南方之行，他把妖精放出了瓶子。

南德：一个魔鬼？

戴：当时中国刚有机会放弃毛的集权制度，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而邓就使得权力接管了市场。看看这些新贵们吧，他们都来自政治上有权力的阶层。是权力使他们富有，而不是天才或勤奋。这是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分配会越来越不公平，危机越来越严重。可别上长安街两旁的办公楼的当。

南德：别人称赞中国进步时，您看到的是退步吗？

戴：一百年前，中国还有活力。当时的中国人还有新鲜的鱼和蔬菜，大家在考虑怎么能烧一锅鲜美的汤。现在汤已经烧干了，鱼也死了，而我们必须考虑怎么能把这点糊糊变成一顿饭，怎么再能把鱼变活。对此，我极为悲观。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办了坏事，受害的至少是三代人。

南德：您以前可是狂热的共产党员。

戴：开始确实有多数人支持共产党。共产党打跑了帝国主义，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解放军也是第一支宁可露宿街头也不强占民宅的军队。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就剥夺了人民应有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我们，在内部圈子里，并不知道这些。我受的教育是，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时说"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关于那些血腥镇压"人民公敌"的运动，我当时一点也不知情。

南德：您也当过红卫兵。

戴：国防部长林彪从１９６０到１９６６年精心组织，把毛变成神，他非常成功。１９６６年我完全崇拜上了这个神。那是一套有系统的愚民政策。但现在我想：任何一次灾难也有它好的一面。文化大革命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也包括我。这次觉醒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任何一个独裁政权都有两部分：独裁者和民众。现在我们还有独裁者，比如江泽民，他事事都和毛学，但现在不再有喜欢独裁的民众了。

南德：真的吗？

戴：毛死时，我们简直想替他去死。邓死时，在电视里可以看到，整条街上只有一个人哭，于是镜头就一直对着他。人民不再想哭了。

南德：八十年代初您还支持邓的改革政策。

戴：邓没有允许思想自由。他让我们失望了。任何一个普通的、不独裁的改革家都会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是邓彻底糟蹋了一锅汤。

南德：现在党和人民关系如何？

戴：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对当权者的愤怒找不到出气口。社会状况很坏。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甚至邮递员也要利用这一点小小的权力占便宜。手里有一点权力的投机主义者，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强取豪夺。被抢的也只会等待机会，自己也当上有权的投机分子。

南德：但现在，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职业，可以旅行，如果有钱的话。

戴：这就说到了点子上。银行存款的一半属于占人口总数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的人。您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一贫如洗的人吗？还是透过城市里所谓的飞速发展看看实质吧。这些漂亮的建筑，钱都是哪儿来的？以前人民拿了农民的钱，现在呢？比如东方广场吧，为什么香港巨头李嘉诚就可以修这么个大怪物？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不一般……

南德：腐败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吗？

戴：不，是独裁。腐败只是独裁的后果之一。共产党喊了十年了，要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可他们今年夏天又是怎么处理法轮功的？禁令、处理法轮功信徒，这些正好戳穿了他们的谎言。我一直希望党内改革派占上风，可是强硬派又赢了一回。法轮功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数千万的人在封建迷信中寻求解脱，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揭示了许多问题：教育水平低，缺乏医疗保险和许多不公正现象。人们认为，只有练功才能坚持下去。当然还有信仰危机：以前我们就是信毛。

南德：外国起的作用呢？

戴：中国表面上的繁华是一种曾经被人称为"摩脱罗拉精神"的表现，也就是说：买卖、资本、毁灭文化。摩脱罗拉精神已经传到了中国，可是从不提人权和自由。它只进行投资和买卖。

南德：可中国人愿意要摩脱罗拉精神。

戴：是的，那些从中获利的中国人，先把钱存在国外，再把孩子送过去。但是那些一无所获的人——这些人有很多——会产生强烈的恨，从长远看，这又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我相信，现在这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和如果我们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情况相比，要更长些。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时有一个故事：有个农村兵以前从未见过路灯，看见了，就自己也想有一个。于是他就剪断了电线，把灯泡摆在了屋里。现在也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忘了问一下：这后面藏着什么？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是悲观主义者。中国会走下坡路，直到最后。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２０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丢失的世纪。

南德：党在某些领域已经放松了控制。

戴：是的，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变化。但伴随它们的是好些坏的。除了政治上有权者对市场的控制，我认为军队权力的增长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不排除将来出现法西斯政权的可能性。中国变得强大了，又不进行改革，将是全世界的不幸。

南德: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后,共产党有意挑起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不成功。

戴：民族主义是中国潜在的危险。共产党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独裁。它总说"我们中国人"，这相当有效。中国的教育水平太低了，中国人还没有把自己从关于"国家"这个概念原始的感觉中解放出来。

南德：您１０月１日也庆祝一下吗？

戴：这次庆典是江泽民神化过程中愚蠢的一幕。巨额资金被浪费，还干了好些不道德的事。外地人被赶出北京。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只是做给人看。江想超过毛和邓，自己也想挤进皇帝的行列。

灾难性的政治工程

戴晴

三峡工程终于宣布正式开工。

几年来，不少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对灾难性大坝也有所了解的朋友一直在问：“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非要上这个工程不可？ 他们，那些高层人物，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

怎么会不知道？ 江泽民收到过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劝信？ 杨尚昆清楚地表述过军方的担忧； 乔石一再提醒宣传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还特别担心把移民问题简单化； 聪明肯学习的李瑞环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已相当细致，已分别对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问； 主管组织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模型只定性是不够的，要有定量分析”这样很专业的见解； 丁关根担心的是这样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就连李鹏也明白说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更不要说省长会议已经把话放在那儿了： 不能为了这一个工程而挤各省项目。

但三峡工程一直“宣传一面倒”地获得了人大的通过； 又违背人大决议，将“列入十年规划”强挤入“八五计划”； 还不顾专家们就移民与泥沙这两个几乎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迹工作者的近乎绝望的吁请，抢着、赶着基础开挖，宣布了正式开工。

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 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 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 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 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 5000 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 1986 年，赵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 1/3 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 年第 3 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

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 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93

美国之音：戴晴陈小雅谈六四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野战部队向赤手空拳的示威学生开枪而流血收场，已经十一周年了。中国在邓小平推动下，实行了经济改革，但是，政治层面的改革，基本处于一种等待和

观望的局面。在六四十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同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戴晴以及陈小雅讨论了「六四」相关的问题。

记者海涛报道：北京作家戴晴女士和政治学者陈小雅女士。她们都当过记者，而且都是出名的记者。戴晴在 89 年曾代表阎明复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本来是替政府作统战工作，却被政府关入秦城监狱。可以说她直接参与了八九民运，是当事人。陈小雅也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後来因写作「八九民运史」一书而被社科院开除公职。该书是天安门大屠杀后国内第一本有关八九民运的政治学术著作。

戴晴快人快语，她一上来就对记者的八九民运定义提出了异议。她说，更确切的说，11 年前的运动是一场抗议运动，而不是民主运动。另外，戴晴也不同意中国政治改革没有进行的说法。"在几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比如开方言论，报禁，党禁等等，这些方面没动，其他在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改革，天天，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日前表示，八九年采取断然措施，才保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但是，戴晴表示，她无法认同章启月得出的这个结论，无法赞成章启月对现状的描述和推导事情的逻辑关系。

因为政治观点而丢掉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的陈小雅说，要纠正章启月的说法，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就是："89 民运群众和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那些坚持改革和进步的这些力量的合作，使得中国历史发生了进步。而不是因为镇压导致进步。民众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他们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历史的进步，就是这样实现的。并不是政府单方面做出来的，也不是镇压者做出来的。"

回顾十一年前发生的惨剧，戴晴说，当初宣布军管，很多人反对，但她赞同。可后来的发展演变，完全超出她的预料："甚至到了六月三号的夜里，戒严部队同绝食四君子达成协议，让学生退出，我都是赞成的。如果你说不得已，到这时，还算说的过去。可是有一件事，你是绝对说不过去的。就是后来，学生撤到六部口，坦克追到后面，把学生压死。现在压掉了两条腿的人还活著，所有的人证都在。你甚至可以说，驾驶坦克的排长班长太激动了，但最后为什么没有对这个人军法处置?!"

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反思六四'，认为政府开枪镇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学生和群众的作法，逼著共产党开枪动用坦克解决政治思想问题。陈小雅是六四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她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研究政治学的陈小雅认为："从政治艺术来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共掌权后，在如何通过外交和其他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不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有，国际的潮流是民主与和平，更不允许动用那样的一种手段，来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可反思的。"

说到六四的平反或者重新评价问题，戴晴认为，无所作为是共产党的党性所决定的："共产党的传统是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有个非常可怕的传统，就是宁左勿右。谁要提出新的见解，不是一把手提出的，是下面的人提出的，向缓和方面转的，一下子就会有人出来，简直就要把他掐死，抢他的位子，骂他太右了，右倾就是叛徒。用这种方法来治他。这是整个共产党历史和性质造成的。"

戴晴表示，即便有人有不同的想法，也绝对不敢说，要等一个适当时机，要等江泽民先说。而江泽民自己也要想想，这种话能不能说，他说了，是不是成了历史罪人，是否成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

不过，戴晴认为，「六四」十一年来，中国的人权改善，基本上还是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她说，虽然其间发生了镇压法轮功和西藏新疆独立势力等情况，但从另一方面说，民间思想心灵自由都在增加，同时，对一党专政的疏离，更加明显，还有政府方面主持的立法，都表现出了进步。

背叛，还是归顺？——从《上海宝贝》看殖民地性格

戴晴

《上海宝贝》给炒得沸沸扬扬已经有些日子了，连总书记都从旁帮了一把。骂的多，夸奖的也不少。骂就不去说它了，誉者则多持“对主体文化背叛”论。

一声“上海宝贝”打动不了我这样的糟糠老朽。但老虽老，只要有热闹就忍不住凑上去看个究竟的恶习，还是逼得我把它从网上“载”下（舍不得家中的书架空间，也舍不得花去那份茶钱），拉杂读了一通。读毕不禁哑然失笑——不是笑著者，人家足够真诚，厕所里的事都合盘托出了；也不是笑奉命“嗅黄”之打手，只看那吆喝着虚晃一阵的架势，就知道“孰个亲、孰个疏、孰个乖、孰个乍毛”，人家当局心里明镜儿一般。我笑的是那批经纶满腹的论者。“主体文化”，您以为今天什么年代？连小孩子都知道“长大了要当老板”，只有政府里那帮白吃（纳税人钱粮）才满天价叫“四个坚持”——奔钱找乐子，这才是今日中国之主体。对此主体，宝贝们实在是趋奉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著者的笔触只在“乐子”上浓抹淡描，却略去了至关重要的“奔”，而与读者，包括绝无资格踏上宝贝们美丽新世界的劳苦大众，切切相关的，恰是这“奔”的方式。从这点看，著者对自己顺应主体的描摹，又是很机巧、很懂得逡避的。

上海是十九世纪中期首批在枪口下辟为商阜的城镇之一。乾隆年间洋人礼貌前来要求平等交流的局面已然不再。从踏上外滩第一步，洋人在上海就天然高出一头，包括他们带来的全套硬、软件：洋楼、洋行、洋装、洋噱头、洋式消遣，以及让非租界人艳羡的富庶与安全，当然还有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洋规矩和洋式思维。所有这全套的“洋”都要有当地人档次不等的服务（和后来的介入、独立执掌），上海人无以逃遁地浸润在这仰视、平视、俯视；驯顺、利用、欺诈的复杂环境中。一茬又一茬顽强地出现在上海土地上的铮铮硬汉可见史载，但不可否认地，一百五十年过去，当人口在这繁华旖旎大都从数万增长到上千万时，那精明乖巧、趋利避害、小天地里得享乐尽享乐的殖民地性格，在并非全面殖民地的上海，已从勉为其难变为顺应、变为习惯、变为性情、变为遗传基因。

“宝贝”们如今的表现，并不具什么新意。如果说 1950 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又拘又压、外加送顶高帽之后的盘剥，让上海性格或收敛、或转型了一阵子，一旦这"新形态殖民"（好八连不是洋人，但人家有枪，代表的是优你一头的无产阶级）放开手，老租界醉生梦死情调刹那

间油然焕发。不同的是，和三、四十年代比，洋人不再是从前的洋人，洋派也已不再是原先的洋派。今日上海宝贝不再穿着长袍跳华尔兹，在人家洋人已经有了亨利。米勒、有了麦当娜的年月，趋洋壮胆也另具形态——恣睢与不知耻的"上海宝贝"应运而生。著者几度宣称她对亨利?米勒的心仪，却忽略了这名反叛的放荡大师与他们致命区别：米勒藐视名牌和以名牌控制世界的资本。上海宝贝对种类东西不仅孜孜以求更须时时炫耀，露出了殖民地版放荡的马脚。

殖民地与非殖民地民众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清楚知道自己不是这方土地的主人，知道自己在重大的公众事务上没责任，也没有置嘴的权利。不错，开明的殖民者会赏给治下顺民一些日常生活的富足安定，但崇辱生死的大事自有人替你拿主意，您就乖乖地（或漠漠然地）活着吧。对自由、平等、权利等等，得西方文明之先的殖民地顺民怎么会没有感觉？但活跃在他们思维里的，只能是那根游动着的、不至激怒主人、不可逾越的线。他们是以数代累积的体验来把握自己的。殖民地人在襁褓里就须学会对强权不招惹——先是父亲，然后是幼稚园老师、班主任、管片民警、书记主任（近年来是老板），以及所有具象与抽象权势者。他们几乎失去了享受宽广领域里精神生活的愿望，只习惯在逼仄的空间玩细腻玩恣意——具体到当代宝贝们，就是在共产党让出来的空间里摆出似是而非的洋派头。

这幸福中的苦涩“宝贝”们自己并非全然懵无所知。譬如她无意间甩出的对一个女人装束的评议：“她的童花头……咖啡色的眼影……酒红色的唇膏……精致剪裁的亮色衣裙……海外的生活风气鼓励她们这样隆重地修饰自我以弥补华人种族向来被主流社会轻视的边缘地位”——真是一笔就点出了上海（还有香港）如此看重衣装的“内里虚”。就我阅读所及，宁可饿死也不肯住进租界的人是有的。两位，他们是陈寅恪与黄炎培。

昨天看新闻，见成都一些“经营性”酒吧，顾客多为未成年人，而以 14 岁左右的少女为多。看着那三三两两围坐桌边吞云吐雾的瘦小身躯，不由得叹了口气：都做着梦呐，盼着哪天走来一个有大套房和海外汇款美少年，或是有鼓囊囊的钱包的帅洋人（"家伙"大得吓人之美妙她们可能还不懂）把她带走……难怪《上海宝贝》在这个城市加印（或盗印）数十万册。

舆论骂死袁世凯？——关于《顺天时报》事件大参考

昨日本刊转载大纪元记者报道，戴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人的媒体欺上瞒下，从袁世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时的那份《顺天时报》，尽说他称帝是“民众的愿望”。云云。此说与史实不符，未知是戴晴信马由缰，还是记者的疏忽。实际上，袁世凯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相当不错的新闻自由状态。可以说，袁世凯称帝后，是被人民骂死的。现在谁敢骂江？

民国初期，报业发达，其中尤以日本人的《顺天时报》在京发行量比较大，袁世凯平素就爱看这份报纸。1915 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前夕，他每天必看的《顺天时报》的内容突然发生重大改变，篇篇都是劝其尽早举行朝贺仪式、进行登基大典的文章。这正好与算命先生给袁世凯批的吉日相符，又正好与袁氏祖茔守坟人韩诚带来的消息相应验。前不久，韩诚专门从袁世凯老家赶来北京，告诉了袁世凯一件奇事：袁世凯的曾祖袁保中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彻方圆里许；袁氏祖坟附近还长出了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他又奉上

了一块刻着“天命攸关”的石块给袁世凯，说是最近在袁氏祖茔里发现的。于是袁世凯以为自己称帝是天意使然，并开始日夜忙着筹备。他手下的狐群狗党也乘势组织了所谓的“筹安会”，宣扬君主立宪，策动“劝进”闹剧。一时间，各种请愿团云集北京，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正大位”，可谓乌烟瘴气所在皆是，蛙鼓鸦噪处处可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袁世凯偏偏喜欢看，下了“班”，总要看看《顺天时报》，该报登的反复辟言论，使他大发雷霆……他的长子袁克定心生一计，自掏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让父亲读后“龙颜”大悦。有一天，袁世凯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袁世凯的第三女儿袁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大吃一惊。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都不一样。袁静雪觉得很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袁克文早就看见了和家里不同《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说破，并鼓动袁静雪去跟袁世凯说明。袁静雪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十分生气。事情败露，袁世凯用皮鞭将袁克定毒打一顿，从此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1915 年 12 月 13 日上午，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正式登基。然而皇位还未坐稳，原先支持他的日、俄突然转变态度，劝其放弃帝制；与此同时，以云南唐继尧、蔡锷为首的各地护国军风起云涌。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倒袁浪潮迭起，前后的鲜明对比令袁世凯手足无措。

这张特制的《顺天时报》也就成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据当事人之一袁静雪的回忆材料，称《顺天时报》为“给一家人看的报纸”似乎更合适。袁克定不但给父亲看的《顺天时报》是假版的，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11/25/2002 3:35)

袁世凯称帝－－最可笑的是那被劝进者

VOA

“他害了我!”——这个“他”，无疑是力促袁世凯当皇帝的人。按蔡锷开列的十三名“帝制祸首”（即“十三太保”），一是提供理论依据并造声势的“筹安六君子”；二是实际操作“国民情愿”的“七凶”。这里其实漏掉了一个核心人物：“太子”袁克定。

这些人为什么要卖力推行帝制？而口口声声“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万一有人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的袁世凯，究竟在说真话还是像他历来最擅长的那样做假？

八十多年过去，后人翻检当年文献、记录已经知道，从美国顾问古德诺发出“推行帝制第一声（《共和与君主论》）”，到杨度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到全国请愿联合会、20 省区军事首长请“速正大位”，都出于袁世凯的直接授意。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徒有“大奸”之名，其城府既比不上早他 1800 年的曹操和司马懿，也比不上晚他几十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当一名实际独掌大权的皇帝化总统有什么不好？干吗非要那套形式——用当时人的话

说，“嘿，北京要起猴戏来了。”

不见有论述分析一个才智野心如袁世凯者，其幼年及成年，对加了辉煌包装之权势的渴望，会如何融入延髓血液，越过大脑思维而主使他的行动。再者，总统再煊赫，总有任期吧。任期之后，仪驾没了、待遇没了、拍马送礼的没了还在其次；最要命的，任内的糗事难保一定遮得住——这点子秘密，当时就已有人点透：“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疑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劳乃宣《共和续解》）再深一层，恐怕就是一姓而千秋万代的事了——但对这层，小袁想的，恐怕比老袁要多。

有了袁氏父子这层心思，周围揣摩上意、见风使舵的人还少得了么？“十三太保”里边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辅，赶着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

有趣的是，当年那些劝进者最拿得出手（并且最能堵住他人之嘴）的理由，竟也是“安定”、“求治、拨乱”（所谓“筹安会”即是“筹一国之安”）；对国民民主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效率：“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而“在稳定中富国强国（实行经济军国主义），然后才有可能谈立宪”，正是其理论核心。至于招各省将军到京“述职”以试探；各地军政长官对调……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知已经搬演了多少。

最可笑的是那被劝进者。搔到痒处的阿谀奉承太难抵御，想清醒也清醒不了了。而除了这被捧得忽忽悠悠的大头，谁都知道，那些除了钻营不大有别的本事的家伙，本意实在是为了在新朝分点油水。为此，他们是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只看那份只供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那则湖北军人上报的“宜昌现石龙、黄陂柳发青”；以及 1969 年林彪们攒出的“光焰无际”“万年天才”等。最恳切的要算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8/9/2002 19:35)

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停刊

最近，北京的两份原教旨主义共产党刊物的停刊在中国内外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分析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希望在领导人交接班的前后稳定舆论，禁止来自左和右两方面批评的举动。但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戴晴则认为，两份刊物的停刊与其说是受到整肃，不如说是一种扭捏作态的抗议。下面这篇评论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这回盛传北京两刊：《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封，其实不确。不错，下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两份高举无产阶级大旗、孤军奋战于金钱大海的革命言论重镇了。但人家不是被封（丁关根能对自己人下手么）这回是自己不干了：庄严地宣布"闭刊"——在当局的错误决定前，在自己声望日隆的局面下。

悲壮啊！

问题是，当局对他们做了什么错误决定？为什么说此刻"自裁"（而且两刊一起来）最是时候，

即最具轰动效果、胜过十篇社论？

读者诸君可能记得老毛晚年的时候，曾经不经意说了句什么，张玉凤赌气跑回家去，后来哄了半天才哄回来。谁敢这么干？最心爱的人才敢。《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下称"中真二刊"）这回的"不干了"和张姐的撒娇真太像了——咱们和共产党什么关系？怎么能对咱们这样？

怎么样了？敏感的老记们应该记得，不过几周前天气最热的时候，宣传部门在避暑胜地秦皇岛开会，说了以后"不能给错误言论提供阵地"。这条消息常规发出，大家都以为是老生常谈，所谓"错误言论"者，当然是可恶的自由派言论。《书屋》、《大河报》、《南方周末》等也都顺理成章地清除了讨厌鬼、换了阵地看守人。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可能……笔者无缘恭逢类似盛会，只能在此揣测……丁关根这回说这话的时候，脸孔拉得长了点；也许说过之后没有像以前那样强调正确言论阵地的"中真二刊"不在此例；特别是，当他随后补充"以后稿件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发表"时，竟没有说"中真二刊"就不必了。

真是奇耻大辱！"中真二刊"什么人办的？哪一个编辑不是审查别人出身？而今居然审到我们头上了？坚决拒绝！审去吧，老子不干成不成——张玉凤一跺脚回家了。

有人说"中真二刊"没人看，有人说他们财务支持不下去了，都不确。和张姐跺脚时一样，"二刊"如今正如一朵盛开的阶级大花，而且怎么说和中共有过恩爱。就算总书记如今另有新欢，比如私营业主，就意识形态法统而言，"二刊"怎么说也是自己人。还不用说多少革命老同志还是立场坚定、眼睛雪亮的。浓妆艳抹的洋妖婆，怎么能和一身军装、一派正气的张玉凤比？

就这样，"中真二刊"在关键时刻作出"自我关闭"的重大决策。老共会不会如老毛当年那样派要员前往安抚？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说真话 尊严地活着

戴晴

慎之先生走了，在 SARA 肆虐中华的当口。

他身体素弱。刚考上燕京，就像当时所有营养太差但思虑过深的青年一样，在结核的肆虐下吐血。之后前习不改，依旧苦学苦读，终于，孱弱的肺经不住过量的用脑——他走了。

直到 1980 年，在获得平反的前右派们一个个成为抢眼的明星时，知道李慎之的中国读者还相当有限，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动笔。他谨守着的角色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副院长，是一名中共的意识形态官员——这个岗位，据他自己解释，是按照党的需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为新政权而奋斗的年代，他是豁出了性命去宣传、奋斗的；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本着执政

党党员的党性克尽职守（那个年头唯一可看的大小《参考》都是他的成果）；到了邓小平时代，他褪去了青年人的激情与轻信，带着成熟的智睿和深深的忧虑，依旧以专家身份，在决策的最高层帮闲。

他依旧没有动笔，无论是 1970 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还是"清污"、"反自由化"等闹剧之后。直到后来读了他对王若水的悼念文字，我们才知道，这位博闻强记、思路清晰、下笔干净利落、还曾是几代领袖爱将的才子，那一阵其实已经快要摆脱掉他"先进工作者"，一贯"模范"，"很有党性"的身段，把该讲的讲出来……但还是顺从积习，选择了沉默。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心中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但人还在，心未死，观察与思维无法停止；终于，到了 1999 年，在他亲历了新领袖极度夸饰、花钱如流水、只有极权者才爱玩和完得起的五十年庆典后，《风雨苍黄五十年》问世。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亲历人的身份，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李慎之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

文章一出，全国大哗、世界大哗。外边的人为中共体制内又出一个异端叫好；里边的人，曾经和他一样自豪过、热爱过、疯狂过、被摧折过、痛惜过、继而依旧怀着无法扑灭的对"自己的党"热切期待着的同志与同胞，则感到深深的鼓舞与震撼。党史、国史千秩万卷，不曾有谁把大家心头的憋闷与愤恨说的如此令人折服，如此简洁、明澈、痛快淋漓。

那一年，他 76 岁。或许痛惜为党业浪掷过多心力？或许已经感到来日无多？他开始甩去绊羁，以独立的身份，发表独立的见解，"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被打成右派而遭受的磨难，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再次"犯严重错误"面对的煎熬，在他奋笔疾书的最后几个年头，李慎之无暇顾及这些"遗闻逸事"。他要以他做革命战士和"党的宠儿"的历练，说出中国最深刻的疾患，和刻不容缓的救治。

他先向"封建"这个被说成中国一切不幸之渊源的冤大头开刀。中共元老李维汉弥留之际特意求见邓小平，提出文革悲剧源于"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得到有改革意愿的邓的首肯。这里的封建，谁都知道，指的是"无人能制约毛泽东"。 把绝对权力归于封建，李慎之不同意。他辩称秦始皇称帝之前的封建时代，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为灿烂博大的时期。造成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乃至后退的，不是封建，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上的专制与极权。

他举出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以皇帝老子'予一人富有万方'的威严，在计划经济和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实施"权力通吃"。

不仅制度，更在于精神；不仅领袖，更在"子民"。而国运前景之可悲，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在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里，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他痛切告戒有志学子：滥用"封建"这个词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

概念廓清的同时，他历数专制与极权如何给“新中国”带来的灾难。细察他的著作，李慎之从来不用“某人”或者“众所周知的原因”等等小小的躲闪来保护自己，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是秉笔直书。他感叹“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他痛惜任何革新的萌芽，“皆因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

怎么办？他以曾经革命、并靠革命取得了政权的胜利者的身份坚决否定革命。中国不能不变，但只能缓变、渐变、和平演变。大家觉醒，戳破谎言，争取“说真话”，并“从小处着手”做，在实现制度民主化过程中，完成子民公民化。 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他走了，这位大声喊出并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正是我们此刻想对他说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读《历史的先声》随感戴晴

不知编者和出版者为什么没有以《庄严的承诺》作为这本书的正标题。"历史的先声"太抽象，给人以不知其所云的感觉，再加上封面上被宣传机构用到滥的伟人挥巨手的照片，弄到一本绝好的书——无论当严肃或消闲的阅读，还是作为手边随时查阅的资料——卖得平平，书评界也是一片寂然。当然，也许这正是出版者出于自保而追求的效果：今天中国的事是越来越波谲云诡了。

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前（确切地说是 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不信，只看这顺手拈出的几处：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 2000 年 3 月 9 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幺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专论，1944。按：共产党建制 50 年，至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幺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 19 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 1980 年代末才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这后两则，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无话可说"。

读《秦相李斯》

戴晴

如果没有司马迁“察其本”而著《李斯列传》，说不定这名以献计灭六国、废分封、尚“酷刑”，终于从“布衣黔首”而“位极人臣”的人物，会和周、召二公一样，以“极忠”而享誉千古。幸而太史公以相距 100 年之"近人"资格，条分缕析地讲了他的故事，后世才有了一个作法自毙的"奸相"的模型。

2200 年过去，咸阳早已失了往日繁华，儒学也历经了焚坑（秦）、独尊（汉）、道统（以下历代）、砸烂（"五四"）、创造性转化（20 世纪末）等翻天覆地的命运，到了新世纪的开头，李斯，这位儒家"最后的亲传弟子+儒学杀手"的故事，居然又在一大片"DOS 文本"、“网上跟帖”“搜狐”……的嗡嗡声中（从始皇帝到毛泽东看来必是如此），娓娓地+骇骇然地讲了起来。

作者“生在红旗下”，文化革命的时候尚属幼年。就在王朔、姜文辈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泡妞的时候，他感到了什么？从他的序言中，我们知道，到他已届“就学”、于不经意间翻读《史记。李斯列传》时，先是“悚然”，继而“着迷”，“后来多读了几遍，想见其为人，那中间隔着的两千年的时光竟渐渐融解消失了，觉得他好象还活着，在我们中间。”

有这个可能么？如果有，那么在我们这个有了政治局、互联网和垃圾分类的社会里，究竟有些什么要素令李斯们（外加与其互生的秦皇、赵高、蒙恬们）依旧得以存活且“种子绵延不绝”呢？而在没有了阉竖、嫔妃、公子和舍人的共和国，李斯们又以什么面目和招法出现呢？

按照本书著者的诠释，李斯并不是一个生性残忍、一意在暴戾恣睢中找乐子的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继而为王者师的思想家。他出身微贱，野心也不很大，开头不过想随大流弄文凭、混个处级待遇，平调“回上蔡郡府为官一任”。但权势这东西在任何时代都太具有对人特别是打算“上进”的人的魔力了。李斯也未能免俗。他从挑水扫地替老师抄书开始，接着审时度势，抛却悖晦的、没有含金量的学业而转向霸业。他接近权力中心的方式不足为外人道：吕不韦的眼线、阉人的引荐……。抓住每一个机遇，不过是李斯得以成为李斯的开始，真正让他露头角的，一是对权势人物的揣摩与迎合，二是笔头子上的工夫为霸主已经做下的事情制造理论依据。

他的第一个象样的职务是掌管公检法和秘密警察的廷尉，第一件大事是借暴君之喜怒无常灭了才华高过自己的哥们儿（韩非）。而真正的建功立业，则是在“分封”还是“一统”这一重大理论上的建树秦王从此成了始皇帝，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延续千年。身为丞相，固然日日觳觫于“伴君不易”之中，但同样可以借用君王之手而报私仇，更何况这报仇对象又是“抨击社会制度、非议现行政策”、老是“和自己过不去的讨厌的儒生”。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了“焚书坑儒”。有趣的是，对于这宗让士大夫唠叨了一千多年的暴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并不把它当回事，他在建政的开头曾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镇压了 120 万反革命。"而到文革后期（1973 年 8 月），在写给郭沫若的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劈头一句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李斯干下的最后一件大事为自己相位的巩固而矫遗诏，把一个烂皇上秦二世扶上台，此后不过一年，不但以自个儿宰相的金贵肉身经历自己创建的酷刑，最后还死在“五刑加腰斩”中。那起因么，依旧是告密，只不过笔杆子再阴，也敌不过皇上身边日夜伺候的人。

作者行文流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敲打读者的感受。笔者以为，太史公最初让他感到的着迷与悚然，没有 100%传递出来。不是他在史实的叙述中有什么重大疏漏，而是这类感觉总是为捧读者接连不断的忍俊不禁所打断。比如说到皇上的学识能力，"虽不能举一反三，但举三反一不成问题"；说到始皇之母得到缪（女偏旁）毒服务之后，"蓦然生出'做女人真好'的感觉"；而对于先下种后（向王）进献女人的勾当，李斯的见解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只要能长治久安，何必管是谁家的孩子呢？"

是不是“觉得他好象还活着，活在我们中间”？

《秦相李斯》著者钱宁，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 月，131 千字￥16.00 元

遭人唾骂的皇帝——袁世凯

VOA

从三皇五帝算起，中国的皇上大约总有一、二百位吧。除了唐高宗、唐玄宗、宋徽宗等有数的几个在生前出于种种不得已把位子让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的，一个个都万分留恋地挨延到生命完结。被史家说得最为震古烁今的清乾隆，80 岁上安排了心爱的、正当而立之年的小儿子嘉庆继位，自己——不知是忍不住、舍不得还是放不下——又掌了三年实权直到撒手西归。

当皇上就那么舒服？那位子就那么让人恋恋难舍？

在中国长得没有尽头的专制皇权更迭史上，有一个突出的例子：皇位费了牛劲才攀上；攀上没几天就已经在火上烤；最后在一片骂声中羞愤而死——这就是 20 世纪初那个“关起门来”当了 83 天的“中华帝国”大皇帝的袁世凯。

就在他宣布承受帝位（那天他没有戴出那顶“垂旒天平冠”，但椅子上已经加了黄缎垫披）之后不过五天，江西都督李烈钧就到了昆明；12 天之后，他曾百般笼络的“昭威将军”蔡锷通电各省 组建护国军——讨袁护国运动开始。他的罪状么，按护国军在“讨袁檄文”里历数，最鲜明的一条就是“背食誓言”：三年前与南京政府在《临时约法》里约定的“主权属于人民”，在他欣然接受的推戴书里变成：“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这时已近 1915 年底。国号为“洪宪”的登极大典定于 1916 年元旦。

即将交战双方从表面看，所领军队、所占地盘、所能调用的物资，实在非常悬殊。用袁本人的话说，护国军是“以一隅抗全局”，“不难迅速消灭。”说这大话时他忽略了一个无形因素：

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尽人皆知，袁世凯一生，只知有“军意”，不知有“民意”。或者说，在他心目里，所谓“民意”，是可以营造、收买而随时服务于自己的——只要牢牢抓住军队。

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为邀买人心、寻求拥戴，对皇权一整套运作熟极而流袁世凯，把所有能调用的招式都用上了：封王授爵（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清废帝溥仪为懿德亲王，还打算将革命领袖黄兴招回国赏亲王衔）；礼优元老（封“嵩山四友”，免跪拜，赐坐轿子、矮几）；对各省文武更是轮番招见，紧急加封各档次将军（壮威、宣威、扬威……泰武、同武、兴武……将军）。

但人心是买不来的，哪怕再度纵容南征的北洋军人对所过村镇实行酬劳式的“三光”。到了转年三月，袁世凯也知道“完了，什么都完了”。他以退为守，提出“撤销帝制、取消年号”，打算返过身来重做大总统。但讨伐与通电独立已响彻半壁东南。这个府库充盈（对外大借款）、部旧鹰爪遍地、一肚子倒钩连环计、“满脸都是戏的政治魔术大师”，已面临众叛亲离——

5 月底，“催命汤”浇了过来——本以为最忠心的鹰犬陈宧从四川发来“断绝关系”电报，老袁只觉眼前一黑；而当倚为左膀右臂的湖南将军汤芗铭的电报也到了的时候，他又一次气得昏厥，从此卧床。

处理政务的“榻前会议”开了几天，到了 6 月 6 日，袁世凯命如悬丝。注射强心针后，大枭雄喃喃吐出两个字——“约法”。哪个约法？与孙中山定的那个，还是后来自己钦定的“新约法”——这里边一项重要的更改是可以指定接班人，那写著名字的纸条就放在……“金匮石屋”！守候在床前的“太子”袁克定叫道，他知道自己是三人中的一个。打过第二次强心针，大总统又转醒过来，说出了最后的四个字——“他害了我！”

袁世凯在全国唾骂声中死去，年仅 58 岁，比中国今天在北戴河开会的列位政要都年轻。(8/8/2002 20:26)

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在澳大利亚国际河流年会上的演讲

原编者按：今年九月初，戴晴应邀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２００２年国际河流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河流的未来，水的未来”，涉及“大 坝的影响”“气候变化与河流”“灌溉与节水”“河流管理与社区参与”“河 流岸线设计”“河流与生物多样性”等各种各样的议题及丰富多采的活动。参加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其中非政府环境组织的代表尤为引人注目。 九月五日，当戴晴作完题为“长江上的三峡大坝”的激情演讲后，与会者报以 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以致戴晴不得不向听众多次鞠躬以表谢意。 （一）三峡工程 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的三峡大坝，已经在它１７年的工期中走过 了１０个年头，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收尾。到明年６月蓄水发电时，我们反对者从一开始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将无可避免地暴露。 １９９２年，当三峡工程在执政党的操作下，由人大获得通过的时候，当局宣布了它“无可替代”的优越性：最大的防洪效益；最大的水电站；最显著的航运效益和造福于当地居民。同时宣称：我们（中国政府）有足够的钱和技术建造这世界上最大的工程。

十年过去，明年６月是工程最关键的日子：二期工程完成，开始蓄水发电。 十年前所许诺的诸般优势，在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面前，究竟如何评价？

１）防洪

按照推进者所给出２２１．５亿立米的防洪库容，即水库蓄水位从１４５米至１７５米的容积。以１９９８年长江一般洪水量计算，７天的水量约５００亿立米；６—８月三个月长江上游宜昌来水约３０００亿立方米，中游诸大 支流来水３６００亿立米（即今年的洞庭、鄱阳类型的洪灾），这是２２１． ５亿立方米的三峡防洪库容控制得了的吗？

更何况，在三峡当局内部文件里，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成员张光斗指出， 如果将防洪限定水位定在１４５米，防洪库容其实到不了２２１．５亿立米。 他建议将该水位降到１３５米，并向公众隐瞒。

在这样的混乱中，对三峡工程一直持冷淡态度的朱总理已经另做决定，在 １９９８年后拨款２５亿人民币以传统方式（疏通泄洪区、加固堤坝等）实施 长江防洪；长办的官员和新到任的湖北省委书记也明白宣称不相信三峡工程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下游洪水。

２）发电

也是在同一份文件里，张光斗说了这样的话："二滩的电现在卖不出去， 电价太贵了，打死人也不会用。"那么，按照投资与还贷计算，与二滩电同一 价位的三峡电（二滩大约＄９０００／千瓦；三峡按照总投资＄１８００亿计 算，为＄９８９０／千瓦），具有市场竞争力么？值得占用常规防洪资金、牺牲航运、动迁百万人以达成么？还不要说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远不止＄１８００亿——这在后边还要说到。

３）航运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６月，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将经历１６０天碍航，６７天断航，仅重庆市航运业在此期间即会有十多亿元损失。有关专家根据当年葛洲坝船闸运行的经验判断：长江此后至少要一年半才能恢复正常营运——这还没有将双线五级船闸的事故率包括进去；没有将许诺中的升船机不能投入运行给旅客带来的时间损失（旅客将与货物一样花３－４小时过 闸）、防洪水位定在１３５米后的航运损失、泥沙淤积可能带来的碍航等等计 入。

４）移民

三峡工程究竟动迁多少人？１９９２年人大审查时，推进者所报数字为７２．５５万，主管官员一再告诫下属绝对不能提超过１００万。这一数字后来由官方自己更改１１３万，现在有时候用１２０万。 这里边，没有将河道型水库因０．７／１００００的水力坡度而造成的库 尾的水位比大坝的水位高出４６．２米的移民计算在内，未将十多年来库区普遍超生的人口、间接动迁的人口、官员为捞钱而捏造的"假移民"计入。

由于长江１９９８年洪水所暴露出的环境脆弱，移民基本方略已经从原先的“上移后靠就地安置”变为“尽量外迁”（到沿海１１个省市）。当局宣称到明年6月，将完成二期工程５５万移民的安置。原来设定的移民的安置费为＄１１０亿，后增加为４００亿，现在追加到＄７００亿还不够。据估计，到２００３年，将花去＄１０００亿。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向外省安置，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移民的投诉、请愿、示威没有停止过，当局已经数次动用警察。
（二）未曾预料的问题

推进者当初未曾预料的问题和险情已经出现：

１）坝体和船闸都有裂缝，并有扩大的趋势；

２）蓄水后，两类污染可能会使作为百万人饮用水的三峡水库成为巨大污水塘：水库沿线和上游没有得到处理的工业与生活污水垃圾；以及１３５米以 下原先的工厂、矿山、医院、住宅、坟墓……包括发射性杂质和传染病毒。在 工程最初的投资分配里，并没有该项污染治理与库底清理，直到２０００年４月，工程环境监督的主管人才到重庆做调查，开口向政府要求＄３０００亿（注意，工程总投资才＄１８００亿）进行污染治理。政府目前也仅拨款１亿人民币应急。

３）地质灾难

长达６６０公里的三峡库区是崩塌、滑坡和地裂的多发区。１９８７年， 当政协科技组前往调查时，一方上百立米的山体就在他们船头前边滚下，许多 人遂坚决反对在这样地质区建坝。从那以后，地质灾难不断发生，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三月，大约２０００立方米岩浆威胁著巫山新镇中心区，威胁到一万新 移民的安全。

地质专家发现，已经在新城房屋、桥梁、道路上花去上千万元的奉节和巴东，实际建筑在不稳定地层上。已经完成一半的搬迁工作全部作废，须重新选点，重新安置。

位于奉节和巴东之间的巫山新县城，大约有一半建筑在老滑坡之上。三峡 地质灾难防止部门的工程师许开祥说，在那样的地质条件下施工，会诱发滑坡。

这不过是已经发现的事故中的一部份，因为这样的事故是不对公众公开的。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否认，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实际建造在滑坡地裂的地 质活动区。长江水资源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去年就在这一地区确定了具有滑坡和泥石流危险的地段１３２９处。

４）总投资

１９９２年获得通过时，工程推进者说只须＄５７０亿，１９９３年长到９６０亿，１９９５年之后改为１２００亿，现在的口径是１８００亿。但据参与者透露，在内部给出的真实数据是＄６０００亿（接近我们１９８９年替他们做的计算＄５９００亿）。事实上，十年来，如果把中央政府已经追加和 将来不得不追加的环境、地质、文物、移民经费，以及事故赔偿、失误返工、 特别是当前的主管人员的贪污和将来的移民闹事也算进去，三峡工程会成为世 界上最昂贵的水电工程，成为一个填不满的黑洞。（三）谁要这个工程？为什么？

既然如此，究竟谁要这个工程，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工程还得以推进？

这是当代独裁者（毛泽东、邓小平）的“功业工程”：他们按照个人意愿 调用全国资源，完成自己的历史丰碑。

这是一批在共产官僚体系里由此获得提升却可以完全不负责的人的工程： 前总理李鹏，他是该工程最积极有力的推动者，从局长一路升到总理；前水电 部长钱正英（７９岁)，她退休后转到全国政协任职，名义主管文教卫生，至今仍是水电系统最具权势的人；具有中国最高科学与工程头衔（双院士）的张 光斗（９０岁)，他是共产党中国的特产，以专家身份为当局所有政策作解说与担保。

无论三峡工程出什么问题，无论长江遭受什么样的毁坏，无论被迁移的百姓过著怎样不堪的生活，对以上人物，活著的和已经死了的，都不会伤及一根毫毛。

在中国推进这样一个灾难工程的，还有一批不具有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水电工程师，一批迷恋权势的贪官，中国和外国得以从中获得利润的公司，想 以此换取政治利益的外国政客和银行家，还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三峡工程是中国当前蛮横的政治制度和权势市场经济制度的集中体现，将 给环境和平民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发生变化，三峡工程在 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损毁的长江不是第一条，也不是最后一 条；受到损害的百姓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君不见，那些专横、贪婪的政客商人，为三峡工程推进的模式所鼓励，正把手伸向黑龙江、鸭绿江、嫩江、怒江、岷江、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

在已经成为“水坝大国”的中国，我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没有机会表达上述意见，更没有力量对政府进行批评、监督、制约。

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和你们大家对三峡工程、对长江、中国环境的关注。我不知道谁可以救三峡，只有在绝望中不懈地努力，人类才得以自救。

长江的人祸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

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 40—50%下降到 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 4%，有的地方只有 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 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 22%，水土流失面积 36.38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22%；仅仅三十年后，到 1986 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 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 73.94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41%"（《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 14 个县发生泥石流；到 50—60 年代，先后有 76 个县；到 70 年代增加到 109 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 1950 年平均含沙量 0.9 公斤公方，到 1981 年 1.95 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 6.81 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 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 4300 多平方公里缩小到 2600 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 293 亿立方米衰减到 174 亿立方米"（《中国改革报》8 月 6 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 220 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 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 64000 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 80000 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 1954 年水准（4587 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 1954 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 1032 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 2000 万人口和 5000 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 50 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 50 至 100 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

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 200 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 500 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 1991 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1954 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泽东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1980 年赵紫阳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1988）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 1972 和 1980 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 1954 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 1954 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 700 亿立方米减少到近 500 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

“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 18 项工程，由中央投资 15 亿元，从 1981 年起到 1987 年，已安排投资 3.99 亿元，有 12 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 1980 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 1980 至 1990 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 1991、1996 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体手臂，彻夜不眠、拼着性命执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问题是，这一本应完成于 1990 年的规划，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没有谁将它明令取消，确切知道的只是，“到了 1985 年，当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两条调作他用，其他两条工作缓慢”（李锐）。

出了什么事？

原来，“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 1980 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 （《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

◆ （四）天灾欤？ 人祸欤？

15 亿元的资金筹集竟如此艰难，以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个中要义，至今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倒是，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时刻：如果有了 1980 年规划方案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吗？至于无限期推迟 1980 年规划方案的理由（投资艰难），只须将这两者所耗投资作一个比较，就不难都明了。

1980 年规划方案当时预计 15 亿元。从 1985 至 1998，上亿元的中央拨款，只有到了今年 8 月初，当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拨款 17 亿元（"水利基础设施"）。紧接着，在 8 月中旬第六次洪峰过后，再度"加大力度"，拨 170 亿元。

三峡工程呢？

虽然李鹏前总理曾在讨论该工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白告诉钱正英：“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但这项最终将花去不下 6000 亿元的世纪性里程碑，在 1992 至 1997 年间（一期工程），已经用掉了大约 1000 亿元；接下来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钱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 300 亿。

艰难不艰难？

今年三月，就在李鹏即将离开总理位置的时候，倾心倾力，再度为这个广泛受到批评的工程上加钱。据《中国信息报》3 月 17 日报道：中央为支持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近出台了 11 条优惠政策：（1） 国家银行贷款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 2-3 个百分点；（2）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不占国家计划控制指标；（3）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庆设立金融机构；（4） 5 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贷款 15 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

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5） 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 5 亿元，确定项目 30 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信贷

计划 4.12 亿元；（6） 打破 2003 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8500 万美元指标；（7）"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 7500 万元；（8） 国家开发银行对重庆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业、重大项目承诺贷款达

16 亿元；（9） 安居工程贷款 5 亿元；（10）总理专项城市贷款拆迁安置款 1 亿元；（11）车船贷款 1 亿元。

如果说，这样的优惠政策能不费丝毫周章下达贯彻，那平朴的、现在看起来无疑是急需的 1980 年规划方案有限的款项，怎么就那么艰难？

八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向大众募捐。到昨天为止，已经募到了大约三亿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岗工人残疾者一张张往募捐箱里塞钱，不禁黯然神伤：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也是多年来被强制接受仅够糊口的低薪而自动为当局提供工业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电费充作“三峡建设基金每年 20 亿元")的职工。所有这些本属于他们的钱（包括他们的爱心）如果用得得当，生活在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 1991、1996 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结果却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番景象。

1959 至 1961 年遍及全国的的大饥荒。据估计饿死的人，仅安徽一省，就达数百万人。官方维持“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凡十数年，直到其始作俑者离开人世、其“阴”威已不至于祸及不同意见者，说法才逐渐变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和后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据《20 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作者检索县志原始记载，从 1959 到 1961，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国性的"全年风调雨顺”。

报载一名灾区官员叹谓：“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这问题九江人其实已经可以回答：只看他们那座刚刚花了一亿元市政费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护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贪官与奸商。

那么，我们本来期望见到的、确保长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泻的坚固堤坝与科学的泄洪道，快 20 年了，竟还没有出现，为什么？